



【英】温斯顿·S·丘吉尔著
赵文书 肖锁章译

丘吉尔文集 思想与经历

D756.109
85702

〔英〕温斯顿·S·丘吉尔著

赵文书 肖锁章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丘吉尔文集
思想与经历

87
0375867

Thoughts & Adventures

Copyright ©1958 by Winston S. Churchil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思想与经历
著 者 [英] 温斯顿·S·丘吉尔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页 2
字 数 16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206—0/I·91
定 价 11.00 元(软精装)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这几篇文章,使我清晰地记起了我们这一代现已年近花甲之人所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着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先是“秩序井然”——我们对此的鲜明印象现已从记忆的暗盒中黯淡下来——以致当年悉尼大街上发生的一件充满色彩和动感的小事竟能像一座冒险和冲动的巅峰巍然雄立,轰动一时;接着就发生了空前的大战悲剧^①,从此世界上充满了混乱、不安和危险;光明与黑暗的力量势均力敌;魔王撒旦和天使米迦勒^②都疑惑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军队;世界正朝着命运的十字路口前进,面前的两条路都可能通向地狱,对此我在《我们非得自我毁灭吗?》和《五十年展望》这两篇文章里都竭力作出预示性的描述。历史上果真有过如此重要的时代吗?

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只是触及了严峻事件的轻松一面,但如果有人因此把我的两个恶梦般的设想看作是业余预言家心血来潮时的臆想,那我会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十分恳切地想借这两个设想发出警告,如果人类文明不能把握住自己,不愿放弃毁灭和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书成书于二战前,书中有很多篇文章提到的战争均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当时尚无一战之名,故翻译时仍保留当时的说法。

② 在《圣经》中,撒旦是魔王,米迦勒是最高天使。

征服,恶梦很容易成为现实:科学就是开启毁灭和征服之城大门的钥匙。

幸运的是,我们的生活中仍有欢乐,我特别想对此表示感激,并借此为本书添上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尾:

人们说世界是位年迈的老人,
但他应该像孩童一样嬉耍。

——温斯顿·S·丘吉尔

1932年9月于查特韦尔

目 录

前言	1
第二次抉择	1
漫画和漫画家	9
政治上的一贯性	23
我的私人交往	32
悉尼街枪战	43
德国之辉煌	50
我的间谍故事	59
在近卫军中的日子	68
普鲁格斯特里特	79
潜艇战	86
多佛尔拦截网	100
鲁登道夫的“孤注一掷”战略	106
和克列孟梭在一起的一天	119
翱翔蓝天	131
竞选回忆录	145
爱尔兰条约	157
议会制政府与经济问题	164
我们非得自我毁灭吗?	174
现代生活中的群体效应	180

2 思想与经历

五十年展望·····	189
摩西：一个民族的领袖·····	200
业余爱好·····	210
绘画与休闲·····	215

第二次抉择

如果生命在同样的环境中轮回,那么,毫无疑问我还会有同样的困惑,同样的犹豫;我还会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希望,担负同样的责任,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我怎么可能不重蹈覆辙、走同样的人生之路呢?当然如果环境有变,如果机遇将带着我漂流到陌生的航道,那么我的人生之旅也会随之改变。果真如此,这就不再是生命的重复,而我就得在一个有着不同制度、不同历史的陌生世界里开始新的生命旅程。

譬如说,我来到了蒙特卡洛^①,像往常一样因生性乐观而把赌注押在了红色上,然而,这次旋转的象牙球一反常态,没有掉进黑槽,而是掉进了转盘上的红槽里,我也许就会大赚一笔。如果我在20年前用这笔钱在芝加哥的湖边买上几块地,也许我会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受好运气的煽动,我不停地赌博,我也许从此会成为赌桌上的常客,或许已成了一个晚上在赌场外游荡的可怜虫。这里显然有两种过程在起作用:第一个过程决定象牙球落在何处;第二个过程决定我对前一过程的结果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这两种因素不断变化,交互作用,那么今后要发生的事便会令人眼花缭乱,难以

^① 蒙特卡洛:摩纳哥公国著名赌城,濒临地中海。又译“蒙的卡罗”。

捉摸。我们不妨假定事件的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已在掌握之中,我所要做的仅仅是重新抉择一次。

但是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重新选择时,是否已经知道了曾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情?或者,我第二次所拥有的身体状况、性格、知识和信念会不会依然如故呢?假如是后者的话,我们的讨论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我的选择和我所处的环境都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话,我肯定会重蹈覆辙。比如说,有一类人在决定是否旅行、买房、打官司或从政等问题要靠抛硬币作出决断,如果我属于这一类人,并且硬币跟从前一样是反面朝上,那我肯定会做出跟从前一样的选择。

因此,假如生命能轮回,假如我真的可以作出新的选择,那么我必须了解我的前世,必须将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一切,包括与我有关的一部分全部带入我的新生命里。这样,我当然知道哪些该避免,哪些该弥补,知道该选择哪条前进的道路,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会成功。果真如此,我就能够带领其他人,甚至带领全人类走出无知,不做谬误的奴隶,走出无尽的苦难。

且慢。我只有一次选择——将生命从头开始再来一次。我将我至今所掌握的知识全都带进我的新生活,但是当我的新生活正式开始后,前世的历史、甚至我亲历过的事情可能都已过时,或者说我所经历过的再也不会发生了。当然,如果我凭借自己业已过时的先知先觉处理小事,虽对世界的因果关系可能不会导致很大的影响,但却能立即改变我个人周围的小世界。

比如,在没有影响世界经济的前提下,我可以稳操胜券地利用我的先知去德比赛马^①场赌马,以此开始我的新生活。但是

^① 德比赛马:始于1871年的英国传统赛马之一,每年6月在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埃普索姆的唐斯举行。

我的先知并不能保证我还能在下一次的德比赛马上稳操胜券。尽管我在今世早已知道了获胜赛马的名字,可是现在有新情况发生了:由于我赢了巨额赌注,很多赌注经纪人不得不放弃参加赛马;他们的一位最有钱的委托人因为损失惨重,绝望地跳进池塘自杀了,而这个委托人的马正是下赛季应该获胜的马,但他的早逝影响到了马的命运,因为根据我们愚蠢的规则,这匹马被取消了参赛资格。第二年我赶往埃普索姆,想凭我的先知先觉来碰运气,不料,我对赛马场上的形势判断表明,我是唐斯地区最无知的人。对今世赛马场上各种赛马的回忆把我的心绪搅得一团糟,使我在新世界里根据我超自然的直觉,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了最愚蠢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说,假如一个人能够重新生活一次,在做出重大决定时,他的先知只会一次有效。此后,我必须处理那些不断分岔的、盘根错节的结果,这些结果不断影响着我周围的环境。

个人小事尚且如此,那么如果真有先知先觉的话,依此作出新的选择对处理重大的问题该有何等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啊!在南非战争期间,我乘坐的军列遭布尔人^①袭击,出了轨道,我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清除路障,来回进出唯一能为我们提供动力的火车头。为了行动方便,我解下了毛瑟枪,否则,40分钟后我完全可以让那20码以外骑在马上要我投降的名叫博塔^②的家伙吃上两三颗子弹。那一天是1899年11月5日,如果我当时把他打死了,那么南非的历史肯定得重写,南非也肯定不会这样幸运了。就是这个博塔,后来成了布尔人的统帅,当上了南非

① 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

② 博塔(1862—1919):南非军人,南非联邦第一任总理(1910—1919),1911年建南非党。

共和国的总理,若没有他的权威和魄力,大战前在南非爆发的暴动根本不可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果真如此,由护卫舰护送、行驶在印度洋上的载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运输船就不会驶向开罗,而会调头驶向好望角。事实上当时已经作好了让护卫舰队在科伦坡改向行驶的一切准备。他们的任务可能会由保卫苏伊士运河变成与希尔族暴乱分子血战。再者,1914年底要不是我们在埃及有一支澳新军团,次年春我们就不可能有一支用来进攻加利波利半岛^①的核心部队,那么这场战争结局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了,结局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如果我们的想象力沿着这两种结局走下去,肯定会在纵横交错的迷宫中迷路。

然而,当我在纳塔尔^②爬进爬出火车头时,我卸下了赖以保存性命的手枪,这确实是不明智的冒失之举。你不可能说,“你已经知道那个人不会杀你,布尔人会对你很好,博塔将来会成为伟人,他会将南非和英国王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必要向他射击。”况且这也不是最后结局,因为同时还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情。如果我带着枪,我进出火车头时行动肯定要慢得多,那么本来与我擦肩而过的子弹可能就会击中我;博塔则可能因为急于想找到躲在火车废墟里的逃命者而策马向前,他没有与具有先知能力的我相遇,而是遇上了一名持步枪的列兵,这名士兵开枪将他打死了。而我自己则与其他伤兵一起被送到了位于拉迪史密斯的一家肮脏的名为“葬身之地”的医院,最终可能染上伤寒死在了那里。

① 加利波利半岛:位于土耳其西北部,构成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北岸。

② 纳塔尔:南非一省。

回首往事，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最普通的体验：我们犯的错误最终拯救了自己，而我们所作的最明智的决定却葬送了我们的前程。我曾想，如果我真能再活一次，我一定得戒掉抽烟的恶习。瞧，我在烟草上浪费了多少钱！如果用这笔钱去投资，年复一年的利息累计起来该有多少啊！我还记得我父亲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人为什么要抽烟呢？如果你还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希望自己的手不要抖个不停，如果你不想在骑马越障时心存疑虑，请你不要抽烟。”

可是再想一想！我怎么知道烟草对我神经系统的镇静作用根本就不能够让我在某些令人尴尬的私下场合中使自己保持镇定、有礼有节，根本就不能够让我在焦急的等待中安安静静地度过关键的几小时呢？假如我从年轻时就中断与尼古丁女神的往来，我怎么会知道我的脾气是否会变得更好、性格会变得更随和呢？还有，如果在佛兰德战场上我没有回到防空洞去取遗忘在里面的火柴，我会不会遇上落在我前方约 100 码远处的炸弹呢？

就我个人而言，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大体上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如果我想做的事或想说的话因自己的谨慎、懒散或因别人的劝阻最终有了改变时，我总有一种羞于见人的感觉；哪怕有时被迫改弦易辙是正确的，我仍有这种感觉。南非战争结束后，拿我的心情和保守党的心情相比较，不难看出我根本不可能再满腔热情地为保守党做事了。除了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争吵外，我对战争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他们却在政治上大肆宣扬所谓的胜利论。因此当贸易保护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时，我呆在一边，用最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他们的行动。久被困锁的新一代就像洪流决开堤坝，滚滚而下。当然，你不得不开抚育你长大的政党，不得不与你几乎所有的朋友和亲属分道扬镳，这确实是件可悲的事情。尽管如此，我敢肯定当时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

发自内心的,毕竟当时年轻气盛,这也是年轻人的可敬可畏之处。

我力排众议,及时组建了一支舰队,而且每艘舰上都按当时的科学标准配齐了装备,因而大战爆发时我名声大震。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对陆军作战和海军作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不影响我在海军部工作的前提下,我肩负起陆军方面的一些小责任;身居高位而又过于密切地接触行动的具体细节,所以我难免会冒致命的危险。

我本不该去安特卫普,应该留在伦敦,敦促内阁和基钦纳^①勋爵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我本该安居高位,明哲保身,而事实上,我却在令人激动的悲剧性的安特卫普保卫战中、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四五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不久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局部战争,决心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决高低。于是我向政府递交了辞呈,想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很幸运,我的辞呈被拒绝了,否则我肯定会卷进这场从大战的全局来看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局部战役。在处理大事时,你所犯的大错有时也会被人原谅,甚至无人察觉,可是在一些具体的、局部的事务上,很小的错误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我这次卷入安特卫普战火中,差一点葬送了我作为动员和准备军舰工作中赢来的声誉。对军机要事有决定权的人必须坐在权力控制的山巅,他们绝不能下到山谷去亲身体验。

现在看来很清楚,当时基钦纳勋爵违背诺言,没有派出 29 师前去增援聚集在埃及准备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的部队,使这次远征延迟了 3 个星期。在这种情况下我本该谨慎从事,取消

^① 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陆军大臣,因所乘巡洋舰触雷而死。

海军的进攻。当时要那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原计划就是这样安排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而从那一刻起我必须为这场由别人控制的战役担负起责任。这一重大事件的命运控制在其他人手里,但我卷入后,这次行动一旦失败,我必须负全部责任。毫无疑问,如果当初在海军部工作的我抛开这些具体责任不管,如果当陆军没有按期到达时我命令军舰驶离战场,那么在整个大战过程中我可能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千万不要忘记,尽管在加利波利半岛的那次陆战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失败了,但是这场战争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让意大利加入了战斗,也使保加利亚在整个1915年夏季按兵不动,完全挫伤了土耳其士兵的士气。

有时我们的错误和失误却能使我们因祸得福。1923年保守党突然提出贸易保护问题,十几个自由党选区拉着我做他们的候选人。显然,曼彻斯特无论如何都应是我的主战场,那儿为我提供了一个席位,我完全有可能获胜。然而由于某些说不清楚的复杂原因,我放弃了曼彻斯特,来到莱斯特与一名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进行着搏斗。由于同时还受到了保守党人的猛烈进攻,我理所当然地败下阵来。得知两种选择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后,我真想狠狠地踢自己几脚。然而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我未能进入议会,与任何选区都没有任何瓜葛,所以当自由党人做出了让社会主义者执政这一不明智、自寻绝路的错误决定时,我才能够使自己对形势保持着独立的、不偏不倚的清醒认识。

因此,我才能在几个月后的威斯敏斯特^①选区的补缺选举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反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从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重新赢得了那些顽固的保守党人的好感。尽管他们从来就不

① 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

喜欢、不信任我,但在关键时刻我毕竟与他们有些相同的观点。若不是在1923年大选时我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我怎么也不可能与曾经养育过、后来又与我有多年龃龉的保守党重续前缘。

我认真回忆了自己的一生,毋庸置疑,我绝不愿意将这一生再重复一遍。尽管我这一生是幸福、绚丽、充满乐趣的,我仍不想在这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人生道路上再走一遍。即使有机会在犯了不同的错误、经历了不同的冒险后取得成功,我也毫无兴趣。我怎么知道今生一直伴我的好运不会在我的另一生中由于因果关系的变化而在关键时刻丧失呢?

我们应满足于今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感谢今世我们逃避了的一切。我们应遵循命运的法则,尽力与今生时空里我们的命运的神秘莫测的节奏合拍。我们应珍惜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不要怨天尤人。光,因为有了阴影的陪衬才显出它的伟大,祸福相随的生命才算是完整的生命。人生之旅是快乐的,但它只值得我们体验一次。

漫画和漫画家

我一直喜欢漫画。我在布赖顿私立学校念书时,那里有三四卷《潘趣^①》漫画集,但只有到了星期天才允许我们看。看漫画是学历史的一种好方法,至少能从中学到点东西。在这些漫画里有每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要闻,表现形式有时很严肃,有时很轻松。约翰·特尼尔和其他著名漫画家肯定有很强的责任心。许多稚嫩的眼光落在他们的图画上,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从这些漫画中我曾对尤利乌斯·恺撒有过完全错误的认识。

格莱斯顿先生^②经常被画成是尤利乌斯·恺撒,一个头戴爱木神花冠的最可敬的人,就像是一位了不得的小学校长。当然我们知道他是首相,是最聪明的人,是一个集美德、正派、无瑕于一身的人;这种人会告诉你做了什么错事,但从不必考虑,也没有人会说他自己做错了什么;这种人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而自己从不违反规则。他年高德劭,身份尊贵,令人敬畏,乐善好施。尤利乌斯·恺撒就是这样的人:善良、伟大、了不起!后来我了解到尤利乌斯·恺撒原来是罗马某政党的统治者,他的私生活糜

① 潘趣: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鹰鼻驼背滑稽木偶。

②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1867—1875),曾四次任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著作有《荷马与荷马时代研究》。

烂透顶,只能用专门的医学词汇来记述他的生活才行,我真是吃惊不小。后来又知道此人是个罪恶的冒险家;维多利亚时代所有体面的人都瞧不起这种一无是处的家伙,我简直快惊呆了!

还有一些漫画,当一页页翻开时,一场场卷入政治漩涡中的战争栩栩如生地突现在面前。你能看到的是“英格兰高度警惕克罗米亚”。画面上的大不列颠女士跪在教堂里祈祷,手握一把出鞘宝剑,正欲起身将某人刺倒。还有不少其他关于克罗米亚的漫画似乎表明战争尚未达到如此程度。事实上,很多漫画是在批评政府的无能和对伤兵的漠不关心。我们看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手持一盏油灯,战争结束后我们才派出了一大群有着大烟囱和火炮的战舰。这些就是克罗米亚战争^①。

接下来是印度的兵变,有幅漫画画的是英国雄狮报复孟加拉懦虎。一只凶猛的狮子跃过长空,一只卑鄙的老虎躲在一边,故意不愿上去接招!

后面描写的是法国与普鲁士之战。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威廉国王成了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客,口中唱道:“我是乡村一少年,但你没法占我的便宜。”然后两个最伟大的国家之间的真正的欧洲大战开始了,炮弹爆炸后碎片横飞,似乎连炮弹的爆炸声都能听到。法国失败了——一位表情忧伤的法国美妇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与一位手持利剑、勇不可挡的金发德国女郎搏斗。天哪!法国是多可怜啊!

再翻一页,法国已俯首称臣,但手上仍握着断剑,而德国女郎(尽管长得并不好看,而且很胖、很壮实)高高地站在法国妇人面前,手里也握着一把剑,说:“为了我的安全,你把那些要塞割

^① 克罗米亚战争: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

让给我。”而已经被打败的法国人却回答说：“我们决不割让一寸领土，也决不放弃要塞里的一块石头。”看到这儿，我怎么能不站在法国人一边呢？那个年代长大的英国男孩心里都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在我们眼里，法国被那异乎寻常讲求效率和遵守时间的、手握利剑的、板油般肥胖的德国人打败了。大家都觉得如果有朝一日这个破碎、被蹂躏的法国能够重新站起来，打倒这位胖妇人，这才是一件最好、最公平不过的事。后来，在后几卷以及我多少年以后所看的著名漫画中——特尼尔的“击落德国飞行员”是最著名的一幅——以及看到愚蠢的年轻德国皇帝赶走了俾斯麦^①，法国似乎还有希望。

而我对美国内战的浓厚兴趣也由此而生。首先，潘趣先生反对南方，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凶狠的卡罗来纳小姐正要抽打一个光着身子的奴隶，也就是汤姆大叔一样的人。想到自己还没有从被人鞭打的日子解放出来，我当然觉得这种手段是最残忍的了，我完全站在了奴隶的一方。后来北方佬也出场了，整整一个团的人正从一个叫布朗的地方出发；他们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滑膛枪，四人一排跑步前进，他们的鼻子又长又红，他们跑得很快，路标指向加拿大。这个故事叫《俺得拿下加拿大》。就这样潘趣先生又和北方较上了劲。很明显，北方和英格兰吵架了，然而，战争还在继续。请看这幅关于南方和北方的漫画：两个穿着衬衫和马裤的野蛮家伙扭打在一起，用刀子互相捅向对方，又一起旋转着掉进了名叫“破产”的深渊。最后，我记得看过一幅画着林肯墓的漫画，神情忧郁的大不列颠在那冰

^① 俾斯麦(1815—1898)：普鲁斯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通过王朝战争击败法国、奥地利，统一德意志，有“铁血宰相”之称。



英国内战

凉的大理石上放了一个花环，和我看到的戴在格莱斯顿——恺撒先生额头上的桂冠差不多。

我读历史书时心里已经有了这些印象。这些漫画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能勾勒出国与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最残酷的对抗。而那些瞪着好奇的双眼凝视着漫画的孩子们想当然地把它们看成是人生棋盘上的真实步骤。然而，不管孩子们从《潘趣》上那没有生命的纸张上学到了什么，漫画确实是现在已是成

年人的那代人的精神食粮。从这里他们开始对社会上的人和事有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往往会根据漫画决定投谁的票。幸运的是,如果漫画很多,能代表各种立场和各种问题,那么它们也就失去了潜能,事情也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糟糕了。

可是作为一名读者(或者套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常说的,一名高贵的读者),你愿意自己被画上漫画吗?当你看到自己被描绘成可怜的动物模样,当你那体面的鼻子被画成了一个大肉瘤,当你想到有几百万读者会看到你那滑稽可笑的样子,你会怎么想呢?如果这几百万读者真的以为你就是这种样子——一个可怕的东西,一个卑鄙小人,一个衣衫褴褛的可怜虫,一个让大家撒气和诋毁的靶子——你又会怎么想呢?想象一下,你一生中必须每星期甚至每天都得面对这种局面,而你的同胞、朋友、家人眼睁睁看着你被人嘲讽、遭人羞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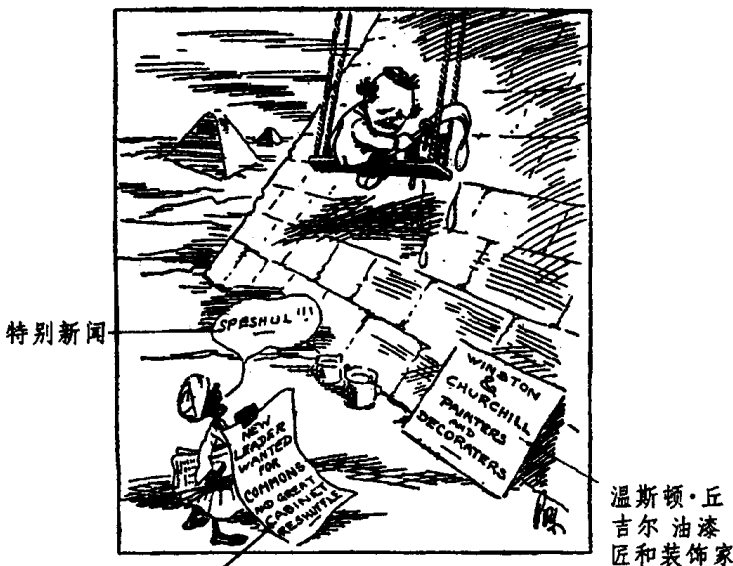
难道这不让你担心吗?你毕竟不可能到处奔走,对那些观众说,“这幅漫画不是真的,错了,不公平,我的鼻子长得不是那个样子;我的帽子不像那样小,看我头上的帽子,你的大头也能戴得下,难道这帽子还不够大吗?”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不像那样可笑,我有凭有据,动机是很高尚的。请你们读一读我在3年前1月26日发表的那篇演讲吧,就在议会议事录里,共5页,你会看到我究竟是什么立场。我没有把事情搞糟,相反,时间是公正的,最后胜利属于我。”噢,不,你不能这样做,你永远无法弥补,永远也改变不了人们对你的第一印象。这些正在成长的新生代只知道你那臃肿的面孔和你那肉瘤鼻子,还有你总是洋相百出。高贵的读者,你喜欢过这种日子吗?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坏。正如鳗鱼应习惯蜕皮,政治家们应适应上漫画。事实上,由于人性中有某种奇怪特性,他们甚至喜欢被画进漫画里。坦白地说,如果漫画不再注意

他们，他们会很生气，并且会垂头丧气。他们会认为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或是自己有了什么问题。他们担心自己是不是年纪太大了，成了默默无闻的废物了。他们会喃喃自语道：“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有人诽谤我们、诬蔑我们了，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身高 5.95 英尺——算是个身材魁梧之人了——但因为被描绘成了格莱斯顿先生的对头，他总是被画成小矮个，一个留着大胡子、脾气暴躁、眼睛外凸的侏儒。画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只需掌握一个秘方：把他画成哈巴狗或像哈巴狗的样子准保没错，然后将狗头装在一个矮子身上，旁边再画上威武的格莱斯顿，打扮得像那个无耻的尤利乌斯·恺撒（因为我现在知道了他的确如此）。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写信给我询问我父亲究竟有多高。“据说他不止 5 英尺高，这是不是真的？昨天晚上我们俱乐部里打了个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告诉我们是否真是如此。我们一致同意您的答复就是最终答案。”因此我猜想，总有一天漫画家的笔再也不画我，很久以后我的儿子将不得不拾笔回信，告诉人们，我的鼻子并不像肉瘤，我的帽子也是伦敦帽店里最好的。

这里有一幅波伊的漫画。作为殖民事务大臣，我被派往开罗去决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我刚到开罗，伦敦平静的政治局势就掀起了波澜，波那·劳因精神崩溃和健康原因辞职不干了。我是带着颜料盒来开罗的。当会议在我的指导下顺利进行时，我忙里偷闲画了几幅金字塔的画。当然，伦敦改组时全然把我给撂在一边了。诺思克利夫勋爵对这幅漫画非常欣赏，并且将原作寄给了我。他对画中的那位卖报纸的阿拉伯小贩尤为喜爱，认为那是画龙点睛之笔。当他向我指出那妙笔生花之处时，脸上洋溢着得意之情。我笑嘻嘻地接过了礼物。当



下议院和内阁改组，
现招募新领导人

不上不下

(丘吉尔先生在油漆金字塔时，伦敦发生了内阁危机)

然，这只是个玩笑，可玩笑里也有事实，别人可能会比当事人更觉得这漫画有趣。

大卫·洛^①是现代最伟大的漫画家。说他最伟大是因为他能栩栩如生地表现政治题材，因为他具有漫画家少有的本领——精通制图技术。他具备了已故弗雷德里克·卡卢瑟·古尔德所具有的一切知识和鉴别力。但古尔德画法拘谨，而洛则是运用黑白线条的大师，他是漫画界的查理·卓别琳，既擅长悲剧，

^① 大卫·洛(1891—1963)：英国漫画家，出生于新西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其反法西斯、反压迫的政治连环漫画闻名于世，主要作品有：《毕林普上校》，漫画集《愤怒的年代》等。

也擅长喜剧。洛的成长环境既造就了他,又牵制了他,他算是战前澳大利亚激进派中的一员。在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年代,使人发笑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对既定的制度,特别是对大不列颠帝国进行嘲讽。此时的大英帝国有数以亿计忠实的臣民遍布世界各地。对那些心怀不满的年轻的澳大利亚激进分子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对这庞大的帝国进行嘲讽。因为帝国似乎强壮得足以忍受一切,因此这种嘲弄不仅令人发笑、利润丰厚,而且对帝国也不会有什么危害。不管怎么说,这种情绪一直影响着洛的世界观。他利用笔下孩童,琼·布尔和她怀中婴儿的形象不断对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事物进行嘲弄。

请看这幅描写 1924 年大选场面的作品。漫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本能地带着敌意看穿了真相。



自由主义者!
今天在这里
集会!

征兵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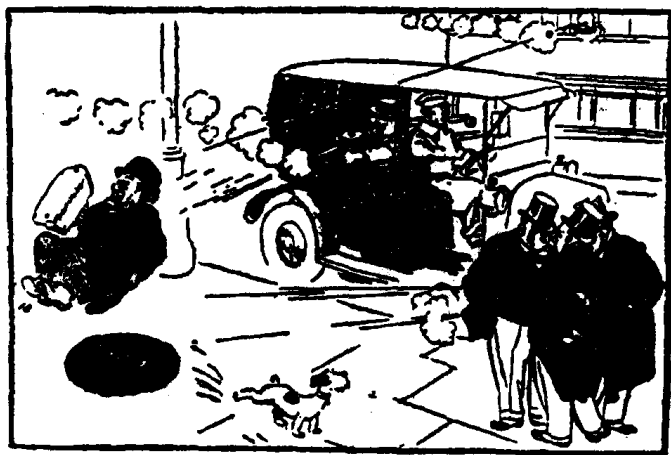
(发表于 1924 年大选期间)

这真是一幅杰作,它在《星报》上刊出后,我马上去信要求购买这幅画。因为我很喜欢这幅漫画,他们非常慷慨地把它当成

礼物送给了我。我曾把这幅画给伯肯赫得勋爵看过，他从未看过这幅漫画。我得意地说：“(洛)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漫画家！他对您的把握真是恰到好处，您和漫画中的您真是一模一样。”勋爵拿起镶在框里的漫画，静静地凝视着，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严肃的神情，他把画交还给我，说道：“画里你是唯一受到赞扬的人。”我感到很高兴。

此后，勋爵开始对洛所作的以他为题材的漫画表示不满。这位澳大利亚激进分子的画笔间透出的憎恶和蔑视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漫画对史密斯家族的男女老幼均大肆嘲讽，这就难怪他有怨言了。他从来也没原谅过画家对他的侮辱。

下面这幅画是洛的近作，这幅画看上去更像是个恶作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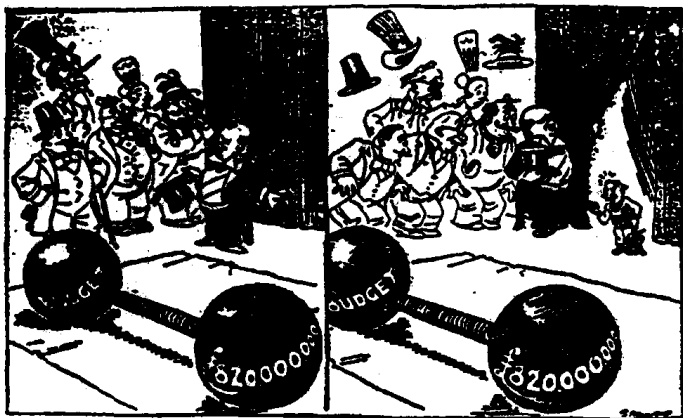
现场报道

(鲍德温先生因坚持印度政策而被杀，坐在出租车里的那个雪茄脸是丘吉尔先生)

这位十足的爱开玩笑的人曾受雇于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标准晚报》，这是一份保守派报纸。然而洛的画笔非但没有被保守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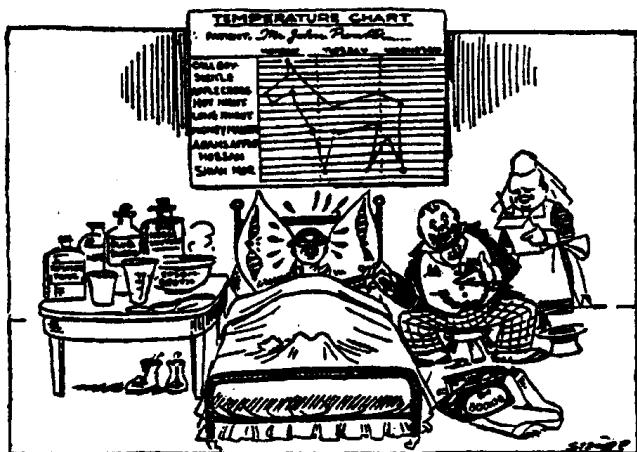
束缚,反而越发难以驾驭。他就像一头沙漠野驴,既无人能为它套上笼头,也没人能禁得住它的驴吼。当时印度的局势很严峻,一场竞争激烈的补缺候选即将在伦敦进行,比弗布鲁克勋爵对此很感兴趣。洛一直支持从印度撤兵,并且自认为鲍德温先生^①与他意见一致。他因受制于编辑部的某些特权(比如宁可受损失也不出版某些作品),所以一直要求创作上的绝对自由。他该是这样想的,“如果我能把目前形势描绘成一批芝加哥匪帮正企图搞垮善良的、明智的、可敬的、但有时也令人生厌的鲍先生,以此表现民众的激情,这对丘吉尔先生以及对这次补缺选举的破坏该是最大的了。”我一点也不责怪他,宽恕是最大的理解。

这两幅斯特拉布的漫画是他温和性情的很好例证。他创作的《小矮人》和其他所有生动的漫画作品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扎



财政大臣丘吉尔先生为“小矮人”约翰·布尔先生报幕

^① 鲍德温(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1937年三次任首相,压制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



德比热——接近危机

(发表于1927年,此时财政大臣丘吉尔先生决定对赌马进行征税)

下了根。斯特拉布的小矮人和波伊笔下的约翰·公民先生很不一样,但他们俩在画风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擅长表现不断被痛苦和不幸折磨的软弱受欺的人。如此表现出来的国民象征与早期的戴着方顶礼帽、朴实的面孔里透着不屈神情的粗犷、魁梧、强健而又和蔼可亲的约翰·布尔真是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变化主要缘于战后人们思想的变化。我们这个已筋疲力尽的民族不但要承受苛捐杂税的重负,还要经受社会主义者^①的折磨,贸易在滑坡,贫穷人口在增加。我们的海上霸主地位丧失了,就连在东方的统治权也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下,斯特拉布笔下小矮人脸上的焦虑和波伊笔下男人的枯槁容颜也就合乎情理

^① 丘吉尔的观点有明显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请读者批判地接受他的观点,包括他在本书其他地方所提到的观点。

了。我们希望随着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世界观的出现,不久会有很多快乐的人物被创造出来以迎接我们昔日辉煌的回归。



名人的必备物件往往是众人寻找并用以识别他的标志。迪斯累里^①的额发、格莱斯顿的衣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小胡子、张伯伦先生的眼镜以及鲍德温先生的烟斗——这些“道具”都很有价值。我自己从未刻意准备一件什么小玩意让人注意,然而漫画家们为了自己的需要便为我编了一段帽子的传奇故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10年大选期间



漫画家笔下的丘吉尔

^①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首相(1868;1874—1880)、保守党领袖,作家,写过小说和理论作品,其政府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发动侵略阿富汗及南非的战争。

我正在南港,当时我常与夫人沿着海滩散步,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顶小毡帽——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帽子是从哪里冒出来



的,帽子就摆在客厅的桌子上,我随手拿起来就戴在了头上。当我们散步回来时,有位摄影师替我拍了张照片。从此以后,漫画家和在报纸上写短评的人就在我的帽子上做起了文章,说什么我的帽子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说我整天不停地换帽子,还说我很重视戴什么样的帽子,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胡编乱造,其根据只有一张照片。不过,如果这一切能使那些工作辛苦的先生们高兴的话,我又有什么要埋怨的呢?事实上,我真想存心为自己买顶新帽子,让这个编出来的故事成为现实。

最凶猛、最可怕的漫画家该是路易·雷迈克。他的笔所描绘的战争痛苦远甚于我所见过的任何漫画作品。当然他能将那种反抗、嘲讽融进他的画作之中,所表达的激情超过了一切文字和言语。马克斯·比尔博姆也具有伟大的艺术力量。没有谁的系列漫画比他的作品更能表现过去100年里法国和德国关系的变化。12页图画一览无余地向众人展示了一段可怕的世纪史。漫画寓意深刻,能够激发哪怕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的想象和记忆。

我很喜欢对这些漫画家评头论足,然后将他们归归类,因为这能让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过去的好时光”。再见了,这些时而严肃、时而轻松、时而善良、时而阴险、时而真诚、时而捣蛋的

漫画。在人类文明的大海中有善良和宽容的大浪，起落的浪潮磨砺着海边的卵石，冲走了杂物，洗净了海滩。让我们为这大浪欢呼吧。

政治上的一贯性

就这个题目而言,没有谁比爱默生写得更大胆了:

你为什么要高昂着头?为什么你还要拖曳着记忆的僵尸?难道你害怕与自己曾在某个公开场合说过的话自相矛盾?即使你自相矛盾,那又怎么样?……

愚蠢的一贯性是小人物心灵中的怪物,受某些政治家们、哲学家们和牧师们所推崇。

今天你说你今天认为千真万确的话,明天你说你明天认为千真万确的话,尽管明天的话和今天的话相矛盾。

这些说法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甚至这个已老掉牙的题目也能发人深省。首先,我们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政治上的不一贯性。为了使船平稳,在事件的急流中掌舵的政治家可能会让自己身体的重心一会儿倾向这边,一会儿又倾向那边。如果比较一下此人在各种场合所持的论点,人们也许会发现它们不仅性质不同,而且可能在主要精神上自相矛盾,甚至会在方向上完全相反。可是他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他的愿望、他的世界观从未改变;然而他对其所采用的方法却无法自圆其说。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不一贯。一个人要想在瞬息万变的环境里保持一贯性,他只能在保证不改变自己的主要目标的前提下随环

境变化而变化。曾经被嘲讽为两面派的哈利法克斯^①勋爵有一句名言：“我的改变就好比温带的气候变化：有时酷热、有时冰冷。”

在这个问题上，伯克是更好的例子。他的《对目前不满情绪之思考》以及他就美国的怀柔政策所写的文章和所作的演讲是所有英语国家中自由人士长期以来的主要武器库。他的《关于弑君和平论的来函》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会继续成为保守人士在任何时候都可用以御敌的最有威慑力的武器。他是自由的传道士，也是权威的同伙人。历史很容易就辨明了他这样做的理由和动力，看出是诸多问题的巨大变化才使这位睿智的、真诚的人有了这些完全对立的表白。他从心灵深处厌恶专制和暴政，不管它是出现在一个盛气凌人的君主身上，还是发生于腐败的王室或议会里。他不畏专制的高压，敢于在凶残的暴徒和邪恶的宗派面前为他那并不存在的自由高声呼号。不管你认为他是“自由的伯克”，还是“权力的伯克”，你都会感到尽管他不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辩护，但他一生追求同一个目标，寻求同一个理想的社会和政府。同一个伯克面对着来自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相同的危险，于是他为了同一个目的、从同一个军械库里拿出了不同的武器在不同的地方保卫着自己。

在行动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经常性的变化。一项政策的实施总有遇到困难、总有再也施行不下去的一天；新因素的涌现会使它显得陈旧，新的不利因素又让它成为一纸空文。当与旧政策完全相反的新解决方案出台时，其势已难以阻挡。采用新

^① 哈利法克斯(1881—1959)：英国保守党人，历任驻印度总督(1925—1931)、上议院领袖(1935—1938)等要职。

政策就必须放弃旧政策。有时同一个人、同一个政府、同一个政党也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责任,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卸掉自己身上的担子,或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在新形势下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一贯性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而且已付诸行动,还理直气壮地公开宣扬。放弃高压统治论就必须有调和论取而代之,而这些观点必定出自同一人之口。但这一切可以得到合情合理、不失体面的解释。政治家们会很率直地告诉你:“我们的高压政策失败了,现在我们必须采用怀柔政策;”或者,“我们的怀柔政策失败了,我们现在得采取高压措施。”

爱尔兰对英国政治有许多神秘的负面影响,应该为英国政治上的种种变化负很大的责任。1886年,格莱斯顿先生采取了高压政策已有5年之久,人们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正在由劫掠帝国走向分裂帝国之路”的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于是他在一个月内改变了政策,转向了他以后终生为之奋斗的怀柔政策。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凭他的威严和德高望重,为自己的转变列举了很多令人宽慰、令人信服的理由。毫无疑问,随着与旧政策的分手,他自身也因此受到了鼓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这些口若悬河的豪言壮语背后还隐藏着格莱斯顿先生从未透露的一个很实际的原因。

在1885年他下台至1886年东山再起这一段时间里,政府由保守党执掌。他们不仅受到爱尔兰人的支持,而且还受到了那些真诚却错误地以为保守党人正在想办法解决爱尔兰自治问题的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格莱斯顿认为如果自由党人依然走高压政策的老路,拒绝爱尔兰人的要求,自由党根本就不可能有出路。但是,格莱斯顿先生在对保守党人所要采取的行动的判断上明显有误。保守党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爱尔兰人的自

治要求,他们故意向爱尔兰人抛出绣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在大选时击败自由党。但是如果他们在自治问题上真的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那么他们不仅会四分五裂,而且还会失去其领导地位和他们作为执政党的领导权。由于判断失误,格莱斯顿实际上拱手交出了20年的统治权。尽管如此,历史会作出评价,格莱斯顿无论是当初对自治的极力抵制还是后来对自治的大力拥护都是正确的。当然,尽管1886年他因在自治问题上的政策改变而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这一变化与35年后的1921年保守党态度的变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除了外界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作用外,人的心情变化也会导致不一贯性。“人的心情是变幻莫测的”。很少有人在生活中没有心情的变化,也没有几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能将这种变化藏而不露。一般说来,年轻人自由奔放,喜欢改革;中年人处事谨慎,愿意折中;老年人则从容不迫,希望稳定。人一生的走向大致是从左倾走向右倾,且常常是从极左至极右。格莱斯顿先生的变化则截然相反,他一生中慢慢地从一个坚强不屈的保守党的希望之星转变为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党政治家。这一大转变也代表着心境的巨变。1833年他以一个年轻议员的身份,凭他的反对废除奴隶制的演讲引起了下院的注意。60年代又以大臣的身份公开支持美国南方各州反对北方。到了80年代他又为保加利亚独立而摇旗呐喊。最后作为一名资深首相,他于90年代又将自己无人匹敌的精力中最后一息投入到爱尔兰的事业中去了——他这一生的转变堪称是宏大。

如果你试图从这种转变中发现人的野心到底在不知不觉中、永不停息地起着多大作用,那必定吃力不讨好。思想本身具备一种能量,当受到公众大力支持的刺激时,其潜能就会得到释放。当然,反对派的不满以及作为党派领导人所应承担的实际

责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的说来,数量至少是巨变中的一个因素。拿破仑曾说过:“我的行动总有四五百万人的舆论支持。”如果不怕担玩世不恭的恶名,我们不妨再添上两句:“在一个有议会机构的民主国家里,有时很有必要顺从他人的意见。我是他们的领导,所以我必须听从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和那些虽然名气稍小但立场始终如一因而从未受过指责的人相比,格莱斯顿的政治生涯应该算是刚直不阿的,因为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找不到最后两种想法的痕迹。

显然,作为一名掌握大局的政治领导人,即使他有毫不动摇的决心和目标,他也必须在解决公众事务时权衡左右才能提出他的意见。比如说,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军事实力和军费开支没有任何绝对规律或自然规律可供参考,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形势、个人对当时存在的和潜在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的把握程度决定的。举例来说,如果某位英国大臣在德国发动的那场大战即将爆发之前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海防的紧急准备,又在德国的海军力量被摧垮之后建议放慢海军建设的节奏、紧缩海防开支,那么此人的主张应被看作是前后不一吗?他可能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因此已没必要再紧张备战了;他可能认为筋疲力尽的世界大战之后必是长期的和平;他可能认为金融秩序和经济建设的恢复远比继续加强军事力量更有必要;他也可能认为在以后的战争中空军将会取代海军的地位。也许他的前后主张都完全正确,因此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人们不难看出,两个时期中的两套观点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类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对某方面适用的推理的内在逻辑性,只能依靠在不同时期对主要情况的正确把握。在看待这些变化时,我们一定要将事件的特殊性与个人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如果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是顺流而下而不是逆流而上,那么我们就必须仔细审

查此人是否真的前后一贯。

如果说变化与实际事件无关,而与思想体系或信条的变化有关,我们就得做更深入的研究。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已故的约瑟夫·张伯伦^①是最能说明这一变化的例子。从80年代初他任贸易委员会主席时所作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讲与19世纪初他在关税战中所作的关于贸易保护的演讲清楚表明了这一变化。这里的问题不是世易时移的时局巨变,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读过张伯伦先生关于自由贸易演说的人都知道,他在1884年的演说中早已预见并反驳了他在1904年提出的所有经济观点。然而对他后来提出的观点中透出的真诚态度,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对手都欣然接受。再说,一旦他对经济问题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就毫不犹豫地用新观点造福国家,这不是更好吗?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这20年间推理的基础条件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问题主要仍停留在其抽象的一面,问题的本质未变。我们不必怀疑张伯伦先生的目的是否真诚,也不必怀疑他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和热情是否真实。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人对同一理论进行了自我否定,提出了前后矛盾的观点。

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加以进一步说明。1884年,张伯伦先生提出进口税应该由消费者承担,而1904年他却提出进口税的绝大部分应由外国人承担。我们自然会认为得出这两种结论的推理过程是水火不相容的。人们很难理解,对第一个推理过程把握得很好的人怎么可能又会同样热切、同样精确地认识到并且最终接受了完全相反的推理过程呢。从策略上来说,如果张伯伦先生完全放弃他最初的抽象观点,然后将他的新观点建立

^①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英国政治家,是后来英国首相亚瑟·张伯伦之父。原为自由党统一派领袖,后任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

在新的世界形势的论据上,那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些论据其实也确实张伯伦为什么要放弃旧观点的理由,具体包括建立关税同盟以巩固大英帝国的重要性以及联合英国工厂主和保守的工人阶级并从中寻求支持的必要性。可对张伯伦来说,以上这些考虑——不管它们是否相互矛盾——正是妨碍自己的纯经济观点的绊脚石。

政治家必须时刻努力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最好的选择,他不应为自己曾虔诚信仰过的旧观念的束缚而放弃这种努力。然而,对那些被迫在进退两难间作出选择的人来说,他们肯定会认为这种局面很不幸。伟大的罗伯特·皮尔爵士肯定就是陷于这不幸阴影中的一位。关于皮尔爵士,约翰·罗素^①曾经尖酸地写道:

他在当时最重大的历史问题上曾两度改变自己的看法。第一次是为了抵御天主教的进攻,令人尊敬的皮尔先生率众奋起捍卫新教,保卫新教宪法,以免遭到天主教的破坏。第二次是当《谷物法》^②在议会内外遭到攻击时,他又率领他的党为保护《谷物法》进行了抵制活动。我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最终都作出了利国利民的明智选择。他先是恢复了天主教的地位,后来又停止了对《谷物法》的保护。有些人坚信自己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智慧和他的洞察力,而是因为他在舌战时的雄辩,而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

^① 约翰·罗素(1792—1878):英国首相(1846—1852,1865—1866),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特兰·罗素的祖父。

^② 《谷物法》:英国《谷物法》的制定主要是为了限制谷物的进口,1846年此法被完全废除。

对这些人来说,当他们发觉自己心目中的圣人已经改变了以前他们深信不疑的观点时,他们对此表示愤慨是自然的,否则,那才令人吃惊呢。

对历史上的这位俊杰的政治生涯作出如此评价确实太苛刻了,但这种评价并非不公正。这不仅仅是观念变化的问题,而且是领导者对追随者是否诚实的问题;追随者们依赖领导者的引导,领导者的态度变了,可是追随者却并未随之改变。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从一个党派转向另一个党派,这种转变对一贯性的损害的严重性远甚于观念的变化。事实上,一个人只要还留在某个党派内,他就不会受到行为不一的指责,哪怕他在某一时期对某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也无人非议。当然,党派的变化和不一贯也像个人的变化一样令人瞩目。在议会的激烈冲突中和大选的风云变幻中,不这样怎么办呢?一个人只要与党派同进退,无论其前后怎样不一贯,背后总有大多数人力量的庇护。要想在党派发生变化时保持自己的坚贞就必须准备迎接恶意中伤的挑战。再说,和党派分道扬镳会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得与老朋友一刀两断。尽管如此,如果时势需要,真诚的信念将会凌驾于一切其他因素之上;就公众利益而言,这么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政治是宽宏大量的。尽管政治家的动机和品质不断会受到批评,但最终都会得到宽宏大量的、公正的评价。那么,我们今日的一贯性体现在何处呢?今天,我们议会中保守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正由社会主义党的缔造者领导着。这位几年前还是大罢工领导成员的政治家,去年还在设法使罢工合法化,而现在保守党人正为这位政治家尽心尽责地欢呼呢。贸易委员会中的一位终身为自由贸易而奋斗的委员也在喧闹的欢呼声中真心诚意地起草并通过了贸易壁垒法案。昨天

还在努力不让英镑贬值的政府今天又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让英镑升值。这些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的变节行为还会成倍增加,但是这些已足以说明问题了。且让我们引用一段乔治·克雷布^①的诗句来结束吧,希望大家都能像他一样宽宏大度。

每分每秒追随人生的轨迹,年复一年,
岁月的流逝让他的全部行为展现,
尽管有些在生活中略显怪异,
它们的变化却从未令人惊奇;
贯穿这些行为的丝线缜密、清晰,
其间不见丝毫神秘的空隙。

^① 乔治·克雷布(1754—1832):英国诗人,以擅长用朴素的语言如实描绘日常生活闻名,主要作品有《村庄》、《教区纪事录》等。

我的私人交往

人的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可是最大的人生之谜。可以回首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忠实地检视一下让自己迈出这一步或那步决定性步伐的理由、看法、动机和场合。有时他可能会发现那些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浅的人,却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小人物、不经意的言谈以及小事情往往会比关键时刻那些大人物们给我们提出的认真、严肃的忠告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更大。普通人很少会刻意让自己专注于某些要紧的事,或有意识地想为自己选一条最好的出路。但在我们短暂而又艰难的一生中,往往是某件琐事、某件意外、某件出人意料的毫不相干的事情替我们决定了我们应怎么走。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以免机遇和环境将我们甩出自己的正道。人性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我们有能力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总的说来,如果有了伟大的原则、善良的心,再加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人生之旅找到航标和指南针。当然,当我们坐在船尾,看着船后的漩涡时,那些最坚强不屈的人士也一定会感到有许多急流在我们的航程中起着作用。

因此,在此我有所保留地从自己记忆的相册里挑选几张新式快照、几幅简略的人物速写、几张老式相机拍下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人曾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我早年生活影响最深最大的是我父亲。尽管

我与他交谈并不多,并且从未有过平等的交谈,但我由衷地钦佩和爱戴他;他英年早逝,于是我对他又多了一份深深的思念。我认真地拜读了他讲过的每一句话,并且能背诵他的大部分演说词。我的政治思想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他那儿继承下来的。在我看来,在他鼎盛时期,他的手中掌握着一把通向精彩演讲术和政治行动大门的钥匙。尽管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一辈子都是个忠诚的保守党人,但事实上,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退出政坛后的那段辉煌时期里,他是个开明人士。他觉得没有理由不让由宗教和政府、国王和国家组成的传统的伟大英国与现代民主和谐相处,也没有理由不让广大的劳动人民成为传统制度的捍卫者,因为正是这些制度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和进步。正是这种过去与现在的结合、传统与进步的结合,正是这条金色纽带,这条从未承受过太强压力的、从未断裂过的纽带,构成了英国国民生活中特殊的美德和王者气概。当我快要完全领会他的思想时,他已经去世了。

1895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我还是个骑兵中尉。到码头接我的是伯克·科克伦先生。他是我认识的美国人中最好的一位朋友,我在美国期间,他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在此我必须记录下这位与众不同的人在我纯朴的心灵上留下的强烈印记。我从未见过同他类似,或在某些方面能与他媲美的人。他的头很大,眼睛炯炯有神,面部表情富于变化,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①的肖像非常相似。我无缘看见他演讲时的情形,然而在与他的谈话中,他的观点、话题要旨,他所用的华丽词藻和对仗的

^① 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下院领袖,外交大臣,反对乔治三世,主张议会改革,赞成法国革命。

句法,以及他的含蓄,都大大超越了我以前所听到过的任何谈话。

他本来属于民主党,也是坦慕尼协会^①的骨干,后来与布莱恩先生发起的银币自由铸造运动发生了矛盾。他转而站在了民主党的对立面,站在共和党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演讲。铸币问题暂时解决后,他又回到了老朋友的队伍中。他的这种对待党派的忠诚的双重态度自然受到了不少非议。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与他交往的20年里,我没有发现决定其观点的总原则有什么前后矛盾之处。他的信念是统一的。

在英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党派的意见,其发展过程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的成长过程。风可以使之弯曲变形,树种的不同可以使之扎根于不同的地方,干旱会阻碍它的茁壮成长,而风暴还会使它损干折枝。在美国,所有意见都来自统一的教科书,各党的党纲也是由党派机构根据各自的需要编制出来的,完全不顾个人的意见。英国几乎不可能产生出像他们那样轮廓分明的政党形式或棱角分明的政党章程。英国的政治事务恰似自然界的形态,总有破损的边缘,有边疆,有折中,有变异。要想让你所画的线互不交叉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大洋彼岸,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线条分明。根据美国宪法所支持的“基本原则多次循环”的观点,科克伦将其演讲变成一套完整的、能够让他真诚有效地面对各种千变万化形势的政治思想体系。他不仅是和平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民主党党员,而且还是资本主义者和主张金本位者。不过他首先是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并且一再声明他身上的其他特点都贯穿着这根主线。他反对社会主义者、

^① 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是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

通货膨胀政策支持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者,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与他们相对抗。因此他这一生并不缺乏斗争。如果他活得长些,他依然会如此。

下面请让我出示一张属于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时代的一位老一辈财政官员的照片。弗朗西斯·莫瓦特爵士曾经在这两位著名的前任财政大臣的手下干过,并且还曾替格莱斯顿做了不少年的私人秘书。他的观点完全可以代表成果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观和财政观:克勤克俭,精打细算,不管世界其他国家怎么做都坚持自由进口政策。人们无需战争,也无需为某党派摇旗呐喊,他们只需要一个温和平稳的政府,还清债务、减少赋税、不让自己陷入麻烦中去。至于贸易、工业、农业、社会生活之类,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走就怎么走。政府应该精减机构,并把对公众的要求减少到最低限度,让国家自由发展;让社会组织和工业组织各行其便,只要遵循国家法律和十诫即可。让钱在人们的口袋里开花结果。和伯克·科克伦一样,他要把那些帝国主义者、金银复本位制的提倡者、社会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统统发配到遥远的地狱边缘。

他是个瘦高个儿,浓眉大眼,长着一副强有力的下颚;他自谦又不失自尊,意志坚强,立场坚定,对自己和自己的信念充满自信。就是这样一位皇室的忠实仆人,在英国政府的核心部门谦恭地、俭朴地工作了近50年。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而他怀着同样的忠诚为两党工作着。他把对格莱斯顿的私人感情当作是自己纯粹的私事。他是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故交。他很喜欢跟我谈论伦道夫勋爵短暂的财政大臣生涯。跟我谈他是如何迅速地掌握了公共财政的全部原理,他是如何有条不紊地铲除了互惠贸易道路上的贸易保护主

义杂草,以及他又是如何坚决地为保障经济、削减军费而奋战!他还告诉我,和伦道夫勋爵在一起共事、为他工作真是件快乐的事!他的去世真是不幸!这应该算是我和莫瓦特认识的开始,也是我们之间亲密友谊的牢固基础。

不久,我对布罗德里克先生的陆军扩军主张提出了批评,并且从经济角度出发在议会中寻求支持。时任行政事务总管的老莫瓦特,时不时地给我捎一两句话,让我与几位后来都成了显要人物的年轻官员接触,使我从与他们的交谈中获益匪浅——我们从不谈机密,因为我们深知机密不可泄。我们在一起只谈自己认为是重要的已经公开的事实。接下来便是1903年的财政大争论。伟大的乔·张伯伦^①,这位80年代激进派的英雄、也是当时保守党的英雄人物,又一次将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对食品加征关税进行贸易保护——搬上了政治舞台。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正在慢慢地酝酿着。当时的财政部大臣是无可指责的里奇先生,他背后有莫瓦特作首席顾问,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他挥舞着迎风飘扬的自由贸易大旗,一路奋战。莫瓦特自己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他大大跨越了文职官员的活动领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宁可丢官弃职,也要在有影响的政府报纸上与行政机构分庭抗礼。他不仅用具有普遍性的事实和论点武装了我,而且还让我学到了不少经济学知识。这对于一个即将要在国家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28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我在议会的最初几年一直呆在休·塞西尔的圈子里。正是在那儿,我生平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遇上了一位真正的保

^① 乔·张伯伦:即约瑟夫·张伯伦。英语名中“乔”是“约瑟夫”的昵称。

守党人。此人思想停留在17世纪以前,但却又有全副现代装备和现代才能。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这样说过:“有宗教天赋的年轻人必然早露锋芒。”因此,有这么一位资深的保守党首相的宝贝儿子,他满腹经纶,一跳进政治竞技场,就下定决心要干一番当时谁都觉得是区区小事、几乎没人感兴趣的事业。我刚进议会不久,他就拉我跟他一道竭力抵制一项准许鳏夫同他已去世的妻子的姐妹结婚的议案。其实刚开始我倒是认为这种事不仅情有可原,而且也算是合情合理的。一个带着四五个孩子的鳏夫常常会从他已去世的妻子的姐妹那里寻求帮助,以支撑起他的家庭。如果他真心爱他的妻子、喜欢他的妻子,那么他自然也会从他妻子的姐姐或妹妹身上找到那些当年曾令他着迷的许多特征。这样他们也就有了亲密相爱的基础。条件成熟时他们俩就会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许多幸福的家庭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可是当我对休·塞西尔勋爵谈了我的考虑后,他为我对象教规以及教规中深奥的道理如此无知感到震惊。他告诉我,基督教的真义就是为了让家庭之爱的范围扩展至最大,但决不能允许性问题掺合进来。有了这个教规,亡妻的姐妹不仅无需担心有流言蜚语诽谤她姐夫或妹夫,而且他们能够相互尊重,关系融洽,她能长期地、光荣地为自己可爱的外甥或外甥女尽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废止了这项禁婚令,那么在成百上千,不,成千上万个家庭里,这些本来不应受到怀疑的尽心尽职的女人就会成为人们评头论足、诬蔑诽谤的目标。这件大事,只是我们为维护仁爱的、文明的基督教社会秩序所应尽责任的一个例子。人一旦走上了下坡路,人的道德和理智一旦因看似有道理的纵容而滑坡,那么谁也挡不住异教和享乐主义的蔓延。在这个充满着飘忽不定的考验和抉择的世界里,这种滑坡有时可能会使某些

人感到舒心。然而,在无穷无尽的岁月里,这种现象将是致命的。

这些论点再加上他那生花妙语和火热的信念,诱使我于1901年在议会全体委员会上帮助休勋爵成功地长期阻止了《亡妻之姐妹议案》的出台。经过几星期艰苦努力,我们设法让那些议案支持者们——我们戏称他们为“议案促进者”,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支持议案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失利。我们有用之不竭的论点可以对付他们的议案,或至少我们有无限的力量去修改、润色或重复我们的论点。最后休勋爵又利用议会章程助了自己一臂之力,为此他被指控是在诡辩。对无公职议员的议案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这项令人生厌的议案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在时钟敲4下以前进行表决。大部分人肯定会赞成这项议案。当时,让所有下院议员走过会客厅去投票大约需要一刻钟时间。当辩论结束时,离4点还差18分钟。而休勋爵却在议会会客厅中漫步!同行的还有大约20名保守党人。令人吃惊的是我居然看到弱不禁风的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也在其中,他简直是在一寸一寸地爬着移向通往投票厅的大门。最后大约还剩15秒时,钟声响起了,而此时投票分组还未结束。这样,双方消耗了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见了分晓。这项议案夭折了,它的命运究竟如何则取决于来年的运气好坏了。

那些被粗暴地含沙射影了的激进派分子和非国教分子,他们被说成是希望通过牺牲基督教的利益让他们可以合法地与他们亡妻的姐妹维持不道德的关系。他们对投票时的这种策略恨之人骨,声称这种手段“卑鄙”、“骗人”、“不光明正大”、“不公正”。他们狂喊乱叫,当休勋爵再次回到议会厅时,要不是场内秩序太乱,他们可能真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然而,他以一个诚实者不屑一顾的神情迎接着这些人的胡说八道。他根本就没有

破坏当时规定的表决程序和规则,他只不过是行使自己在议会里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当然包括他可以在议会大厅里选择自己走路的速度。如果他的对手们忽略了这种自由的存在价值,并且轻率地在辩论时拖延时间以致没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投票分组,那他们是活该。当有关婚姻大事的性质问题危在旦夕时,他们居然还跟我谈什么“不要打板球”^①。

当问到究竟想把这一观点保持多久时,他说只要能不使用暴力,只要合法,他将尽可能长期地维持自己的观点。保守党必须尊重英国法律,要不然一切都没法运转。异教徒可能会拒绝交税,而房客也可能会拒付房租。许多重要的世俗的权利将会受到威胁。说什么“光明正大地比赛”之类的中小學生口头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不是在比赛,而是在执行我们神圣、庄严的权力。与永恒的存在相比,拥有有意识的选择权的我们只能在这个世界上停留片刻,并且我们的信念和行动必须永远受到审视。

我必须承认随着我的忍受力与日增强,我最终还是默认了一个男人与自己亡妻的姐妹的婚姻的合法性。而休勋爵的观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舒适、更放纵的社会生活,不得不被终止了,但是也许还有一天他的观点会再次冒出来。

所有跟我一样与劳合·乔治^②共过事的人,没有谁会不受到他的影响并留下很深的印象。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他看成是议

① 英文原文为“not playing cricket”,意思是“行为不公正,不正大光明等”。此语在本段开始已出现,此处休勋爵重复此语,表示幽默。

②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自由党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成战时联合内阁,承认爱尔兰独立。

会或政坛的代言人，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功，但是往往是在八九个人、或四五个人的秘密会议中，或是一对一的个人讨论中，他那如簧巧舌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他发挥到极至，他能让树上的鸟儿飞下地。对人性可爱的弱点的透彻理解以及一张口就知道对方立场的天赋、不用诡辩术进行推理并能娴熟地处理好问题的本领、突兀提出出人意料的观点却能让人安然地接受——这一切都是他所惯用的模式和方法。我曾亲眼目睹了他在10分钟之内让内阁转变了立场，而当这一转变结束时却没有人记得是他的哪个观点让他们改变了看法。

他精明地认识到了“被别人说服而改变了观点的人相信的依然是自己的观点”这句格言的真谛。在我认识他的那么多年里，他从未对自己所说的话百分之百满意过。他没有在文字上下功夫的癖好，他只考虑，并且不断地在考虑讲话能对别人起什么样的效果。事实上许多被他说服改变了看法的人，到最后坚信是他们最终改变了他！然而，在他的论点、判断力、实事求是的意见以及远见卓识背后深藏着真理。

他所具有的最令人难忘的本领是他的预见能力：当人们都在问下一步怎么走时，他已经看到了下下一步了。用狩猎上的话来说，他常常是抢在我们前面来到下一个狩猎场，我们只有跟在后面追赶的份儿。当我们下定决心从某处越过栅栏时，他总是大声喊道，“大家都能看到面前的障碍。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跨过那条运河，或那条铁路线呢？我们得过那座桥，或那边的道口，否则我们就会被甩掉。这就是说你们得奋力一跃，因为面前的障碍并非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这样说，他这一生中狩猎时从未带过猎狗。如果他天生就是个猎手而不是政治家，那么狐狸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样的人对我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1904年,我在下院离开了保守党后,站到了他的一边。我们在一起时不能说没有分歧和争吵,但总的来说,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几乎没有间断地共事了20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大师;在当时,没有哪个英国政治家具备他一半的处理人和事的能力。当记述20世纪前25年历史时,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我们的命运大多由此人左右。是他给正统的自由党的主张注入了全新的、充满活动的社会政策。他是所有定国安邦良策的源头。他使我们的财政制度坚定不移地走向了征收财产税的路线,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平等。在战争时期最黑暗的日子里,他掌握着英国政权,勇敢地领导人民取得了绝对胜利。是他最终解决了爱尔兰问题。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至少使爱尔兰问题不再是大英帝国的主要问题。这些事都已成历史,但现在有几股强劲势力对他毕生的工作提出了苛评,或至少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工作中的功过当然可以长久地争论下去,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的宏大气魄。

在某种程度上,有时我也影响过他;同样地,后来跟他共过事的贝尔福勋爵^①和伯肯赫德勋爵也都对他有过很大影响。我们经常能使他看到政治的另一面。年轻时作为一个激进的、爱唱反调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领袖,他成长于一个相对狭隘、俭朴的环境里,没有人要他考虑政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刚从战争的阴影里逃出来时,右翼政治势力对他进行了凶猛的攻击,如果这些攻击是完全正确的话,那么大英帝国和英国本岛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毫无疑问,他也有许多应受指责的地方。不

^① 贝尔福(1848—1930):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1902—1905)、外交大臣(1916—1919),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管怎么说,他和右翼的决裂是很彻底的。大家现在都知道,1922年的卡尔顿俱乐部会议彻底解除了这位令人惊愕的“实干家”与正统的、职业的右翼帝国主义势力,或如他们有时所称呼的“死硬派”的关系。保守党对这位威尔士英杰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而且用“诚实的鲍德温先生”替下了他。可是现在他们似乎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仍不满意。然而现在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战时的和平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大罢工的支持者领导了政府,保守党欢天喜地地暂时平息了下来。但此人千万别去冒犯保守党的政策,劳合·乔治是不可侵犯的。

悉尼街枪战

1910年12月17日上午,各家报纸争相报道了一则震惊英格兰的非同寻常的犯罪新闻。前天晚上10点半钟,家住霍兹迪奇的饰品店老板伊森斯坦因自家屋后有神秘的敲击声而惊恐万状。这些敲击声两个星期前就有了,警察也来调查过,而现在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并且很显然是从隔壁传过来的。伊森斯坦又派人去找来警察。一个由6名警察组成的小分队赶来了,两个人把守在屋后,一名中士带着其余3名警察来到那间被怀疑产生敲击声的屋子门口,敲了敲门。当时,所有警察几乎都有不佩带武器的习惯。有个男子将门开了条大约6英寸的缝。

“你一直在这里工作吗?”中士问道。

没有回答。

“你懂英语吗?这屋里有没有人会英语?”

这位男子关上门,留了大约有一英寸的缝隙,没有回答问题就消失在楼道里了。中士推开了门,走进一间有灯照明的房间,这儿看上去没有什么值得让人警惕的。中士只是想做一次例行检查,所以他站在那里等着。这成了他最后的等待。突然有扇门砰然大开,随之响起了手枪声,中士应声倒在门口。接着又是一枪,这次是从黑暗的楼梯上射来的,将正在往里冲的警察赶出了门。紧接着从那扇门里伸出了一支长长的全自动步枪,一串

连射在几秒钟打死打伤 4 名警察。此时从房屋内跳出一人,左右射击;外面只剩下身无寸铁、浑身是伤的乔特警官,他毫不犹豫地死死扭住杀人犯,尽管又身中两枪,他仍没松手,直到另一个罪犯又从他身后连射几枪,他才因伤势过重(共中 12 枪)倒下了。这帮杀人狂最后摆脱了守在屋后的第六位警察的追击,消失在伦敦的茫茫黑暗和车流中,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后来警察经调查发现,一场精心策划的抢劫案正在有计划地进行中,抢劫的目标并不是伊森斯坦先生家,而是紧邻的珠宝店,因为那里的保险柜里藏有价值 3 万英镑的珠宝。与珠宝店相连的砖墙几乎快要凿通了,在通道里,警察发现了用乙炔枪切割保险柜实施抢劫所需的所有工具。

第二天凌晨 3 点钟,有两名妇女请一名医生去为一位名叫乔治·加德斯坦的年轻人治伤,她们解释说,3 小时前他被一位朋友用左轮手枪从背后误伤了。此人的真名叫莫罗恩柴夫,正是他杀害了我们的警察中士。很可能在他同乔特警官扭打在一起时,有颗子弹穿过我们英雄警官的身体后又射进了他的肺部或腹部,他在天不亮时就断了气,留下了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一把匕首和一把小提琴。

以上便是这几天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的故事概要。很明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犯罪团伙,这种类型的犯罪在英格兰已有几十年没有见过了。罪犯手段残忍,消息灵通,枪法准确,配备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一切都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几天后有消息证实这帮杀人魔鬼是由大约 20 名来自波罗的海俄国的列特人组成的,他们在一个叫做“画家彼得”的人率领下,在伦敦的心脏安营扎寨。用句后来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是谋杀、违法和革命的“种子细胞”。这些凶残的家伙,“像野兽一样”生活着,整日策划着他们的掠夺方案和罪恶阴谋。尽管他们的

主要目的是实施抢劫和谋杀，但他们的行动又往往带有政治性。“画家彼得”在后来大战的混乱时期，成了借机吞噬和破坏俄罗斯政府和人民的野兽中的一员。

对这起令人发指的犯罪活动，全国人民都很气愤。伦敦警察厅动用了一切力量追捕这帮罪犯。身为内政大臣，我立即下令为我们的警察配备最好的全自动手枪。为那些以身殉职的英勇警官举行公葬。他们的灵柩上覆盖着英国国旗，停放在圣保罗教堂，伦敦的主要官员都参加了他们的追悼活动。

全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追捕罪犯，在搜捕过程中，有了下面这段小插曲。

元月3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家洗澡，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内政部打来了紧急电话。”

我顾不得擦拭，裹着浴巾奔向电话，得到了下面的消息：

“谋杀我们警察的匪徒已被包围在东区——悉尼街100号的一幢房子里，他们正用全自动步枪向我们的警察开火，已经打死了一名警察。看起来，他们有充足的弹药。我们希望得到增援部队并给予逮捕或击毙他们的授权。”

我立即给了他们答复：授予他们一切必要的权力，命令警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大约20分钟后我赶到了内政部，我的首席顾问欧莱·布莱克维尔先生告诉我，除了知道这帮无政府主义者已被包围、正在四处射击外，没有其他更新的消息。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罪犯，也不知道警察将采取何种措施。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责任亲临现场，而我的顾问们也都同意这么办。当然，我必须承认我这么做除了是责任的驱使外，还有我那极强的好奇心在起作用，尽管此时人们必须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

我们立即登上一辆汽车出发了。汽车沿着斯特兰德大道，穿过伦敦市区，驶向霍兹迪奇，快到中午时，车子在一个堵塞着很多车辆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周围是一大群既愤怒又惊慌的人们。我注意到首都警察们全都一反常态，佩戴着匆匆从各地方军械库领来的短枪。周围群众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好，我听到有人在喊：“谁让他们进来的？”很明显这是针对自由党政府对外国移民入境政策所采取的宽松态度发泄不满。就在此时，在离我们大约二三百码远的地方响起了枪声，一枪接着一枪，最后是连续不断的枪声。在一位检察官的陪同下，我们穿过一条空荡荡的街道，拐了两个弯，前面是一群警察，其中有几个人佩着武器。还有不少围观者和记者也站在了只允许警察进入的警戒线内。右边拐角处有一条街与我们这个地方相交。在这条街左前方50—60码处便是那群谋杀犯负隅顽抗的房子（100号）。在我们的正对面还有不少警察、警察厅工作人员和围观者蹲在建筑物的凸凹处。从街道的两边、街道上以及数不清的窗户里，警察和其他人员正在用步枪、手枪和滑膛枪向藏有那群亡命之徒的房屋进行猛烈射击。每隔一两分钟，从房屋里会发出回击，有时射向街道两边，有时射向房屋正前方的街道。子弹打在砖墙上后四处弹飞。我们对这种场面是太熟悉了，这种巷战的场面在欧洲大陆早已失去了吸引力。然而在人们的记忆里，在平静、守法、舒适的英格兰，这种场面还从来没有见过。因此从这点来考虑的话，至少可以说我不虚此行。

然而情况几乎一下子尴尬起来。有几位警官迫不及待地想立即用他们的手枪将这幢房子夷为平地，但其他人却认为最好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再造成人员伤亡。我没有责任在此发号施令控制局面。当我坐在内政部办公室时，我可以下达任何命令，并且命令立即就会被执行。然而到了现场，我不应该干涉现场

指挥官的活动。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因为我的权力远远大于他们中的任何人,我也就不可避免地想承担起我应尽的责任。我现在明白了,如果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我可能会更好地做好我的工作。可是话说回来,我现在也不可能钻进汽车、离开现场,因为现场情况变幻莫测,而且又是那样有趣。

因为急于想对被包围的房屋有更清楚的了解,我穿过了街道,躲在房屋对面一家五金店的门廊里。在此我见到了伦敦医院院长纳茨福特勋爵,我们俩一道观看了这场戏的最后一幕。

对这幢房子进行围攻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隐蔽在隔壁房子里的一个小分队将冲向前门,然后用火力封住楼梯口;另一个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分队将从后面的窗户冲入三楼实施突袭;第三个小分队将揭开房顶,直捣黄龙。这套袭击方案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会造成我方的人员伤亡;因为我方人员不仅会遭到这帮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击,而且在混战中也会出现误伤。凭直觉,我认为应该用一块钢板或钢甲作为掩护,从楼梯向上突击。事实上有人正在附近的铸造厂里寻找一块合适的钢板。可是就在此时,问题自行解决了。大约在一点半钟光景,从被包围房屋的顶层破碎的窗户里冒出一缕青烟,不一会儿房子就着火了,火势很猛,一直向楼下蔓延。人们可以听到着火木柴的噼啪声和熊熊烈火的轰鸣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向楼下节节撤退,不停地射击,子弹打到了周围房屋的墙体上和人行道上。

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却能让我发挥作用的事情:在离这块危险地带仅几英尺远的地方,英国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依然如旧,事实上正在上班的邮递员当时还为那幢房屋的近邻送过信。突然,随着一阵骚乱和喧嚷声,驶来了一支消防队,将那些正在走向现场的人群驱散,并且将消防车径直开进了临近危险区的警戒线内。有位警官企图制止消防车继续前进,而消防官

员则声称他的职责便是将消防车开进去。烈火在燃烧,扑灭大火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伦敦消防条例中没有提到无政府主义者、全自动步枪、危险区这些东西。当这位警官指出他的人会受到袭击时,消防官员只是淡淡地说命令就是命令,他无权选择。正当气氛很紧张时,我及时介入,解决了矛盾。我以内政大臣的身份对消防官员说,那座房子就让它烧着吧,他的任务是站在一边,随时准备阻止大火蔓延至邻近房屋。然后我又回到了马路对面的有利位置。

大火现在已经烧到了这幢突遭厄运的房子的底楼,里面很久没有向外射击。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条件下在那里呆多久,人们都期盼着看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拿着手枪从里面向大街上突围。上百支步枪、左轮手枪和短枪都一起瞄准着那熊熊燃烧着的房屋入口。时间在紧张和兴奋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火弥漫着整个底楼,最后大家明白过来,这伙恶魔已全部被烧死了。突然,受本能冲动的驱使,所有的人都是从暗处走到了明处,一位探长快步走到了屋门口,一脚踹开了门。我紧随其后,身旁有个佩着双筒滑膛枪的中士陪护着我。这幢建筑里现在除了烟和火以外什么也没有。消防队员们拿着水管迅速冲进空荡荡的大街,后面紧跟着一群士兵、记者、摄影师和围观者。现在已经是3点钟了,消防队员正在扑火,警察们留下来清理现场,而我则回家了。

这次枪战除了上午有一位警官以身殉职外,还有一名近卫军中的黑人中士和3名平民受了伤,另有一名警察中士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受了轻伤。到目前为止,除了那位警官和那几位杀人魔鬼外,没有其他人在枪战中丧生。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呢!一堵倒塌的墙使我们的5名消防员受了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在悉尼街的这座废墟里人们找到了两具烧焦了的尸体:一个是

被英国的子弹击毙的,另一个很明显是窒息而死。最后验明他们一个叫做弗里茨·斯瓦斯,另一个叫雅各布·沃格尔,都是“画家彼得”无政府主义者帮中的成员,两人都与上一次枪杀警察案有牵连。另外在废墟里还发现了1支勃朗宁枪、2支毛瑟手枪、6箱炸弹以及许多子弹。

悉尼街枪战就这样结束了。至于“画家彼得”本人,警方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线索,他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不断有谣言说他是个俄罗斯布尔什维克解放者、俄罗斯救世主,但这毕竟只是谣传。

当时伦敦的党派之争正值高潮,我因加入了这一奇特的事件而受到报纸和议会的严厉批评。下院的贝尔福先生对我的批评尤其尖刻: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用非常严肃的语调说,“这些画报上刊登着我们的内政大臣在危险区探险的照片。我理解摄影师为什么会这么干,但我不懂我们的内政大臣为什么要那样干?”

以上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回忆,我想还是就此搁笔吧。

德国之辉煌

1906年,我任殖民部次官,收到了德国皇帝^①的邀请,作为贵宾参加他们在西里西亚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德国陆军军事演习。经英国政府批准后,我于9月初启程前往布雷斯劳^②,到达后与其他帝国宾客们一起住在舒适的、古色古香的金鹅饭店。这次演习的规模很大,动了一个完整的陆军军团和一个按战时规模设立的机动师。所有一切安排都体现出德国人的高效率,就连最细微的地方也都被认真地考虑到了。大批宾客,包括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代表,都按照不同的官衔受到了应有的礼遇,就连德皇的私人贵宾也不例外,对他们的接待既体现出他的好客,又体现了公事公办的味道。这一周尽管过得很痛快、很有意思,但也很辛苦。除了在服役时曾有过这种经历外,我生平从未像这一星期这样感到睡眠不足。每天晚上都有盛大的宴会,有时是德国皇帝亲自主持;如果他在演习现场不能出席,那么就由皇后主持。我们要到快午夜时才能上床睡觉,而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就得起床,登上专列前往战场上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① 指威廉二世(1859—1941),他是普鲁士国王,于1888—1918年间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推行侵略政策,1897年强占中国的胶州湾,1900年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被迫退位,逃往荷兰。

^② 布雷斯劳: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的旧称。

观摩点：在此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抗演习双方的全貌。东方的天空才有点泛白，我们便可骑上马匹随便转悠，每人都有一名德军总参谋部指派的军官陪同。当我们骑着马进行了10—12小时的演习观摩后，我们又得登上专列驶回布雷斯劳，赶紧换好礼服参加下一场宴会，接着是帝国军营熄灯号，又是短暂的睡眠，下面又是凌晨4点钟登车出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安排。

德国军队的威猛及其帝国的辉煌，绚丽多彩地展现在外国来宾的眼前。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几个场面颇能说明德意志帝国的繁荣和强大。当德国皇帝身穿白色的西里西亚骑兵服，容光焕发地走在骑兵队的前列，穿过布雷斯劳的街道时，他忠实的臣民像发疯似地欢迎着他。道路两旁站着的不是军队，而是来自贫苦阶层的成千上万的老人，他们一个个都认真地穿着传统的黑礼服，头戴高帽。这些都是些退役的老兵，对他们来说，能遇到这样的场面是他们的殊荣。事实上使人黯然神伤的平民的力量与穿着白色军服的德皇和他的骑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军事演习开始前举行的阅兵式上，有5万名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的仪仗队整齐地走过了德皇和他的一大群红光满面的国王和王子们面前。那由整团整团步兵组成的方阵，似乎不是血肉之躯组成的，而是大西洋上的惊涛骇浪。掀起滚滚尘云的炮兵方阵、成排山倒海之势的野战炮方阵以及那时的新鲜玩意——由私人 and 军用车辆组成的汽车方队结束了这次阅兵接力赛。遮天蔽日的盛大场面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然而这里展示的只是可供德国陆军调遣的兵力的二十分之一；在德意志帝国的任何一个省，随时都能进行相同规模的阅兵式。我不禁想到了我们英国陆军的渺小，能在奥尔德肖特举行一场由一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旅组成的阅兵式就已经是件了不得的事了。我时

不时地看一眼骑马立于我身旁的法国武官，他一脸沉思、忧郁的神情，不难猜出他此时在沉思什么。整个现场的气氛弥漫着永不疲倦、精神抖擞的人气和威武的甲冑气，将全世界的雄伟气势和武装力量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比这场面更令人惊骇、令人震撼。

举行阅兵式的当晚，德国皇帝设宴款待他的下属。有三四百名西里西亚的达官显贵与身穿五颜六色的军服、挂着金丝带或饰品的外国客人们一起相聚在一个宽敞的大厅。德皇跟往常一样轻松地用他那不容置疑的威严的口吻首先讲了话，坐在我旁边的德军参谋用流利的英语一句一句地轻声翻译给我听。那是1906年，正好是耶拿^①之战100周年。“100年前，”威廉二世说道，“德国跌进了亡国的深渊，我们的军队连打败仗、溃不成军；我们的军事防线被摧毁，我们的首都沦陷于敌军之手，我们的国家从此四分五裂，被异族人统治多年。”这一切仅仅是100年前的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短短一个世纪之后，短短的四代人的光景，我们却用敬畏的目光亲眼目睹了一个国家又完全恢复了它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恢复了它的力量和政体。1806年和1906年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的对照啊！如果将穷兵黩武的德国的综合财力与900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外族入侵、在谦恭和自省的慢节奏中生活的英国相比，那也将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如果撩起未来的面纱，人们将会发现最令人惊讶的对照将是：在短短的10年之内，德国便又从成功走向了毁灭、失败和投降，并且这一次的打击比100年前在耶拿所经受的打击更彻底、更持久。

尽管这次军事演习从规模上来说气势恢宏，但有识之士还

^① 耶拿：德国南部一城市，为1805年普法激战战场。

是能发现不少问题。和少数几位应邀前来的坐在不同观看台上的英国军官一样，我在南非草原上对步枪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有着鲜明的现代感受，至于万枪齐发能造成多大的威力，我们只能借助于自己的想象力了，然而就连发步枪的威力而言，我们所具有的实践经验远比这些趾高气扬的德国人要丰富。我们吃惊地看到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士兵排成纵队，冒着从几百码外树林边的战壕里一齐射出的空壳子弹向前迈进。当对抗的双方已经近在咫尺时，双方的士兵在相距 50 码的各自阵地卧倒，这是演习的高潮。他们挤在一起，枪已上了刺刀，前排的士兵在互相猛烈地对射着。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当冲锋命令下达以后，这些非常平静地卧倒在地的方阵全部站了起来，然后端着他们已上了刺刀的步枪相互非常熟练地穿插了过去，而士兵们则像是完成任务似地相互脚抵着脚躺在地上。不管怎么解释，这与现实中的战争简直一点联系也没有。除了在南非的经历，恩图曼^①之战我仍记忆犹新，当时德尔维希^②军队的密度远小于德国演习军，我们与敌军之间的射程也远远超过这次在演习中所看到过的任何一次射程，但是我们几乎不损一兵一卒就消灭了 11000 多名德尔维希人。恩图曼之战过后我们曾对自己说：“这种战争场面今后再也不会有了，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傻的敌人了。”

对现代战争的模糊认识已经逐步渗透到了德国军队。我们跟随演习队伍策马向前，周围是密集的步兵阵列，他们用至少 100 门大炮和成千上万支射着欢快的不具杀伤力的子弹的步枪

① 恩图曼：又译“乌姆杜尔曼”，苏丹中部城市。

② 德尔维希：指 1880—1885 年追随苏丹玛赫迪反对英埃统治的上埃及和苏丹的部落成员。

进行攻击。我注意到了与我们同行的德国军官脸上的难以掩饰的不安神情。一位率着自己的团队、全副戎装的公主，带着王者气度，气愤地“咆哮”道：“真是蠢猪！”“简直就是疯子，这些将军应该统统撤职”等等。但总的来说，一切都是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着。

整个演习的大结局是：德皇亲自统领着三四十个骑兵中队冲向敌军战场中央的一字排开的长长的野战炮阵地。我们都欢天喜地地策马紧随其后，不一会儿骑兵的浪涛就漫过并且扫除了本准备对付他们的面目狰狞的小小火炮。当演习裁判非常忠诚地宣布炮兵输了时，我们问在场的炮兵军官：“你觉得这结果怎么样？”他回答说：“结果当然很好，这些大炮本来就属于陛下，他为什么不能缴获它们呢？我们能为他效劳是我们的光荣。”但他说这话时却挤了一下眼睛。

当宣布“停火”的军号声响彻平原后，那些德军参谋与他们的战争元首聚集在一座小山头上，他们身后的一群身穿绿色军装的士兵正快速地为他们搭建一座充当战地军事指挥部的小木屋。德皇习惯性地真诚而自如地欢迎着他的私人来宾，这更增加了他的魅力和名望。他和他的外国客人们自由地交谈着，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英国乡村游园会中好客的主人。而他周围那些穿着笔挺军服的将军、副官却像脚下生根似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你觉得美丽的西里西亚怎么样？”他用流利的英语问我，“美丽的国土，不是吗？很值得为她而战斗，并且，”他接过我的话说，“我们曾为之浴血。这些战场都洒满了我们将士的鲜血。那儿，”他指着远处的一个小镇对我说，“曾是腓特烈战斗过的地方。而下边那儿，”他又指了指被树林覆盖的山谷，“那就是卡茨巴克溪谷，1813年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击败过法国军队。”我当时想到什么就对他说什么。然而他接着问我，“你在这儿想看的都

看到了吗？我希望你在这儿能够自由地看到一切。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你想看还没有看到？你看到过我的新式大炮了吗？”我说我从远处看过它的英姿。“噢，你得走近瞧一瞧。”说完，他转向一名军官说，“带他去看一下我们的新炮。那边就有一个炮兵连。让他看看我们的新炮是怎么使用的。”他非常优雅地挥挥手打发了我。当我离开这群高层军事领导人时，我听到他们似乎在窃窃私语，对此举表示不满。

当我们到达炮兵连后，皇帝的副官与炮兵指挥交换了意见。然而在帝国的尚方宝剑面前，再不情愿也没有用。大炮露出了真面目，炮尾的门也打开了，炮手进行了装炮弹和发射的演示。我有意让他们知道我并不想深入研究下去，因此例行公事地行了个军礼之后，我们便离开了炮兵连。这些德国军官根本就无需担心什么。他们的皇帝深知我不是个火炮专家，虽说巴黎和伦敦的国防部对这些新型野战炮还很陌生，但让我粗略地看上一眼，我根本了解不到什么东西。然而他却在我心目中留下了这么一种印象：他不仅是这些威力无穷的战争机器的拥有者，而且可随心所欲地让那坚不可摧的军事组织随时听他指挥，这种印象并没有令人不快。

直到3年后我才再次一睹德国军队的风采。我还是德皇的客人，而这次演习的地点是在巴伐利亚的维尔茨堡。这几年很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变化，欧洲的前景已明显的暗淡。德国海军的崛起使它成了英国海军的头号对手，英国海军部和德国海军部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英国和法国的利益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①革命已经在东南欧启动了欧洲动荡的列车。我当时是内阁成员，任贸易

^① 青年土耳其党：即1908年执政的土耳其统一进步党。

委员会主席——在德皇的请柬上被称作“贸易大臣”。1906年我到德国时，德皇兴奋地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有关殖民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西南非洲德国殖民地的土著人暴动问题。而到了1909年，我只跟他很简短地说过几句话。这次他避而不谈有关军事或其他重大问题，而是将话题定在劳合·乔治的预算以及其他英国内政问题上，并且他似乎对这些情况非常熟悉。尽管后来我与德国军队还有接触，但如果不算后来送别时的客套话，这次交谈成了我与德皇的最后一次谈话。

维尔茨堡演习反映出德国在军事战术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最明显的是步兵的组合更现代化、更适合于实战了，西里西亚演习上的荒唐行为已荡然无存，几乎再也看不到密集的士兵群了。而炮兵连也不再是直线摆开，而是分散于最必要的位置上。骑兵部队几乎已见不到踪影，只在远处的两翼偶尔出现。步兵在行进时被分成一个个连续的小分队，机枪的使用已随处可见。在英国人眼里，这种布局在现代战争中仍稍嫌紧密，但与1906年相比，他们已有了惊人的进步。我相信，这次演习中的布局和打法实际上就是5年以后德国在大战中采用的方法，后来证明它的实用性远比他们的对手法国军队的战术高出一截。

我在德国看到的另外一次阅兵式是1919年，当时我作为陆军委员会首脑访问科隆，但从面前走过的是4000名以绝对胜利者姿态出现的英国士兵。当我1909年离开维尔茨堡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会看到这种场面，当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真是太疯狂了。

土耳其革命所造成的反响已经在德国的军事中心维尔茨堡有所反映。青年土耳其党国防大臣马默德·谢夫凯·帕沙以及恩维·贝伊都是德国总指挥部邀请的贵宾，然而等待着他俩的都是悲剧命运。谢夫凯不久就在君士坦丁堡遭到暗杀；而恩维在他

那颗勇敢无畏的心脏停止跳动和充满激情的身躯倒下之前走的也是一条充满艰辛、恐怖、罪恶和灾难的坎坷之路。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次维尔茨堡军事演习简直就像是一幅伯沙撒^①宴席的图画。那些曾在秋日的阳光下行过军、骑马散过步的人中,有很多人在后来都遭到了厄运!对一名普通士兵来说,等待他的将是比自然死亡、贫困、残废和绝望更糟糕的命运,对军官们来说,等待着他们的也将是比屈辱和降低军饷更可怕的命运,这命运就是暴死、毁灭和蒙受耻辱。如果我们能看到命运的话,这种命运正笼罩在那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男儿的头上。德国所有的国王们、王子们,还有将军们都簇拥在宴席桌旁。10年之后,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有的四处逃亡,有的被放逐异国他乡,有的被废黜罢官,有的由富变贫,还有的过着含羞忍辱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被卷进了一个他们无法摆脱的致命的体制,成了牺牲品。至于说德国皇帝本人,这个聪明伶俐但被命运宠坏的孩子,整个欧洲的人都嫉妒他——当他的一连串希望和梦想都令人心碎地破灭之后,在失败的打击和无尽自责的煎熬中,他将会穿过受他蹂躏过的欧洲走向多恩的断头台——那儿等着他的当然是最严厉的惩罚。

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和恩维成了不错的朋友,这位相貌英俊的年轻军官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冒着生命危险凭着他的胆略扫除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②的专横统治,他也一跃成为土耳其的民族英雄,并且可能成为土耳其

① 伯沙撒: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国王,酒宴时墙上突然现出警告他要失败的字迹。故事见《圣经·但以理书》。

②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42—1918):于1876—1909年建立奥斯曼苏丹,实行专横恐怖统治,1909年遭废黜。

命运的主宰者。言谈中他对巴格达的铁路建设显得很感兴趣，而我负责的贸易委员会正好与此有关。作为贸易大臣，我对这件事非常熟悉。直到演习的最后一天，我们才有机会聊到这件事。在演习闭幕的隆隆炮声中，我们俩骑着马单独在一起谈了1个小时。我们谈得很深入，交谈的角度也与德国人的观点不完全相同。此时我们突然注意到走在我们后面的皇家掌马官的那匹马似乎很不听话。这匹马有四次明显失控，驮着它的主人一直蹦到了我们身旁，有时冲到我们中间，有时跑在我们左右，直到最后我们跟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他必须走在后面，掌马官这才为自己的笨拙之举表示道歉。而这位年轻的土耳其领袖、这位刚刚获胜的政变者的脸上则显出了一种既坦率又深表理解的微笑。我们无须相互猜疑。

要是英国政策的主线与土耳其人的合理愿望相一致的话，我敢肯定我们一定能与恩维·贝伊合作得很愉快。然而在这世界悲剧中，很多人都成了被命运摆布的傀儡，很多事情最终都无情地走向了毁灭性的大灾难。

我的间谍故事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他们患有“间谍狂”症，只要一听到有关于间谍活动或反间谍活动的事，他们的心就躁动不已。大战时期是各国此类能人大显身手的黄金时代。再离谱的怀疑也会受到重视，绝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也会有人相信。成千上万名非正规的业余侦探干劲十足，随时随地加强着公务机关的警惕性。毫无疑问，这些自发活动发现的许多事情纯属子虚乌有，给很多人带来了不应有的伤害，但总的说来它们是构成安全的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每个人的行动背后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大街上、公共汽车上，火车上、剧院里，甚至在饭店和小酒馆里，人们毫无防范的交谈都会被监听；对那些非英国姓氏或娶了外国人为妻的家庭，人们不遗余力地调查着他们远至第三、第四代的家谱。在空袭期间，人们的愤怒和恐慌达最高峰，即使有人划一根火柴也逃不过警惕的目光，从未挂好窗帘的窗户里漏出的一丝灯光会被迅速报告给警察。全社会就是这样保卫着自己，以不受暗藏危险的侵害。

上层情报部门的工作中接触的很多案例，实际情况完全可与最富想象力的浪漫故事或情节相媲美，其中充斥着案中案，计谋和反计谋，阴谋和诡计，欺骗与反欺骗，真间谍、假间谍和双重间谍，金钱和武力，炸弹，匕首，甚至真枪实弹的交火，这一切错综复杂，微妙无比，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是千真万确。情报机关

的领导和高级军官们凭着他们冷酷而无声的激情,在这些地下迷宫里和战争的炮火声中疯狂地工作着。报界曾不停地、不遗余力地散布这样的理论:自由党执政期间的英国佬是头脑简单的多愁善感之辈;他们粗心大意,又缺乏深谋远虑,在欧洲大陆的阴谋诡计面前随时可能上当受骗。这种理论也许起了作用。事实上,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在大战期间,与其他国家(包括敌国、协约国和中立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反间谍方面还是在搜集敌人情报方面,英国情报部门的工作是最有效的,其胜利是最辉煌的。

下面是我唯一亲身经历过的间谍故事。

1914年9月,北部军港的局势让我们极为不安。在我们的海峡一侧,所有有防波堤的港口都停泊着战舰,所有的通道都布下了渔网和水栅,这样不仅可以阻止敌人驱逐舰和潜水艇的进入,而且也可以防止鱼雷的攻击。可是现在英国舰队正在向北转移,因为罗赛斯港尚未建成,所以舰队主要停泊在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或稍南一些的克罗马蒂湾。大战爆发时,对这几个北方港口能造成威胁的只有驱逐舰。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星期,临时安放的水栅和临时组建的炮队就足以自卫了,可是到了9月份以后,人们担心潜水艇进入港口并对静栖于此的船只发动进攻,因此每个有责任心的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它就会在每个人的意识里不断膨胀。警报声会无缘无故、不分昼夜地响个不停,根本就不存在的潜望镜也被人发现了。大英舰队不止一次地离开了那本该是绝对安全的海湾,航行到广阔的海面上以求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北方港口加紧布置反潜水艇渔网,另一方面大英舰队被要求不定期地频繁改变停泊地点。于是我们的保护神、我们战时赖以生存的巨舰不得不到处找临时栖身之地,一会儿在北,一会儿在东,有时

甚至驶到苏格兰西部。保证它们安全的唯一条件是不能让敌人知道它们究竟停在何处,并且在某处停泊的时间不能太长,以免被敌人觉察。我们也因此度过了特别紧张的一段时期。

我因为要与海军总司令讨论这些情况以及其他一些紧急问题,于是有了一次拜访英国舰队的机会。在处境艰难的9月中旬一个晚上,我与海军部的几位高级军官和技术专家一道登上了伦敦的一列专列。拂晓时分我们的列车在苏格兰高地的某个小站停下了,从这里我们还要坐车行驶50—60英里才能到达位于西海岸的舰队栖身——或者说是躲藏——之所。尽管它们所躲避的危险被我们的想象扩大了,但危险是实在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们登上了开往海湾的汽车,同行的还有我的海军部秘书,情报部长(即现任舰队司令亨利·奥利弗爵士),还有一位海军准将,即后来赫赫有名的雷金纳德·蒂里特爵士。在风景秀丽的苏格兰高地上驱车是十分迷人的。汽车在疾驶,清凉的空气和变幻着的景致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彼此很少交谈,各自想着要与总司令讨论的问题,突然,与情报部长一起坐在后排的海军准将说道,“瞧,那儿房顶上有台探照灯。”他说话声音很响,连我都听到了。“什么?”我边问边转过身,顺着两位军官的目光望去。可是我还没来得及看一下是什么东西,汽车已来了个急转弯。不管那是件什么东西,它已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长官,是一盏探照灯,”准将说道,“就安装在那边的一座屋顶上(伴着手势)。”我得解释一下,探照灯是一种如大鼓般大小的玩意儿。

“是吗?!”我说道,“在苏格兰高地的腹地,这不大可能吧!”

“长官,”准将说,“我一眼就能认出那是探照灯。”

“嗯,这东西能派什么用场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装探照

灯呢？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将军？”

情报部长对此事一无所知，但他肯定这玩意对英国海军没有什么用处。此外，两位军官都坚信他们看到的是探照灯。

在战争时期，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需进行调查，而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在剩下的行程中我们绞尽了脑汁，但谁也没能想出一个合理的或者说没有害处的解释。

最后，道路绕着紫色的山冈向下蜿蜒，展现在我们眼底的是——一片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湾。在蓝色的海水里整齐地停泊着20艘无畏级战舰^①和巨型无畏级战舰，犹如排列在作战沙盘中的模型，它们是英国在海上保持领导地位的依靠。几十艘小型船只在它们中间和周围穿梭不息。这些战舰全都漆成了奇怪的斑驳色，这也标志着军事伪装的开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突现在眼前的全景，无比雄壮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没有一座房子，没有一座建筑物，只有秀丽的山冈和悬崖从两边直插大海。在这一片孤寂、狭窄的水域聚起了一座飘浮的钢铁之城。我们的生命、自由，甚至可以说全世界的自由，每分每秒都依赖着这座城市里三四万居民的力量、忠诚和勇敢。昨夜这里还不见一艘船只，明天这里可能又会成为一片空荡荡的海湾，可是今天，在这海湾的怀抱里栖息着世界大战中最重要最强大的战争机器。

“如果德国皇帝看到了这一切，”我对同伴说，“他会怎么办呢？”

“如果他想要干成什么话，”准将说，“他得先将消息送回去。”“然后，”将军接过话茬，他是个重事实和数据的人，“他得花上大约48小时才能赶到这儿。”“可是，”我固执己见，觉得自

^① 无畏级战舰：取自英国1906年建成的该型第一艘战舰名。

己比较清醒，“如果一艘潜艇潜伏在那些岛屿的后边，或者一架飞艇从上空飞过并发现了舰队，难道它不会认出舰队并实施袭击吗？”我得到的回答是，“白天，飞艇会被我们发觉，我们的舰队会驶入大海；到了晚上飞艇又看不见我们了。沿着海岸线到处都是海湾。”

“假设岸上有个间谍给飞艇发信号，而飞艇未飞到海湾就已将信号发给了潜水艇，”我执拗地说。“假如，比方说，”将军回答道，“某人用探照灯……”

后来我们登上了“铁公爵”号，整个上午我们都关在会议室里与约翰·杰利科爵士和他的海军将领们一起讨论军机大事，直到中午在旗舰上用餐时才有机会谈些轻松话题。有人提起了离此40英里处的鹿苑里有座像是狩猎屋的屋頂上有探照灯的事情。

“今天上午我们看见了一个很可疑的东西，”我半认真地对总司令说，“你自己对此有何看法？”

“那东西在什么地方？”

我的同伴将大致的方位描述了一遍。总司令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停下来想了片刻，然后说，“这里面可能有文章，我们已经听到关于那个地方的不少谣传。”他说出了那处狩猎场的名称。“据说那里有不少外国人。我们曾接到报告说，战前曾有架飞机在那里失事，后来有人在那附近曾见到过，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不管怎么说，”他又说，“他们要探照灯干什么用呢？”

我对情报部长说，“根据《王国国防法》，你有特权，对不对？”“您是说，”他回答道，“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可以顺便前去检查一下。”我说：“如果有半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我们就可以查出那盏探照灯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了。”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但是离开前我们从“铁公爵”号军

械库锁了4支手枪,并把它们放在车座下面。当晚,汽车在山路上疾驶,我禁不住想,也许我们遇到大麻烦。假如最坏的假设成立,假如那探照灯的确是敌人的信号灯,假如这苏格兰狩猎场果真是那些妄命徒或德国间谍的老巢,那我们就可能会受到伏击。然而,怀疑和好奇心相伴而来,而冒险的刺激又为之火上加油。

“现在我们该快到了,”准将说,并要求司机减慢车速,“大门应该在那边树丛里,今天早上我记下了。”

“我们最好还是下车,”我说,“然后步行过去。万一出了什么事司机也可以马上回去汇报。”于是我们将手枪装进口袋,顺着车道步行,大约走了二三百码远就到了入口处,里面有一座很大的石头房子,屋后竖着一座高大的塔。我们拉响了门铃,应门的是一个身材魁梧、很体面的男仆。我的3位同伴都穿着海军制服,所以这位仆人对这种造访显得很吃惊。

“这房子的主人是谁?”我们问。男仆报了姓名。“你的主人在家吗?”“在家,长官,”男仆回答道,“他正在和宾客们一起共进晚宴。”“请转告他有几位海军部的军官想马上见他。”

管家走了,我们推门进了大厅。

等了一会儿,餐厅的门开了,里面喧闹的说话声也戛然而止,从里面走出一位满面红光、头发灰白的绅士。他——可能有点不安吧——问道:“有什么事吗?”

“您的塔上是不是安装了一盏探照灯?”将军问道。

在此我必须补充一句,到现在我还是对探照灯的存在表示怀疑。如果那儿真有盏探照灯,我除了能将他与叛国二字联系之外,想不到其他理由。因此当我听到下面的回答时,我真的很吃惊。

“是的,塔上是有盏探照灯。”

“什么时候安装的?”

“很久了，我想，该是二三年前吧。”

“你装探照灯干什么？”

“是谁让你们到我这儿来的？”主人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权利要我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完全有权，”奥利弗将军回答道，“我是海军情报部长，法律赋予我对任何可疑的情况进行调查的权利。现在你能否立即回答我们，你装那盏探照灯有什么用处呢？”

“嗯，”主人说话时，眼睛盯着我，“我认识你，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现在的问题是，”我说，“你要那探照灯干什么用呢？”

一阵紧张的沉默，然后这位老绅士回答道，“我们用它来找山坡上的猎物。从塔上我们可以看到狩猎区；探照灯的光会在鹿的眼睛里产生反光，我们就知道猎物的藏身之地，然后早上我们再派人去寻找猎物。并且，”他补充说，显然很乐意谈这话题，“探照灯能帮助我们区分家畜和鹿，因为家畜的眼睛发出的是白光，而鹿的眼睛发出的是绿光。”这种既不可能也不可信的解释更加深了我的怀疑，我想我的同伴肯定也有同感。不管怎么说，我们对他的话不置可否。

“我们想看看探照灯，”我说，“我们想让您亲自领我们去。”

“当然可以，”这位很不情愿的主人只好这样回答。“你们得爬旋梯才能到塔顶。”

“你在前面带路吧。”我们说。

他打开了通向大厅外面的门，我们看到了石头砌成的楼梯的几个台阶。为防止耍花招，我们进行了军事部署。海军秘书长呆在塔底楼梯口，将军、准将和我则跟随老绅士爬旋梯。不管怎么说，我们一有人质在手，二有岗哨在下，三有门外可与强大无比的后备军联络的司机。

这塔真高，楼梯转了好几圈。最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塔顶。塔顶平台很宽敞，周围有低矮的护墙，探照灯就摆放在正中央。其大小相当于24英寸的驱逐舰探照灯，竖在那儿直冲塔尖。据我们所知，这东西完全另有用途。

“您认为我们会信您编的故事吗？”我问这位老先生，“您真的是用它照射远处山坡上的猎物，并根据它们眼中发出的光来区别鹿和家畜吗？”

“不管你们怎么想，事实如此。”

“您必须向有关当局解释清楚。我们现在先把这探照灯拆掉，以免坏了事。”

“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回答道，显然非常气愤。

“我们马上就拆，”我说。我们立即动了手。

接着我们带着各式各样的机械部件下了楼。与主人闷闷不乐地告别之后，我们登上了停在大门外的汽车。

我所讲的故事与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事情的结果在我看来真是太不寻常了。中央和地方的情报部门经过最严格的调查也没找到一丝值得怀疑的理由。探照灯4年前就安装在那儿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搜索远处的山坡。众多证据表明，自开战以来，这盏探照灯从未被使用过。当我们前去检查时，当时探照灯已不能使用了。房子的主人是位声誉很好的绅士，并且绝对是个爱国分子。他的客人也都是些德高望重的人。无论是他屋里还是他的庄园里都找不到一个外国人。在“铁公爵”号上听到的关于一架飞机在此失事的谣言也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周围的人从未见过来历不明的飞机。除了那盏探照灯和与探照灯有关的解释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值得人们去怀疑。

尽管这次夜间的突然造访和我们表示出的怀疑可能会令城

堡的主人很气愤,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战争期间,许多比此事简单得多的事情曾经给很多其他人造成了远比拆掉探照灯大得多的不便。然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如果下次我遇到类似情况,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同样行动。

在近卫军中的日子

当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达达尼尔,并放弃寄托在达达尼尔战场上的希望,当加利波利大撤退迫在眉睫时,我觉得有必要放弃他人的忠告,决定加入陆军。我请求加入近卫军团,他们当时正在法国征战,驻地与布洛涅^①不远。其时正值一大批度假归来的军官们从停泊在这个法国港口的汽船上下来,突然我听到一名登陆指挥官在叫我的名字,他告诉我说总司令约翰·弗伦奇^②爵士派车接我到他的司令部去一趟。当年约翰爵士在南非时与我有过隔阂,但多年来我们还算是好朋友,我们曾共同目睹了战前的变化,战争爆发后又精诚合作,准备一旦战争爆发就往法国派遣远征军,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俩关系很好。不一会儿车就到了位于离圣·瓠麦不远的布隆德克城堡的司令部。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吃了晚饭,并且就战争的局势聊了很久,就好像又回到了1914年8月,我依然是海军大臣,负责将他的军队运过海峡。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问我,“你想干些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一切听从上级的安排。

① 布洛涅:法国北部港口城市。

② 约翰·弗伦奇:英国陆军元帅,曾任帝国参谋总长(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西线英军。

他说，“我的权利不比往昔了，事实上我连自身都难保，但目前我的话还能算点数。你愿意带一个旅吗？”

我说我当然非常愿意，但是在我担负起这种责任之前，我先得了解一下壕战的特殊情况。

我得给读者解释一下，我是个经过5年专业训练的军人，在大战前也与其他英国军队中的上校们、将军们一样亲眼目睹过真枪实弹的战争，因此我有资格加入到军事圈子里来。我虽然算不上是个职业军人，但我也不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志愿兵。我属于那种夹在两者当中的“重新服役的退役军官”。不管此举是不是很冒昧，我并不觉得我在履行职责时会有任何能力上的问题，况且我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呢。

总司令说这样很好，他将下令让我前往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师报到。我说近卫军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他决定请近卫军某师的师长卡文勋爵几天后来见他。经过一段愉快的交谈之后，我就被正式委任到了这支著名的部队。

当时近卫军正控制着摩维尔一线。已经是严冬时节，这一线的战事比较频繁。

卡文勋爵对我说，“我要把你派到我的一个最好的上校那里，你从他那里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他的部队明天将奔赴前线。如果你能在1点钟来与我共进午餐，那你会有足够的时间。”

第二天，我将我自以为很少的随身行装打好包后，来到近卫军师部指挥所，在那里一个英俊潇洒的指挥官非常友好地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吃完简单的午饭后，这位将军亲自开车将我送到一个近卫军营部。在正式的委任状下达之前，我的军衔为少校。各连队已经开始向战壕出发了，上校、副官和营部的其他人员也正准备动身。一连串的敬礼、微笑、还礼过后，将军与营部军官友好地聊了几句，然后上车走了，撇下我孤零零一个人，

就像是个刚入学的小学生面对着校长、学监和一群高年级学生。我们将骑马赶上在我们前方一英里左右的部队。我的新主人非常照顾地给了我一匹小矮马，我们不急不忙地赶着路，不一会儿就追上了行进中的军队。我们勒住缰绳，随士兵们一起前进。这是11月份一个阴沉的下午，天气很冷，淅沥的小雨落在迷蒙的平原上。我们离前线越来越近，不断见到炮火的火光划破阴郁的长空，也听到了断断续续的炮声。接下来大家默不作声地行进了半个小时。

突然，上校说：“我想我必须告诉你，你到我们营来这件事根本没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我非常礼貌地告诉他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被派遣到哪一营，不过这没关系，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尽力处理好此事。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副官说：“恐怕我们得让你扔掉一些行李，少校。这儿的堑壕阵地并不相通，我们必须到壕沟顶去换防，士兵们背的只有点干粮。我们已经给你配了一个勤务兵，他会替你把你的换洗袜子和刮胡刀带上去的，其余的请你都留下来。”

我说这样很好，我敢肯定我会感到很舒服的。

接着又是同样的沉默。不久我们面前的景象开始变化了：路边田野里的弹坑越来越多，道路也是坑坑洼洼，并且到处是碎石块，我们已远离了有人烟的乡村，偶尔出现的零星的房屋也已成了废墟。光秃秃的树有的被炮火烧焦，有的被炮弹炸裂，周围只有又高又密的荒草。夜幕降临了，除了行军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炮声外，周围一片寂静。

最后我们终于停了下来。勤务兵过来牵走了马。从这儿开始我们都得步行前进。4个连必须离开道路在黑暗中朝不同的方向分头慢慢地走过这2英里宽的泥泞地。远处偶然划破夜空

的刺眼的蓝光显示着前线的方位。

营指挥部设在一个叫做埃贝内泽的被炸成废墟的农庄上。残垣断壁虽说能挡住炮弹和子弹,但却不大能住人。断墙后是一个由沙袋垒起的被隔为三四个小间的建筑,作为上校的指挥室。炭火给这个地方增添了特别的暖意。我们步行了大约3个小时才走到这里,当时我想已差不多是六点半了。上校和副官都在忙着把部队派往前线,听取我们换防的进展报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们吃了点东西,喝了加了炼乳的浓茶。吃饭时大家随便聊了聊,但属下对上校显然很敬畏,除了对他本人提及的话题随便谈上两句外,其他事一概不谈。大约8点钟,有名近卫军战士的遗体被抬进了农庄,准备明天下葬。副指挥官问我晚上准备睡在哪里,要么是营指挥部的通讯室,要么是200码外的掩蔽部。通讯室约有8平方米,已经住了4名电报员,非常闷热。察看了通讯室之后,我说我还是去看看掩蔽部吧。于是我们又踏进雨雪中,走过湿漉漉的草地。掩蔽部很不好找,而且此时用手电肯定很危险。尽管如此,大约一刻钟之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这是个四英尺深的坑,里面足有一英尺深的水。我对副指挥千辛万苦帮我找到了这块休息场所表示感谢,但比较下来我还是更愿意住到通讯室去。后来我们谈起了“战壕足^①”,然后又说起了流行病,后来他又介绍了一个叫做“袜子处理室”的战壕中的地下掩体,那里不断有湿袜子送来,烘干后又回到主人脚上。在回埃贝内泽农庄的路上,我们不断听到刺耳的子弹呼啸声在前线掠过。这就是我刚到近卫军时受到的礼遇。

我一直引以自豪的是我能与这些军人融洽相处,直到今天我与他们还保持着友谊。我花了大约48小时才总算挨过了这

^① 战壕足:一种因长期在战壕中生活而滋生的足疾。

些人对形形色色的“政客们”的偏见，特别是对非保守党政治家的偏见。尽管我对职业军队了解不少，并且生活经历也颇为丰富，我还是对他们这样精心整治我的把戏感到很有趣，这一切无非是想要我知道在前线除了军衔和表现，其他什么都不顶用。天气仍然是极其寒冷，但上校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缓和了。他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该营的经济状况和纪律。我问他能否带我一同去战壕看看，反正他白天和夜里都要去战壕巡视一遍。他同意了，于是我们在雪地和泥浆里艰难跋涉着——这里的天气非常多变——我们一会儿走在子弹横飞的田野上，一会儿又穿梭于迷宫似的战壕里。有时当射击比较猛烈时，上校也会变得和蔼起来：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我好了，这是我的义务。”

“您真是太好了，长官。”

“我很愿意这样做。”

“非常感谢，长官。”

当我们一路跋涉到名叫路标巷的战壕(人人都知道，此地距离新夏佩勒很近)时，有四五颗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很不客气的欢迎。我不禁说，“他们士气都很高。”

“希望如此。”上校说。

我们每天每夜都这样艰难地分别走上两三个小时，于是他一点一点地忘记了我是个“政客”，也忘记了我到这个营来“根本就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如前线暂无战事，大家便可以休息一下，那些在战斗中纪律严明、英勇奋战的近卫军官兵们也可以松弛一下。到这个营10天之后，我已经很像是个从未离开过军队的绝对无可指责的职业军官。副指挥回家度假期间，我应邀暂代其职，可以说这是我接受过的最高荣誉之一。这也使得我有了胆量向上校提了一

个建议。我说假如我不是整天呆在营指挥部,而是与战斗在前线的连队生活在一起,我也许会对战壕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上校认为这是个值得表扬的建议,并作了相应的安排。在此,我必须向读者坦白,我提这一建议的动机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妥。前线营指挥部是绝对“禁酒”的,在那里整天只能守着拌有炼乳的浓茶,这其实是一种难以下咽的饮料,然而,对战壕里连队官兵的要求就宽松多了。而我一直坚信适量地饮酒是有益的,特别是在冬季打仗时更是如此,因此我高高兴兴地将我的几件东西从埃贝内泽农庄搬到了前线的某连队。我和其中一个连队指挥官爱德华·格里格在战前就已相识多年,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受到的接待不会太差。

我希望读者们能够了解,我对这些了不起的近卫军官兵从内心深处表示钦佩。尽管这里没有大仗可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行动,但也是战事不断。炮火和子弹从不间歇。天气变幻无常,一会儿是严霜,一会儿是大雨,过一会儿则严霜又至,变化之快,令人生厌。没有人能保持身体干爽或温暖。从印度军团手中接管过来的战壕状况极差,掩体不防弹,壕沟水汪汪,铁丝网也残缺不全。军队夜夜都须在靠敌人一侧的战壕里加固护墙和铁丝网;伤亡人员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医院,埃贝内泽农庄上的墓地规模也越来越大。军官们也帮助士兵们干活,他们在无人区巡逻,或是在士兵们干活时,冒着在夜空中呼啸乱飞的子弹,坐在护墙后警戒达几小时。第二天早上战壕里到处都是弹壳,指挥部会接到许多要求反击的申请,但并不是所有的请求都能得到批准。然而这个营依然士气高昂,哪怕是到这里的陌生人或访问者也会感受到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受到钢铁一般的纪律。

人活得越久,越会感到一切都取决于机遇,同时也就越不会相信世间万象中的这一万能因素仅仅是由于事件盲目相互作用才产生的。机会,机遇,运气,命运,天命,天数,尽管说法不同,但对我来说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个人一生的作为都由一种超自然力量主宰着。一个人只须回头看一看自己最近10年走过的历程,就会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却实实在在地主宰着我们的命运和事业。日常生活中确实如此;在战争时期,生活异常紧张,于是机遇抛开了所有的面纱和伪装,常常赤裸裸地以人和事的主宰者的面目出现。早晨出门时你忘了带火柴,等走了大约100码时又转身去取,因此捡回了一条性命:那从10英里之外飞来的炮弹击中了你本来要去的地方,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切是多么危险啊!你因为招呼一位不期而遇的外国军官而耽搁了半分钟,另一个人顶替你走进了战壕,一声巨响!这人再也不在人世了。你可以走向一棵树的右边或左边,但结局却大不一样:走向右边的人可能会最终成为军长,而走向左边的人则可能会被打成残废或瘫痪被送回老家。你走在战壕道上,可是前面每隔半分钟便有一发炮弹落下来,你觉得如果径直走太莽撞了,你算出你到达危险地点时正好是炮弹该降落的时间,于是你向左绕了50码,可是此时敌人的大炮也恰巧改变了方向,你正小心翼翼时,它面带狞笑与你相会了。

我们一定要牢记拉封丹的话:

你本想回避命运

但却总与它不期而遇。

古埃及人对尸体的崇拜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最大欲望就是能将人可怜的躯体在偏僻而庄严的地方永久保存起

来。他们将自己的墓穴挖到原生岩层深处，洞穴通向长廊，长廊里又有洞穴。除密封技术之外，还增加了防腐专家们非凡的才能。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谁在这一领域内能超过他们，然而这一努力却带来了与其目的相反的结果。在人类的想象中，他们千辛万苦想到达的目的与实际结果完全背道而驰：4000年后，他们国王和王后的尸体被从墓穴中的藏身之处拖了出来，陈列在布莱克博物馆的大厅里，暴露在庸俗而冷漠的目光之下。这些人费尽心血，不惜牺牲，采用一切手段所换来的恰恰是他们想避免的结果。这不由让我联想到我在近卫军中遇到的一件小事。

我下连队大约有一个星期了。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狭小的由沙袋垒起的隐蔽所里给家里写几封信。在这一块前沿阵地上，积水较深，因此我们主要是靠胸墙而不是靠战壕来防身。这里也没有平常所说的掩蔽部，只有简单地由沙袋组成框架，外加一块波纹钢板，上面再放几个沙袋当屋顶，这就是我们的庇护所了。早晨的炮击已结束了，常识告诉我们后面会安静一段时间，我拿出信笺和自来水笔，一会儿便专心写起信来，大约写了一刻钟左右，一名勤务兵出现在隐蔽所入口，行了一个近卫军军礼，交给我一封战地电报：

军长希望4点在摩维尔见见丘吉尔少校。三点一刻有一辆车在红十字交叉路口等候。

我认识××将军多年，但是将一名军官从前线喊走却是很不寻常之举。我一直在思忖这次召见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到自己白天必须在敌人的视线内穿越3英里泥泞不堪的田野，晚上还得再艰难地走回来，我心里有点不太乐意，然而，命令是不

可违抗的,我只得很不高兴地收拾起未写完的信,穿上少校军服,准备跋涉了。两个高个子近卫军战士正忙着帮我收拾掩体。

“你最好带上勤务兵,”连长对我说,“他可以帮你拿大衣。最好不要一个人外出,他在晚上还识路。”

几分钟后我们开始向红十字路口出发了。离开战壕还不到200码远,我就听到了炮弹刺耳的呼啸声逼近了,回头看了看,大约有四五枚炮弹在我们刚刚离开的战壕里开了花。炮火大约持续了一刻钟,然后才停下来。我根本就没有对此事多想,只忙着满头大汗地向红十字路口赶路。将军到底找我有何事呢?肯定是很重要的事,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召见我。

最后终于到达了指定地点——一个建在面目全非的十字路口旁的破破烂烂的小客栈。没有等我的汽车。我很不耐烦地等了将近1个小时,这才等来了一位参谋。

“你是丘吉尔少校吗?”

我说正是。

他告诉我,“派来接你的车有了点儿误会,它去错了地方,现在已来不及送你到摩维尔去见将军。他已回到欣吉斯的司令部了,你可以归队了。”

我说:“非常感谢您,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您能否告诉我将军把我从前线召来是为了什么事呢?”

“噢,”参谋官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觉得既然他到了这里,很想和你聊几句。可能以后还有机会的。”

我很生气,因为这个参谋也只不过是少校,他跟我说话时毫不在乎,我也没有必要掩饰我的坏脾气。此时天已黑了,我还得从那漫长、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走回我的战壕。在黑暗中我迷了路,至少转了2个小时才找到路标巷。寒冷的雨点不停地打在身上,汗水(因为我将所有衣服都穿上了)加上雨水,我浑身全

湿透了。可恶的子弹呼啸着落在路标巷，当我最后终于走到前线的胸墙掩体中，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还得在迷宫似的战壕里再走上一英里。我一个月前才告别内阁大臣办公室，办公室生活绝不可能让我这样锻炼身体。我又累又渴，一头扎进了附近的一个连队，讨杯水喝喝。

“你好，”他们说道，“你今天真走运。”

“我自己可没看出来。”我回答道，“我今天被人耍了一场。”接着我用恰当的措辞对军长使用自己的职权使唤其下属作了一番评论。

“不过，你今天还是运气不错，”几位近卫军军官对我说，“你回到你的连队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一点都听不懂他们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话。消灭了一杯令人畅快的威士忌和水之后，我又回到雨水和泥泞中，10分钟后我回到了连队。在离我的掩体大约有20码远处，一位中士向我行了军礼，说：

“我们已经把您的东西搬进××先生的掩蔽部里了，长官。”

“为什么？”我问道。

“您的掩体被炸毁了，长官。”

“造成什么破坏了没有？”

“您的东西都完好无损，长官，但是××死了。您最好不要进去，长官，那里面乱极了。”

我现在开始明白前面连队里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问道。

“大约在您离开后5分钟，长官。一枚炮弹从屋顶掉了进去，正好击中了他的头。”

我一下子觉得我对××将军的怒火全部消失了。所有的不满像闪电般飞逝得无影无踪。当我走向我的新住处时，不禁想

到,将军希望见到我想得是多么及时周到啊。他肩上的担子那样重,心中居然还装着他的下属。就这样胡乱地想着,我觉得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关键时刻将我从致命的地方拉了出来。这只手是不是××将军的,我可就说不准了。

普鲁格斯特里特^①

大家都记得一位老者的临终遗言,他说自己一生充满了苦难,但大部分苦难其实从未出现过。下面这件事是我的个人经历,可以算是这句话的令人欣慰的例证。

1916年2月,我在佛兰德指挥皇家苏格兰军第六营。我们连续几周坚守在靠近“普鲁格斯特里特”树林和村庄的战线上一个著名战区。前线相对比较平静,通常只有局部炮击、阻击、壕沟战和反击,我们营每6天轮休一次。我们在战线外的所谓“休息”场所离战壕只相隔着一英里半的平地,而战壕离德军战壕只有约300码远。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生活在一平方英里左右的弹丸之地上,并且注定要在此坚守3个多月。我休息时的指挥部离我的阵地指挥所只有1000码左右,因此,对我们来说是否呆在战壕里并没有什么区别,而炮火造成的伤亡,壕内壕外几乎一样。

我于去年11月份参加陆军,当时受总司令之邀,我写了一份文件,表述自己对敌进攻新方法的一些想法。这份题为《进攻的各种方法》的备忘录主要讨论了许多我自己很感兴趣的秘密计划,其中包括大量使用履带机(后来被叫做“坦克”)并配合以

^① 普鲁格斯特里特:比利时地名,原名为普勒格斯蒂德,“普鲁格斯特里特”为一战中驻守于此的英军对该地的谑称,意思是“瓶塞大街”。

烟幕和其他手段的方案。1915年12月3日所写的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摘录中略见一斑：

3. 履带机——切断敌人的铁丝网和控制敌人火线是这种机器的主要特点。英国现在大约已造出了70辆，正待验收。须待所有的机器装备完毕后，一起使用。它们在使用中必须互相间隔200—300码，沿着进攻路线分散排开。在进攻前10—15分钟开动履带机，让它们沿预定路线行驶，在准备好的地方穿过或越过战壕。它们能穿越所有普通障碍物、沟渠、胸墙或战壕。每辆履带机配备2—3挺玛克沁机枪，并可安装火焰喷射器。除非被野战炮直接击中，否则谁也挡不住它们。当到达敌人铁丝网前时，它们左转或右转，然后沿着敌战壕平行前进，利用机载火力向敌人的胸墙扫射，并蛇形前进，碾垮或切断敌人的铁丝网。此时履带机在敌人战线附近，因此它们不会受到敌人炮火的轰击。通过履带机打开的缺口，步兵便可藉此坚盾护卫，顺利向前推进。

如果使用炮火摧毁敌人的铁丝网，那么进攻的线路和时机几天前就公开了。如果用这种新方法，敌人的铁丝网遭破坏后我们可立即进攻，也就是说，敌人来不及巩固防线，也不可能采取任何防御措施。

在将打印件交给总司令的同时，我还交给帝国国防委员会一份复写稿。国防委员会要把这份文件秘密地印刷出来。1916年2月初，我在前线指挥所收到了军邮送来的这份重要材料的校样。军队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秘密的文件不得带到前线，因此当我坐在那由沙袋垒起的、大半遭破坏的农舍里看这份校样时，

我越发强烈地感到敌人离我只有大约 1000 码。不过，黎明时分，我们将回到一英里外的“驻地”。到时候我再在校样上作必要的修改，然后派一个军官把它送到位于贝勒的军团司令部，再转送伦敦。

“普鲁格斯特里特”村主要是由一长排坚固的砖房构成的，有些房子有五层楼高，隔着平坦、潮湿的田野与敌阵地遥遥相望。到目前为止，除了林中教堂以外，房屋几乎未遭到敌人炮火的破坏。很多房屋上有洞眼，但所有房屋遮风挡雨绝没问题，大部分窗户都有完整的玻璃，住着挺舒服。

我的部队属于第九苏格兰师，师长精力极其充沛，总是主动挑起事端。德国人对我们的炮击以牙还牙，结果是乡间田野到处伤痕累累。我“休息”时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红砖结构的女修道院内，房子基本完好无损。我在一楼有间配有全套家具的舒适房间，一扇很大的凸窗正对着前线，刚好在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外，窗下有一张写字台。这天我用完早饭后，约在 10 点钟时我坐到写字台旁，处理我在战壕这段时间内积压下的信函，特别是要对《进攻的各种方法》进行修改。

约半个小时过后，屋前约 300 码远的空地上两三声爆炸声引起了我的注意。从远处前线阵地和“普鲁格斯特里特”树林角落里升起了榴霰弹的缕缕白烟。我停下了手头的事，就像是坐在戏院包厢里一样观看着这次炮击。几分钟过后，又有两三发炮弹在 200 码远的地方爆炸，但这次爆炸就在我眼前的田野上。约一分钟过后，又是一声巨响。对炮声已习以为常的人最不喜欢听到那些径直向你飞来、就在你附近爆炸的炮弹的呼啸声。只听炮弹的呜呜声渐变为刺耳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尖，对你的威胁越来越大；直到你看到有堆泥土在你眼前被掀入空中，你才能肯定自己平安无事。这一发炮弹就在四五十码外的马路的另

一侧发出了震天的轰响。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房屋(我们称它为“瘦高个儿”)可能成了敌人的目标,下一发炮弹就可能会正中靶心。与此同时,村中各处的爆炸声表明“普鲁格斯特里特”将会受到敌人的“特别关照”。

我们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但是在我写信的那个房间后面有个小地窖,顶部是用砖砌的。现住在里面的是留在修道院未走的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还有两名营部的报务员。如果继续坐在只有玻璃作护墙的房间里,似乎太不明智,但是我也并不太想去那地窖藏身。那拱形的地窖顶尽管看起来很坚固,其实只有两块砖头厚,况且那里也太拥挤了,根本没有空隙,所以我起身穿过后门,进了毗邻的充作营部办公室的房屋。这座房子面朝战场的也是些大窗户,但是它后面有个房间,因此我呆在这里就有了两堵墙作为保护了。两堵墙该足以抵御野战炮的袭击了:第一堵墙挡住炮弹,第二堵墙也许可以挡住炸弹的碎片。我就坐在这间房里一直等到炮火停息。我把我所有的信件和文件都放在了临窗的写字台上。我想我离开时并不匆忙,但是动作也决不迟缓。我走得既从容又干脆。

现在“普鲁格斯特里特”村开始遭到第一轮连续炮击,村子渐渐变成了一片废墟。每隔一两分钟就有炮弹落在附近,有的在房前爆炸,有的掀掉了屋顶,有的则在庭院里或办公室后边爆炸。炮弹的尖啸声、爆炸声以及砖体建筑倒塌时的轰响和嘎拉声响成一片。不久我的副官也来到了这个房间,我们坐在那儿抽着烟,起初还有些兴奋,渐渐地俩人都紧绷着脸,一言不发。附近不断有剧烈的爆炸声,我们意识到附近的房屋肯定遭殃了。烟灰从烟囱里纷纷飘下,我们所能看见的后院满是砖石块。一颗炮弹在我们正对面的房屋正面爆炸,将房子炸了个大洞。我们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把希望寄托在那两堵砖墙上。如果一

个人一个月以来每日与炮火为伴，那他对此情景就不会太大惊小怪了。在那特殊时期，千百万人对此习以为常。

炮击持续了大约1个半小时。随后爆炸间隔越来越长，不一会儿一切又趋于平静。此时我的营副兴高采烈地出现了。当敌人开始炮轰村庄时，他正在士兵宿舍视察，此后他一直在离我们约几百码的地方静静地观看着，直到“雨停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瘦高个儿”。当我们从后门进去后，眼前一片狼藉。我刚才写信的房间已经被炸毁了，凸窗上方的砖墙被炸了个大洞，光线从洞口漏进房间。写字台、家具、文件，所有的东西都乱成一片，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红色细砖灰。此时那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从屋后走进来，俩人都吓坏了；后面还跟着一位报务员，正咧嘴笑哩。

“噢，长官，”老太太的女儿说，“过来看看我们呆的地窖吧，那东西就掉在我们中间。”

我们跟着走过去：地窖的砖顶已经被炸开了，地上躺着一枚长长的、30磅重的哑弹。这枚炮弹几乎垂直地穿过了凸窗，又穿透了地窖上的砖顶，然后不偏不倚正好掉在挤在这儿的几个可怜人中间。炮弹擦伤了一名报务员，但对其他几位未造成任何伤害。不难想象，当两位女人^①看到这个魔鬼几乎掉在她们膝盖上，又想到它随时都会爆炸时，她们是多么的恐慌，那种痛苦远甚于死亡。

我要求她们立即收拾一下，离开她们的窝，随后我回到了自己那间已狼藉一片的写字室。因为那颗炮弹没有爆炸，所以什么也没有被烧坏或严重受损。我费力地将我的文件、行装和私人物件都收集起来。我只需将它们上面厚厚的细砖灰抖掉就行

① 指老太太和她女儿。报务员为男性。

了,当时根本就没考虑是否丢了什么东西。当我整理着信和信纸时,慢慢感到奇怪,怎么找不到那封信了,而且经历史证明,这是封极其重要的信。最后所有东西都收拾起来了。勤务兵进来打扫房间,但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份珍贵的文件。除它之外,其他一切未丢;而除它之外,丢任何东西都无大碍。文件不见了,而且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它是如何神秘地消失的呢?肯定不是因炮弹所致。如果这个房间被炮弹炸毁了,这种解释会很合情合理。而现在在房间里仅有的垃圾堆里也未能找到这个文件,那它肯定是被某人——请注意——肯定是被某个知道它的重要性的人偷走了。

我现在真正开始感到害怕了。“普鲁格斯特里特”是比利时人仅存的几寸领土中的一部分,前线离这儿只有几百码远。我们的情报部门早就警告我们说留下来的居民中可能有奸细,人人都很警惕,而且时刻都有戒备措施。我脑海中已有了半打不祥的解释。敌人的某个特务混在我们当中,而且知道我有封极其重要的信函,因此每天都注视着我的行动,希望将它搞到手。当炮弹炸坏房间、屋里一片混乱时,他趁机溜了进去,找到了那份文件,肯定被印在上面的红色的“此文件属大英政府”字样吸引住了,然后此人迅速地消失了。他现在可能正赶向某个联络点,晚上敌人飞机会把他运过战线。各种可怕的猜想涌进了我的脑海,而我却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老太太和她的女儿都没有看到有陌生人在附近出现,但是由于她们惊魂未定,因此她们也不能完全肯定。而报务员则一直忙着看护他那位受伤的同伴呢。我们又将屋子和里面的一切都搜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在接下来的3天里我操碎了心,一遍又一遍地责怪自己。当军邮将这个文件送到我手中时,我为何不立即派一名军官将它送回去呢?为什么不随时随地将它带在身上呢?

这件事又让我想到了前文提及的那位老人的临终遗言,我可以以此告慰焦急的读者,也可以以此来说明自己的谨慎。第三天我碰巧将手伸进了我平时很少用的右边的里袋,发现我一直疯狂寻觅的文件正安然无恙地躺在那儿。当危险降临,我离开那间屋子时,我本能地拿起这份重要文件并把它放进了口袋。看到它又安全地回到我手中时,我高兴地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普鲁格斯特里特”村里的这间风雨飘摇、弹痕累累的小屋简直就像自己的家一样既安全又舒适。

潜 艇 战

关于大战中海军作战史的第五卷,即最后一卷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包括了大战最后两年中海军的所有工作。这部讲述了海军全部行动的故事终于出版了,书中的历史也因此凝固了下来。这本书算不上鼓舞人心,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书中包括了大量的技术细节,也因为此书是出自多人之手的合成品。很明显,能干的历史学家在书中的章节里不得不屈从于权威部门的干涉;而书中提及的大人物们显然也不惮于使用剪刀和橡皮擦。结果此书成了一种沾了官气的混合物:对事件的叙述算不上朴实大胆,对重大分歧的分析研究也算不上公正深入。尽管如此,书中翔实材料仍然是触目惊心,书中呈现的战争机器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昂贵的代价,当时的问题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部由事件和细节仔细拼凑起来的合成品可以说是海战最后两年、也是最重要的两年的一座真正的资料宝库。

如果想弄懂这卷中的主要问题,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战争初期的基本情况。1914年和1915年的海军部的战略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紧张日子里,人们没有完全认识到海军舰队所起的无形的巨大作用。敌方的贸易线路从公海上被清除出去,海上的所有民用和军事通道都在盟军的控制下。到1915年4月,英国在海上的控制权已得到了完全保证,以致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安全”两字。在全球海面上,德军只有两三艘东躲西藏的巡洋舰,

“德累斯顿”号偷偷潜伏于“火地鸟”的冰山下，而“克尼斯伯格”号则被困于南非泻湖的炎热的隐蔽处，束手无策。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海洋对于协约国军队是安全的。只须低于百分之一的保险费就足以保证战时从各个港口进出的毫无护卫的商船安全了。

这种秋毫无犯局面的保障条件是静静地驻扎在北部的斯卡帕湾的大英舰队。它对海洋的控制能力胜于历史上任何时期。整个大战完全围绕着这一无声的、忠于职守的、几乎不为人知的轴心在运转。要不是大英舰队，德国会立即袭击并摧毁协约国军队在海上的联络，并对法国沿海构成威胁。要不是大英舰队，德国巡洋舰和其他自由游弋于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的战船就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切断我们的海上运输线，并可不费吹灰之力构筑起无情的海上屏障——后来德国潜艇花费两年时间拼命想筑起这道屏障，但那已是枉然。在大战第一阶段中，要不是大英舰队，协约国军队的整个军事构架肯定会崩溃。正是依靠着这块海洋“坚盾”，法国得以自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共有 2200 万士兵被运送到协约国军队战线上。

在战争爆发前就将大英舰队置于斯卡帕湾，其战略效果既迅速又彻底。1914 年 8 月底，皇家海军成功地突进赫利戈兰海湾，因而名声大振。由于德国的巡洋舰不断被击沉，德国皇帝不仅产生了自卑情结，而且接受了英国在海上的胜利这一事实。

遭此挫折，德国海军将领们自然就想到了潜水艇。这是一种既奇妙又令人恐怖的新式武器，战前没有一个国家试验过它的威力和耐力。直到 1915 年 2 月，德国才最终决定将这一武器用来袭击商船，同时冯·波尔被授权宣布对英伦三岛进行海上封锁。这是个重大决定。全世界都用恐惧和愤怒的目光注视着德国全然不顾旅客和船员的安全，将一艘艘商船沉入了海底。但

是英国海军部并没有被真正吓倒。我们知道德国只有大约 25 艘潜水艇,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潜艇能随时出航。对于每周往返于几十个港口之间的成百上千的船只来说,这几艘海盗船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就好比围猎场里有成百上千只奔跑的兔子,只有两三个独眼的偷猎者举枪射击。每次兔子们几乎都能安全地从他们身边跑过,而偷猎者本人却要提防猎场看守人。事实上,1915 年我们宣布每周将公布一次所有的航行船次和沉船数量,结果很快证明海军部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德国的第一次潜艇战并没有对英国的贸易造成实质性的破坏,而德国政府却面临着重重困难。鱼雷击沉了中立国的船只,也击碎了中立国对德国的信任。最后,“卢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①引起了强烈愤慨,美国的一纸声明使发生在英国海域的潜艇战告一段落。

首轮潜艇战于 1915 年 6 月结束。此后一年多(如果从开战算起几乎两年)的时间里,英国获得了绝对的、不可抗拒的制海权。除了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内陆水域外,所有咸水里几乎找不到一艘敌船。假如大战在 1915 年或 1916 年全部结束的话,那么历史就该这么写了:尽管在日德兰半岛英国舰队曾遭受挫折,但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从未受到过动摇。在这一段平安无事时期,海军有一次,而且是仅有一次可以让大战在海洋和陆地完全结束的机会。这次机会于 1915 年 4 月随着海军最终决定取消用武力打通达达尼尔海峡而永久丧失了。尽管在 1915 年协约国军队陆军的运气不佳,但是海军还算是帆风顺。1916 年,随着英、法、俄陆军的节节胜利,再加上英国海军毋庸置疑、

^① “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于 1915 年 5 月 7 日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

也无人怀疑的强大实力,这一年本应该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

在这一段时间里德国人一直在建造潜水艇,同时德国海军部的官员们一直吵闹着要求允许他们使用潜水艇。德国文官势力和海军将领们为此存在着长期紧张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前者害怕因此将美国和其他中立国卷入战争,后者则坚信他们完全有能力把德国和其附庸国从英国的封锁中解脱出来。最后绝望使他们决定铤而走险。1916年,凡尔登失利、索姆战事吃紧、令人吃惊的俄军的攻势,以及最后罗马尼亚的介入,这一切标志着德国将大战推进了第二高潮。那些能做出灾难性决定的人被授予了最高指挥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①都成了领导人,他们全力支持海军。德国总理和外交部长受到了压制。他们警告说,美国会被卷入战争,但那些残忍、好斗、一心要为祖国存亡而战斗的人只当是耳边风。

从1916年10月起,德国潜水艇活动日益频繁,被击沉的船只数量剧增。从1917年1月9日,在普莱斯的御前会议上,文官们放弃了他们反对采取极端措施的主张。100艘潜艇整装待发。海军部列举了事实和数据,企图证明无限制地发动潜艇战每月会击沉60万吨的总吨位,照此下去,5个月后大英帝国,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敌军联合体的灵魂,将会俯首称臣。德国皇帝批准了臣子的决定。命令签发了,战争宣布了,无限制的战争在2月1日开始了,同时美国也成了他们致命的敌人。如果参加普莱斯会议的人中有人预料到俄国会在几个月后一败涂地,他们怎么也不会下如此巨大的赌注,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陆地

^①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创立“总体战”理论,因两线总攻失败而于1918年辞职,后于1925年成为纳粹党总统候选人。

上打开崭新的胜利局面。他们如此莽撞完全是命运的安排,等到他们知道冒险越少越安全的道理时已经晚了。

在第一阶段的海战中,德国舰队失败了,英国舰队占绝对优势。自1916年10月起,局势日益紧张,海战进入第二阶段,英国皇家海军和德国潜水艇之间进行生死搏斗。这场战争超乎想象,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残酷的、最复杂的战争。人类所知的一切科技手段,包括机械学、光学、声学的运用,所有能派上用场的东西都用上了。这是一场靠图表和计算进行的战争,一场仪表和开关的战争,一场让专家成为战斗英雄的战争;这也是一场紧张、耐心的思想交融着爆炸和死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众多船员在海底受到“狩猎”,并葬身于海底;大批船只远离了港口,失去了供给,得不到救济。正是基于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争斗,世界历史才有了转机。

1916年11月和12月已经发生过几次试探性的潜艇击沉船只事件,但是公众,甚至包括政府,对贸易安全是如此胸有成竹,以致很久以后他们才真正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毫无疑问,必须对这次新的进攻立即采取措施。对那些关注新兴的宣传艺术的人来说,这次进攻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它会影响中立国和美国的舆论。可是敌人的进攻却未停止,被击沉的船只数量每月都在增加。1917年2月3日,当德国宣布了无限制战争之后,美国大使撤出了柏林,但直至4月6日美国才介入战争。如此巨大力量的介入似乎使胜利成为必然。已是穷途末路的日耳曼帝国如何经受得起1亿2千万人的新的波涛的冲击呢?可是假如美国军队过不了大西洋呢?不仅如此,假如战争材料、石油和食品的海上通道被切断,那么这个不仅是战争的枢纽而且有着4000万人要吃饭却只有不到3星期储备的岛国会怎么样呢?

迄今为止,英国的海上力量是如此不可超越,以至于它的存在犹如空气的存在一样不为人注意。突然间空气变得可怕地稀薄,于是,虽然佛兰德炮声隆隆,英国政府上上下下却都在专注于这个新问题。1916年10月和11月,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协约国和中立国商船的总吨位已悄悄上升到每月30万吨。1月份被击沉的吨位还是28.4万吨,可是随着2月份无限制战争的开始,击沉吨位猛增到47万吨。德国海军参谋部曾计算过:英国若要正常供给本国和协约国军队的军需,必须保证有1050万吨位的运输能力。假如运输吨位低于750万吨,那么供给就无法跟上军队的需要。如果他们能每月击沉60万吨位,那么5个月内他们即可让英国的吨位减少至750万吨的极限。根据这一显而易见的数学逻辑,德国最强的对手必定会屈膝投降。现在用不着大谈什么决定性海战,什么达达尼尔海峡,也无须奢谈什么波罗的海登陆,或攻击赫利戈兰,致命的危险迫在眉睫。

现在致命的拳头正瞄准着我们的心脏,勒住我们脖子的绳索正越收越紧。是胜?是败?这是一个白厅必须正视的问题。4月份数字还在增加,那只致命的手指在无情地指向83.7万吨;这是英国、协约国军队军和中立国将被击沉的总吨位数,其中英国一家就占据了51.6万吨。事实上,这个数字离德国人设想中的极限数字只差五分之一的吨位了,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和潜水艇的威胁相比,战争的其他方面是那样苍白无力。

《海军史》的最后一卷描述了潜艇战对战时内阁、海军部、海军军队的影响以及他们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防御措施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技术类的。1915年海军委员会为对付第一次流产的潜艇袭击所作的准备和反击措施并未被其继任者所忘记,大量的小船或已造好,或正在制造。1915年的技术和装置得到了强化和扩展,深水炸弹能在规定深度爆炸;水下测音

器可分辨出潜艇发动机的最微弱的声音；船队搜索、爆破及水下扫雷器三管齐下；装有报警浮标的渔网、诱捕船弯弯曲曲地密布于海面，一切可以用上的手段都使用了。第二类是海军部的重组，新成立了反潜艇处。然而还是第三种对策——护航战术——才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大战中没有任何事比这更精彩、对将来更具指导性。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紧张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由民主的议会制度所选出的业余政治家们，另一方则是海军部的年富力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家们和伟大的海军军官们。令人瞠目的是政治家们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海军部却错了。政治家们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属旁门的技术性专业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海军部的权威人士却在属于他们本职工作的心脏和核心部分犯了错误。

另一件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些代表着身处绝境的文官势力、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奋斗的政治家们最终战胜和穿透了那一座座由海军部提出的、有海军部权威人士撑腰的偏见和错误主张的大山。这样的事情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例如在德国，德国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最终必须接受海军专家们所提供的、数据和意见。海军总司令霍尔森道夫声称无限制的战争将使英国每月丧失60万吨的运输能力，5个月里就能让英国失去战斗力。当他用德国海军总指挥的名誉和良心担保提出上述主张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反驳他。忠于职守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代表他们的同仁们签了字；而文官势力在如此坚定的主张面前都成了哑巴，因为他们如果不采纳这项技术性的建议将被视为懦弱，军方会指责是他们的胆怯和懦弱葬送了德国的胜利和生存希望，他们自然就屈服了。这一切都加速了德国走向灾难的进程。

而英国的政治家们——我们为他们的存在表示遗憾——都是些权力很大的家伙。他们觉得自己身居高位并不是任何人垂青的结果。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他们并非是得到否定答案时就罢休。他们不会将专家们提供的事实和数据看成是不可动摇的东西。他们虽是门外汉,但如果觉得某事不合理,也不会屈从于专业人士的权威。他们甚至会秘密地从下级海军军官那里获得关于某个问题的意见,然后利用它们来盘问和反驳海军头头们。莫里斯·汉基爵士是这些政治家中的一只猛虎,他既是卫国委员会的大臣,又是战时内阁的秘书。他可以合法地干预很多领域——海军、陆军、职业、政治——他绝不违反官场规矩,但同时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又绝不心慈手软。他背后有劳合·乔治和博那·劳^①撑腰,这两人对事实和数据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俩都不拘泥于职业上的约定俗成的惯例,也不畏惧佩着金丝绶带的大人物们。劳合·乔治尤其如此,他靠武力和诡计谋取了手中的权力,他很清楚,如果我们赢不了这场战争,他就会被送上绞架,并且时刻准备着承担这一责任。

1916年11月,被击沉的船只数量开始上升,这两位大臣当时就建议海军部使用护卫舰为商船护航。这条建议根本算不上新玩意。在过去的战争中就常使用护卫舰,在大战之初也曾使用护卫舰以保护运兵船不受德国巡洋舰的打击,而且取得了完全成功,没有一艘船只被击沉。大英舰队或分遣舰队一直都有驱逐舰护航,以免遭受潜艇的袭击。

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由海军部委员会及其技术部门领导提

^① 博那·劳(1858—1923):英国保守党领袖(1911—1921;1922—1923)、首相(1922—1923),曾任战时联合政府事务大臣,下院领袖、财政大臣,力主保护关税,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

出的对此建议的大量反对意见。海军部说,护航根本不可能防御潜艇的袭击。首先,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这是不可行的。在护航中商船不可能保持它们的航行位置,它们结队航行时根本不可能一齐呈“之”字形航行,它们各自不同的航行速度会使整体航速降到最低。时间丧失了,危险却增加了,运输能力也浪费了。一旦船队遭突然袭击,商船会乱作一团。潜艇一旦在船队中间出现,会造成人们极大的恐慌。根据海军部的说法,每周进出英国港口的商船不下 2500 艘,如果由护卫舰护航的船队中的商船超过 3—4 艘,护航的安全性就得不到保证,可哪里有这么多驱逐舰和小船来完成这项巨大的任务呢?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船。驱逐舰首先要保证战舰的安全,保证完成多佛尔海峡和其他狭窄海面的巡逻任务,剩下的驱逐舰远远满足不了护航的要求。

海军部反对采取护航的办法以抵御无限制潜艇战,这件大事大体上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以白纸黑字形式发表的如此强硬的争论并不多见,这些理由有那些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水手们的全力支持,他们终生与大海为伴,了解大海上的艰险和神秘莫测,而旱鸭子对海上凶险当然一无所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里竟然还有股力量能通过命令和试验将这些意见推翻,这太令人惊讶了。然而这事的的确确发生了,否则,美国将永远被拦在欧洲之外,英国将因饥荒而不得不俯首称臣,而德国将会赢得这场战争。

在这部正史中,战时内阁与海军部在护航问题上的冲突这一部分写得最为谨慎。外行人在仔细读完这本书后可能仍不会意识到书中这段历史的紧张,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重要事实都写了进去,但它们只是被精心地点到为

止,并且时间上也是前后颠倒的;这些事实的必然结论也被隐藏起来了。只有当我们用年代顺序这把钥匙破译了其中的密码,真相——对许多人来说是令人极不愉快的真相——才会显现出来。

1916年11月2日,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劳合·乔治先生(当时的首相还是阿斯奎斯)曾问过舰队总司令约翰·杰利科^①爵士,对正在我海上贸易运输线上活动的德国潜水艇是否有打击计划,总司令承认说没有。紧接着博那·劳责问为何不能采取护航的办法,海军参谋长回答:每次护卫的商船只要超过一艘,那么护航就不可能实现。第一海务大臣亨利·杰克逊补充说,商船队根本就不可能保持队形,无法用几艘驱逐舰替它们护航。当时反对派有着决定权。随着沉船造成的损失不断上升,人们的忧虑日益加深,但与日俱增的恐惧根本改变不了海军部的意见。约翰·杰利科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就是证明。海军参谋部在1月份的备忘录里将他们的意见精心归纳成几点理由,彻底否定了护航的想法。据说,备忘录上记下的毫无疑问是海军部的集体意见:

在那些特别关心保护商船的高级官员会议上,会议记录表明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或基本上是一致的。

1917年2月1日,无限制潜艇战开始了,被击沉的船只数量上升到了可怕的高峰。就是在这关头,莫里斯·汉基爵士撰写了他那篇著名的备忘录,驳斥了那些反对护航的理由。因为有

^① 约翰·杰利科(1859—1935):英国舰队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舰队取得日德兰战役的胜利。

了这份备忘录,2月13日,劳合·乔治(他这时已是首相了)召集了海军部的官员们,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然而,莫里斯这篇杰作和政府的新领袖的尖锐批评并不能改变海军部的主要观点。当然,毫无疑问,很多事实和论据是由海军参谋部处理潜水艇问题的下级军官提供的。海军方面对提意见一向纪律严格,要不是卫国委员会的存在,根本就没有其他能让这些意见公之于世的渠道或安全通道。尽管我们反复灌输过海军上将的意见可能要比海军上校的意见更正确,而海军上校的意见可能要比海军中校的意见更正确这样的道理,可是当这些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用未被常规影响过的、敏锐的、大胆的思想去思考争辩时,这条道理不灵了。

然而,论据得到了实践的支持。为法国运煤的船只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损失惨重,法国人马上建议护航。2月7日法国海军部同意了这一建议,运煤船被分遣为有护航的小中队。新方法马上奏效。3月份共有1200艘运煤船往返,仅损失了3艘,尽管如此,海军部仍固执己见。可是,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推理所依据的数据,大家就不会对他们的固执感到奇怪了。

在大战之初,当我们公布进出港口船只的总数与潜水艇破坏所造成的损失的比较时,当时每周进出英国港口的船舶数量被言过其实地宣布为2500艘。从物质条件来说,现在最多能派出六七十艘驱逐舰,再加上武装后的拖网渔船和其他小船,这怎能应付得了那些进进出出的成千上万艘船只呢?然而,“2500”这个数字本身也受到了挑战。一名在反潜艇处工作、与海运部联系很密切的下级军官R·G·亨德森终于打破了这一可怕的、长期让人折服的障碍。人们终于明白,这2500艘船包括所有300吨和300吨以上,并在沿海航行、各港口多次停靠的船只以及海上短途贸易船只。但这些船只与我们的生死关系并不

大,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是往返于世界各国港口和我国港口之间的远洋运输船。4月初,亨德森中校证明和我国命运息息相关的1600吨以上的远洋往返运输船每周不超出120—140艘。当“2500”这一不牢固的基础被铲除后,建立在其之上的逻辑大厦也倒塌了。

4月份的潜艇战很紧张激烈。内阁手中的绝密图表显示了英国本土的食品供应期限以及各战区中的英国陆军和协约国军队的军需供应的期限,但海军部仍在他们原论据的废墟上反对护航。也许他们心里害怕承担不了海军战船和商船安全两付重担。不管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仍然固执己见。1917年4月10日美国介入大战,辛姆斯上将与第一海务大臣进行了会谈。潜艇战争这一可怕的事实被摆到了这位美国水手的面前。英方催促他寻求用小船帮助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他不仅接受了海军部的护航是行不通的这一观点,而且还将此观点作为英国海军最具权威的科学观点转达给美国政府。事态的压力不断增加,此外,驻扎在奥克尼群岛中的大英舰队的军官们对斯堪的纳维亚贸易航线沉船问题作了长达几周的研究,他们一致建议采用护航的方法。第一海务大臣尽管同意在这一特定航线上进行护航试验,但他在向战时内阁提交的报告中只是说护航是否能全面推广仍在“考虑之中”。

就这样几个月又在痛苦中过去了,现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4月23日战时内阁就此问题与他们的海军顾问们进行了辩论,但结果完全令人失望。因此战时内阁于25日单独举行了会议,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他们同意让首相以个人身份去走访海军部,以“调查一下目前在反潜艇战中他们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因为最近的调查表明,在这场战役中他们的配合是很不够的”。这一行动中暗藏着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责任

重大的部门或军方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震颤的了。海军当局意识到,事情已发展到了“要么行动,要么走人”的地步了。

26日,反潜艇处负责人将下面的会议记录呈交给杰利科将军:

我认为,现在显然到了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拿出护航综合方案的时候了。

27日,杰利科将军批准了这一方案。当4月30日劳合·乔治先生带着战时内阁的决定来到海军部时,他得到了完全接受文官势力要求的决定。因此他可以向他的同仁们汇报说:

鉴于就这一问题,海军部已与战时内阁意见完全一致,鉴于在有些航线上已经采取了护航措施,其他航线上的护航工作也正要再讨论……

当然,众所周知,海上护航最终击败了德国潜艇的进攻。到1917年7月,我们的工作已步入正轨。5个月的无限制潜艇战已经过去了,大不列颠并没有屈膝投降。9月出现转机。每月的沉船吨位已从80万吨下降到30万吨。到1918年2月,造船能力曲线已超过了沉船曲线。到1918年10月,共有1782艘大船在有护航的情况下航行在海上,其中只损失了167艘。协约国军队的战斗力从未被削弱。美国军队顺利越过了大西洋,而德国的末日在那几个月中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这一精彩的故事还有两个续篇。当海军部作出了采取护航措施这一重大决定后,第一海军大臣要求战时内阁放弃萨洛尼

卡行动,并让协约国军队撤出巴尔干战场,以减轻海军的压力。他有证据证明这样可以节省40万吨的运输能力。萨洛尼卡和巴尔干战役都是劳合·乔治的得意之作,但是海军部同意护航令他大大地松了口气,于是他于1917年4月30日同意放弃这两个战役。法国也被迫同意了这一条件。然而负责外贸部的次官利奥·奇奥赞·莫奈爵士提交了一份得到了运输部首肯的报告,报告中说,如想节省40万吨运输能力,可以将协约国军队军需的运输从世界各地往返运输改为从美洲运输来实现,并且美洲有足够的供应能力。这一方案被采纳了,因而萨洛尼卡的陆军得以继续作战。现在我们都知道,正是由于1918年10月保加利亚的投降才导致了日耳曼帝国的最终崩溃,不然,德国军队就会撤至默兹河或莱茵河地区,世界可能还需再血战一年,又会增加二三百万的伤亡,我们日益减少的财富就会被再消耗掉10亿—12亿英镑。

第二件事相比之下是件小事。1917年5月初,已经同意战时内阁的护航决定的海军部要求华盛顿海军部采取同样措施,然而美国海军当局从辛姆斯上将的报告中得知英国的护航方案是政治干预的结果,英国水手们放弃了自己明智的主张,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拒绝采纳他们认为是非专家、非专业的建议,拒绝让他们的船只去冒风险。直到几个月后护航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有目共睹的成功后,他们心中深深的疑虑才最终消失了。

协约国海军将领在护航问题上态度勉强,陆军(无论是协约国军队还是敌军)在对坦克运用的意义的认识也很勉强。这两件事旗鼓相当。在这两件事中,都是来自外部和下层的力量最终迫使军方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多佛尔拦截网

一艘潜艇如果绕道奥克尼群岛进入英吉利海峡或其他目标海域,大约需要一个星期,但如果它能穿过多佛尔海峡的峡口,只需一天时间。如果潜艇的续航能力是两周的话,这就节约了7天时间。如果那些小潜艇能安全通过多佛尔海峡,那么德军能投入实战的潜艇数量几乎可以翻一番。因此封锁多佛尔海峡和与海峡毗邻的比利时港口非常重要。封锁海峡以阻挡敌军的所有船只,这一战略使多佛尔从战争之初起就成了一个战略要地。培根上将于1915年就来到了这里,并于1916年从古德温^①暗沙至比利时海岸布下了一张横穿海峡的拦截网。

人人都盼望这张拦截网能有奇效,而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却真的使它名声大震。1916年4月24日,也就是布下拦截网的当天,德军总司令施尔上将接到命令,要求限制潜艇战。德国政府决定在击沉商船之前必须先让商人们安全登上救生艇。为表示抗议,施尔停止了她的潜艇战,因此,有几个月没有一艘潜艇通过海峡,而这一暂时的休战却更加让有些人相信是他们的拦截网阻止了敌人的潜艇。

很多才能出众的人对这发明有着牢不可破的错误信心。拦

^① 古德温:英国多佛尔海峡北海口处的一系列暗礁,长达10公里。地理名为古德温暗沙。

截网能够阻止潜艇这一幻觉使培根上将本人也成了受害者。他是个既有辉煌功绩也有失败教训的能干军官,属于技术型人才,他是个杰出的公式专家,能把复杂的设计讲得通俗易懂,对比利时海岸的轰炸便能体现出他的极高的数学水准。在大战初期,他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内造好了15英寸口径的榴弹炮。只要是说到机械、发明、组织、精确,几乎没有谁的专业水平比他高。他是一位优秀的器械专家。

到了1917年秋天,新成立的海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非常肯定敌人的潜艇正悠闲地通过多佛尔海峡,拦截网既没有成为一道屏障,也没有威慑力。计划处负责人,海军少将凯斯,首先向他的海军部上司报告了这一不幸的事实,然后又向他们提出了很多补救措施。海上防御措施本来主要是由那些挂在浮标上的拦截网加上巡逻艇的偶然巡逻以及精心布下的水雷区组成。那些对战前海军的布置提出过批评的人曾经客观地对海军的水雷表示过不满。费希尔^①勋爵在早年任职期间就公开反对使用水雷,下属部门只能在严密保护下躲在非常秘密、偏僻的地方造水雷,这就难怪在大战之初有的水雷不能投放到预定深度,有的被撞上后也不爆炸。即使是这种有毛病的水雷数量也不多。在海军部制定总战略时,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精心布雷和反布雷手段。然而现在大战已经进行了3年,当我们连一个像样的海上防御计划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水雷却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到1917年6月左右,很多新造的、质量可靠的水雷出厂。到11月,在多佛尔海峡已布置了很多新的深水雷区。

^① 费希尔(1841—1920):英国海军上将,曾任第一海务大臣,改革英国海军,造“无畏”号战舰,使英国获得海上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反对达达尼尔战役而辞职。

1917年冬,海军部作战计划处与多佛尔指挥部的矛盾已很激化。凯斯上将声称培根上将的现行措施根本无法阻挡德军潜艇,他认为所有水雷区不仅要有拖网渔船、流网渔船和尽可能多的小船巡逻监视,而且这些水雷区必须用灯光照明,必须有积极的保护,这样才能将那些在海面上摸索前进、随时准备潜入海中的潜艇的活动探测出来。随着警报声、吆喝声、大炮轰鸣声的响起,潜艇会赶紧下水,然后会因慌不择路逃跑而撞上我们的一颗水雷。然而培根上将反驳说,潜艇看到灯光时便会避开水雷区;如果我们的驱逐舰一直在多佛尔海峡上巡逻,那么德国人迟早会派出很强的海军舰队来摧毁它们。另外他还争辩道,德国潜艇正在穿过多佛尔海峡的说法本身就不可信。

谁都能看出就此事进行争论的架势已经摆开。海军参谋部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作战计划处是正确的。一艘在浅水区被击沉的编号为 U. C. 44 的德国潜艇已经被打捞出海,艇长航海日志中清楚地记载了不断有德国潜艇通过多佛尔海峡的确切日期。事实上,日志里记录了他们的整个航行日程安排和他们碰到的好运气。德国潜艇指挥官们被告知,他们的潜艇无论是从水下还是海面上都可随意通过多佛尔拦截网。当然这里不排除德国人提供的数字有值得怀疑之处的可能性,然而作战计划处却对这些数字坚信不疑,而多佛尔指挥部则继续固执己见。

1917年深秋,作战计划处开始对多佛尔拦截网的实际效果提出批评,并断言德军潜艇正畅通无阻地通过培根上将把守的海域。这位海军上将不仅很不高兴,而且也不礼貌了。双方用冷冰冰的措词以公文形式来来回回交换了不少意见,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要不要在设了水雷的海域安装照明装置这一问题上。让大片海域灯火通明,上面由渔民驾驶的毫无御敌能力的拖网渔船担任警戒,这看起来确实像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提出

的建议。有人可能还会说稍懂常识的人也不会采取这种补救措施。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海军参谋部恰恰是正确的,而那些在前方作战的将领们却恰恰是错误的。事实证明,除非在海面上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否则拦截网和水雷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杰利科上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在开始时是站在培根上将一边的,但最后他被作战计划处说服了。1917年12月18日,得到第一海务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的慷慨同意后,杰利科上将命令培根采用作战计划处的巡逻防御体系。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新体系在试行的第一天夜里就见效。12月19日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在海军舰队和海军部长长期任职、已经被搞得筋疲力尽的杰利科上将被解除了职务。接替他的是他的副手威姆斯上将,这位脾气暴躁的军官尽管知名度不高,但他要充分发挥参谋部作用的决心为他赢得了好名声。培根上将被解除了多佛尔指挥部的领导权,作战计划处负责人对培根意见最大的凯斯被派到多佛尔,他想证明自己是否真能把工作做好。

尽管可能有运气方面的原因,但接下来的结果是惊人的。在以后的6个月内,有11艘潜艇在多佛尔水雷区或执行任务途中被击毁。在护卫舰的配合下,英吉利海峡的沉船数量迅速下降。德国潜艇想要通过多佛尔海峡就必须冒极大的风险。

1918年,自泽布勒赫^①驶出的潜艇平均出航不到6次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厄运。到了夏季,再也没有德国潜艇企图通过多佛尔拦截网了。

官方历史总是刻意淡化事实,然而所有明显的事实毕竟被记录在案。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海军中的初生牛犊之辈与老于世故、有崇高威望的权威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和政

^① 泽布勒赫: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治生活中屡见不鲜；在大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政府制度及命运的决策中也常能看到。当然对多佛尔拦截网的争议也是有关护航制度争论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续篇。最终是首相、战时内阁和第一海务大臣使这些新思想战胜了顽固的老资格。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部门都是倾向于或努力朝着、并最终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然而，多佛尔的新指挥官也有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在灯火通明的水雷区执行巡逻任务的船只成了德军袭击的活靶子，那些执行任务的渔船实在是不堪一击。大约有 100 艘不具备战斗能力的小船——包括拖网渔船、流网渔船、摩托艇、吃水较浅的扫雷舰、老式用煤作燃料的驱逐舰以及中央竖有监视塔的客轮——都暴露在探照灯光中。这片海域犹如和平时期的皮卡迪利大街^①一般明亮，里面的住户几乎都没有很好的武装，只是在向东几英里外的海域里有几艘驱逐舰巡逻队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保护。但假如敌人逃过了这些巡逻舰的监视，一场大屠杀就不可避免了。敢于承担这一可怕的责任是凯斯思想的精髓。权衡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唯有走这条道路所冒的风险最小，然而这风险本身却并不小。

1918 年 2 月 14 日，德国从赫利戈兰湾调遣了他们最好的舰队指挥官和 4 艘最新的、最大的驱逐舰，对多佛尔拦截网海域的拖网渔船进行了血腥屠杀。由于黑暗中弄错了信号，而且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6 艘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驱逐舰居然不可原谅地将敌舰误认成是友舰，致使敌舰成功地逃向了北方。渔民们对此非常气愤，他们觉得皇家海军并没能像他们保证的那样成功地为他们提供他们理应得到的保护，他们觉得每天夜里

① 皮卡迪利大街：伦敦著名、繁华的街道之一。

自己都有可能受到敌人残忍的袭击。有一段时间，他们对新任多佛尔指挥官，甚至对皇家海军，已失去了信心。

曾经预言过会发生此事的培根上将觉得自己的论点得到了验证，他觉得自己有权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有如此结局”。凯斯的名声岌岌可危。幸运的是，这些坚定的具有新思想的人往往能团结起来维护共同的思想体系，而且他们已掌握了海军部的实权。凯斯不仅逃过了这次劫难，而且圣乔治节^①在泽布勒赫谱写下的不朽的辉煌史诗不仅使海军部恢复了对他的信心，还让渔民们恢复了对他的信任。

同时公众和报界也对这次胜利进行了高度赞扬。即使赞扬过了头，历史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① 圣乔治节：4月23日为圣乔治节。

鲁登道夫的“孤注一掷”战略

大战开始后,德国唯一的求和机会出现在1917年冬。俄国已经垮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①也签署了,强大的“蒸汽压路机”现已成了躺在阴沟里的一堆废铁,德国第一次无需为东部前线担忧。鲁登道夫可以将100万军队和几千门大炮调遣到西线。自1914年开战以来,德国第一次在兵力上超过了英法军队。

美国已经参战,于是协约国有了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兵源。但是美国军队还在遥远的美国进行组织和训练,并且每次只能运送几万人越过大西洋。要让这一巨大的新战斗力在战场上显神威需要等好几个月。在俄罗斯垮掉之后与美国的力量能真正发挥出来之前,一定会有一段漫长的生死攸关的间隔,这段间隔正是危机之所在。

1917年4月尼维尔将军进攻失败后,法国军队中发生的兵变使法国在1917年余下的几个月内的防御形势极为紧张,英国军队不得不承担起主要任务。在法国人的请求下,在岌岌可危的法国命运以及海军部的悲观情绪的影响下,加之英国高层指挥部信念坚定,于是英国陆军对德国的坚固战线发起了连续的

^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一战中同盟国于1918年2月和3月分别与乌克兰和苏俄签署的和平条约。

背水一战式的进攻。

英国总司令部错误地认为他们一定能够突破德国防线,而法国实力暂时的削弱使他们更有理由坚持他们的观点。“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突破敌人防线;即使不能,我们也必须坚持进攻,以减轻法国目前的重负。”接下来是一系列有计划的、坚决的、顽强的进攻:4月份的阿拉斯攻势,元月份的梅辛斯攻势,以及帕森达勒的秋季攻势,这些进攻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最后在帕森达勒的冬季战役中,在法国作战的英国军队几乎陷进了佛兰德的泥潭,淹没在德军的机枪火力之中。德国官方说,“雨水自始至终都是德国的同盟军。”当英军在帕森达勒弹坑遍野、沼泽纵横的战场上发起最后一次悲壮的进攻时,英军已是“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死伤人数几近30万。

纪念碑上记录下了大约2万多名将士的英名,这些英雄的尸骨永远埋在了他们曾经激战过的那片巨大的弹痕累累的沼泽地里。

就这样一年结束了。法国人的元气没有恢复,英国人陷入了泥沼,而美国人又遥不可及,同时俄国的垮台不仅使德国指挥部得以有力地巩固西部战线,而且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可以讨价还价的条件。俄罗斯的欧洲领土都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布尔什维克断绝了与协约国之间的一切关系,他们不仅抛弃了一切义务,甚至甘愿放弃协约国对俄国允诺的义务,现在有谁还会关心俄国呢?沙皇已落到了暴徒的手中;那些忠诚的军官和军队有的溃散了,有的被消灭了。就连那些尽心尽职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现在也是或遭杀害,或在逃亡。俄罗斯与西方协约国之间的一切纽带都被割断了。如果说德国军队在战场上挽救了自己的祖国,那么现在该轮到德国政府将德意志帝国从它误入的可怕的灾难中撤出来了。

随着帕森达勒炮声的渐渐消失,随着英国军队在冬季的休战,战争双方的各国政府都有了可以冷静思考的时间。即使是顽强的英格兰也暂时冷静了下来。停战给了人们足够的时间去体验伤痛——多么巨大而令人恐怖的创伤啊!即使到了1918年1月或2月,如果德国同意恢复比利时的领土主权,解决与法国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的纠纷,并且就德国从俄罗斯获得的利益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双方也许就有了进行磋商的基础。

但是军需兵第一司令鲁登道夫自从被提升为德军总参谋长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大权独揽。鲁登道夫有不同想法。德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议会产生出类似于掌握着英国和法国政权的有胆识、有闯劲的人物。在德国,一切都得为军事目的作出牺牲,因此每次总参谋部都能达到目的。现在,这个既能使德国强大又能使德国毁灭的强权机构事实上正在走鲁登道夫独裁路线。

我们该说说这个非同寻常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他爱他的国家,但他更爱他的事业。他的事业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一旦失败已成定局,那他就会用尽一切资源破釜沉舟,不放过任何机会,只要还有一线生机!

西部战场猛增了100万兵力和3000门大炮,1917年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加紧建造了一年的大炮,酝酿了采用空袭部队和渗透战术为主的新的进攻方案,难道有了这些条件就有获胜的机会吗?德国还没有亮出它最好、也是最后一张王牌,难道这就意味着它要退出比赛吗?妄想!只有当总参谋部不得不通知政府,说自己已用尽了最后一个机会、已使完了最后一丝精力,这时他们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常言说得好,“能让其他人冷静下来的思想也能煽起德国人的热情。”一个伟大的构想,一

个无论从进攻规模还是强度、无论从战术运用还是谋略上都空前的帝国梦，也许能将胜利从正慢慢闭合的灾难的鬼门关里抢回来。无论是从构想本身，还是从它所能引起的后果来看，这难道还不算是出类拔萃的吗？制定这样的计划，让这么强大的力量运转起来，产生壮观的后果，进行殊死一搏——这些东西本身不就很值得去做吗？

于是，11月11日——这是上帝安排好的日子，德国战败日正好是一年之后——鲁登道夫在蒙斯^①——这也是上帝安排好的地方，英国军队在此打响了大战第一枪，又在此鸣了大战最后一枪——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由几位战争魁首召开的秘密会议。包括皇帝、国王们和王子们、军队高级指挥官们、帝国总理、外交大臣及国会重要成员在内的所有人都未准参加。

这儿进行的是一笔大买卖——计算精确，冷酷无情，意义深远。只有总参谋部的高层人员，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志同道合、一心只想着战争的人才能参加！这是一个小型会议，与会者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少数几个卓越的军事专家，这些人对本职工作内的知识了如指掌，但毫不顾及其他领域内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鲁普雷希特集团军总参谋长科尔，王储的亲信、王储所辖集团军司令舒伦堡，鲁登道夫的高级顾问韦策尔，以及鲁登道夫本人。会议的总前提是：“我们终于有了足够的枪炮弹药和军队，可以在西部重新发动反攻，我们可以赶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击垮法国和英国军队，我们有6个月的优势。”

由此而产生以下问题：我们该怎样做呢？鲁登道夫宣称：“英国人必须被打垮。”

问题：我们应首先在佛兰德—哈泽布鲁克方向进攻还是沿

^① 蒙斯：比利时西南部一城市。

圣昆廷方向往南进攻呢？假如在北部发动攻势，有很多情况必须加以考虑，但有一点绝对能证明从北部进攻是不利的。

进攻不可能在3月份就开始，因为那时天气太恶劣了，地面也太潮湿；但不可能等到4月或5月再进攻，因为我们必须争取时间。美国军队快来了，而且我们又已经教会了协约国军队如何使用芥子气，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早些向英军发起进攻，并且因为天气的原因，战线要尽可能靠近南部英军前线。因此鲁登道夫提议必须夺取并守住索姆，然后向北进攻，对英军形成圈击之势，最后“将他们赶进大海”。

科尔赞成从佛兰德地区进攻，哪怕因此需等一个月。韦策尔则赞成在凡尔登一线发动进攻。自11月11日至目前的长达6周的争论中，他力图证明凡尔登进攻方案效果最好，因为它最适合于对付“不讲究战略”的法国人。根据他的看法，佛兰德进攻方案无论从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不错，但他认为这一方案应放在最后总攻时再采用。如果3月份英国人在佛兰德受到袭击，那么法国人就可以在南部地区发起救援攻势；然而如果凡尔登遭到袭击，那么3月份的地面状况会让英军无法得到支援。他对圣昆廷进攻方案提出了强烈批评。这也难怪，因为那是“一条安静的战线，任何进攻准备活动都会被发觉”，所以突袭战略很难实施。英国和法国都会派兵增援。德军还必须穿越荒芜的索姆战场，穿越曾经被德军和协约国军队坚守过的很多防线。韦策尔对上司的意见显然是言听计从，于是他丢开自己的方案，又提出了一条对英军进行两面进攻的方案：首先在3月份的第三周在圣昆廷发起进攻（代号“迈克尔和马斯”），然后于2周后，向哈泽布鲁克发起进攻（代号“圣乔治”）。

鲁登道夫与总参谋部其他两位领导一起视察了所有前线，并与有关的5名陆军指挥官商讨过进攻方案后，于1月21日推

翻了凡尔登和哈泽布鲁克进攻方案。他力排众议,选择了圣昆廷进攻方案,这一选择是由他做出的,也是他的个人选择。

下面是奉命摧毁英军的炮兵数量:野战炮连 375 个;重炮连 297 个;超重炮连 28 个。

大炮的具体数量分配如下:第 18 兵团 2 500 门;第 2 兵团 1 800 门,第 17 兵团 1 900 门,总共 6 200 门。

进攻方案如下:

早晨 4:40 进攻开始(持续 2 小时):先对我军炮兵连、战壕迫击炮组、指挥部、电话交换中心以及军需临时堆放处进行 50 分钟毒气战,然后对我步兵阵地进行 10 分钟的突然袭击,然后将上述步骤重复一遍。

10 分钟炮击,共 3 次,以校准射程。

对步兵阵地实施 70 分钟的有效炮击。

对步兵再进行 75 分钟的炮击,但其中有两次分别持续 15 分钟和 10 分钟的强火力炮击。

最后,炮击 5 分钟,为步兵进攻作好准备。

在如此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德军 66 个师的兵力将于 3 月 21 日凌晨对由 19 个师把守的英军阵地发动进攻。

读者不难看出战争的艺术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倒退年代里,战争所能表现的只能是一群大机构通过操纵机器对人类进行的屠杀;它已经沦落为与芝加哥宰牛场差不多的境地。总的来说,这次进攻——一次与帕森特勒战役同类型的、规模更大的超级进攻——是战争编年史上最可怕、最惨无人道的战役。这次战争的规模、手段都体现了鲁登道夫的风格,是他终生处心积虑的结果,也是他所掌握的知识的精髓,

这就是他的精确思想的具体表现。那些要求德国趁机与协约国和解的强烈呼声以及牺牲卑鄙的俄罗斯以换取双方和平的强烈主张对鲁登道夫来说都不重要。德国的工业家们在冬季曾向他提出过很实际的警告,说明战争持续下去是危险的,但他充耳不闻。这一切对他来说不过是一层模糊的薄雾,中间摆着他自己的那颗巨大的、炽热的炮弹。拉动那根导火线、按下那个按钮、射出那颗炮弹、将那膨胀的能量释放出来,这才是最终目的。

这一情绪对军人来说是无可指责的。在职业圈子里就应该重视本职工作中的问题,当将军的就应该以一个将军应有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你不能对他求全责备,因此鲁登道夫只能考虑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德国人民的问题。自战争爆发后,德国就惊恐地发现自己竟有那么多的敌人,同时也被敌人的不可抗拒的战斗力和坚强毅力以及敌方令人敬畏的愤怒情绪惊得目瞪口呆。这一切再加上粮食、肉类和副食品的缺乏使德国人民一心盼望着能有条出路。出路确实是有的。

严冬使帕森特勒的炮声渐渐平息了下来,接着协约国国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尖叫声、哀鸣声和讨价还价声。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德国人则认为德国已经着火了,整个德国大厦都在燃烧。消防员们用最好的消防器材无畏地与烈焰搏斗着,然而火势不减,大火就好像扑不灭似的。大厦随时都会倾塌,大厦中的人和财产随时都会毁于一旦。就在此时,在火光中,东方的门廊上清楚地写着“紧急出口”几个大字。然而德国人却被禁止使用这一出口。

这就是日耳曼帝国的致命的弱点:它的军事领导人对自己的本行了如指掌,但对其他事务则一窍不通,然而他们却自认为是德国的主宰者。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德国国家政策的主宰者。大战时期的法国,哪怕是在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尽管政府的

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仍然掌握着最高决定权。法国总统、总理、国防部长、议会以及那个被称做“巴黎”的综合体,始终有权解除任何军人的职务,将他撂在一边。在英国,议会基本上被搁置在一旁,新闻媒体使那些自称为“战士”的将军们名声大震;尽管如此,英国毕竟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阶层和统治集团,如果他们不怕丢官弃职,他们就会与那些“黄铜帽子^①”搏斗一场。美国的政府机构权力更大,他们的主要任务便是抚育、壮大那些羽毛未丰的斗士们。在德国,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总参谋部,没有人会为拯救国家而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意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一艘巨型战舰冒着蒸气驶向战场,战舰的甲板上有几个穿着笔挺军服的傀儡,机械地打着手势,他们说的话是从留声机里播放出来的。机械师实际操纵着这艘船,又通过这艘船操纵着整个舰队,他根本就看不见所发生的一切。他将自己关在吃水线以下的甲板下的轮机舱里,怎么可能看见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将所有的锅炉都填满了燃料,关上所有安全阀门,船舵已经卡死了。他二话不说,只是疯狂地命令:“全速前进。”

亚历山大^②、汉尼拔^③、恺撒、马尔伯勒^④、腓特烈大帝^⑤、拿

① 黄铜帽子:指英国高级将领因他们帽檐上镶有金边,故名。

② 亚历山大:俗称“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523—356),马其顿国王,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并入侵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③ 汉尼拔(公元前247—183或182):迦太基统帅,率大军远征意大利,从而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曾三次重创罗马军队,后被罗马军多次击败,服毒自杀。

④ 马尔伯勒(1650—1722):英国著名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650—1722)中统率英荷联军击败法王路易十四。

⑤ 腓特烈大帝:即腓特烈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维护农奴制,扩大军队,发展经济。

破仑等人都是全才，而鲁登道夫只学到了局部知识，他对这部分知识十分精通。我们不能贬低为了胜利而甘冒一切风险这一可怕的高贵品质，但是除此之外，权力人物还必须具有其他品质才能使国家经受得住哈米吉多顿战场^①的考验。在德国，这些其他品质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受到了严厉的压制。

现在还不是叙述3月21日那场伟大战争的时候。人们都知道英国第五兵团在损失了15万官兵和1000门大炮后是如何后撤的，也知道德国是如何不断向亚眠挺进的；人们都知道贝当^②将军是如何决定断绝与英军的联系以集结法军所有的兵力捍卫巴黎的，也知道这一看似脆弱的防线是如何被坚守住的；人们都知道英国的左手和法国的右手，正如过去的4年一样，是如何紧握在一起直到最后胜利的。在此，我主要谈谈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巨大的反响。

鲁登道夫发动的攻势所造成的危机和危险促使协约国和美国行动了起来。过去是我们对德国坚固防线进行致命的打击，而今我们必须为生命而战。自从马恩战役之后，协约国认为胜利已成囊中之物；尽管胜利之日会延期，尽管会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毫无疑问胜利肯定是属于协约国的。对德军的进攻不是为了赢得大战（因为他们似乎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是为了向急于求和的敌人提出苛刻条件。对于是否有必要对德军发动进攻，即使那些坚定的主战派也是莫衷一是。1917年秋

① 哈米吉多顿：见《圣经》，指世界末日善恶的决斗战场。

② 贝当(1856—1951)：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凡尔登战役，但二次大战时任维希亲纳粹政府元首(1940—1944)，1945年被判无期徒刑。

季,我们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兰斯唐勋爵的信,同时社会主义党人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大会;此外,波旁六王子参加了谈判,斯穆茨将军与门斯多夫伯爵在瑞士举行了会谈。

现在疑问消除了。现在的战斗不再是为了在谈判中向敌人提出苛刻条件的问题了。对协约国来说,失败的命运迫在眉睫,协约国可能等不到美国援助的到来就失败了。尽管目前的灾难是巨大的,但它重新唤起了英法两国的士气和斗志,同时也激发了美国人的最大的热情和努力。没有人再去想什么和平或和谈了。战时的反德联盟从来没有如此坚强有力。英国把兵工厂、矿山和大小作坊全都利用了起来;征兵年龄范围改为19—55岁,一下子就调集25万兵力过了海峡,同时在一个半月之内补充了上千门大炮。就这样,英国军队顶住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迈克尔和马斯”行动刚结束,“圣乔治”又在哈泽布鲁克降临在我们头上。不管怎么说,防御并未失败。

直到3月21日,美国还在精心地、有条不紊地、慢吞吞地准备着它的军队。尽管这一伟大的共和国已经参战一年多了,但在法国的美军总共只有6个师,其中仅有两个师战斗在前线。美军司令部自然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美国军队以军团或兵团形式调集到战场,至少必须以师为单位参加战斗,最后将所有的美国军队统一成一支巨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军。在大西洋两岸,美国正在不停地加紧对军队的操练,但同时协约国在德国的打击下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①向美国提出了最强烈的呼吁,要求美军加快运输速度,并且要求不管有没有形成一个师,先将步兵运到欧洲,让他们加入英法军队的旅、甚至

^① 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理(1906—1909;1917—1920),有“老虎”之称。

营里去参加战斗。

防守失利的第二天,潘兴^①将军与他的军事和非军事同仁一道通知法国政府,在法国的所有美国部队,不管受训与否,将马上就投入战斗。当威尔逊^②总统接到英国的请求,要他将成千上万名士兵和未训练完毕的几个师送到大洋彼岸时,他答复了里丁勋爵,他所用的措辞让全英国都记住了他:“大使,我会尽他妈的全力的!”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到,威尔逊总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大批美军跨越了大西洋。在2、3、4三个月内,美军才运来了4个师。但是从5月份开始,总统的决心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开始见效。5月份共有8个师(每个师约3万人)越过了大西洋。接着,6月份又是8个师,7月份4个师,8月份6个师,9月份5个师。在英国海军潜艇的护卫下,在这4个月内大约有100万兵力从美国航行到了欧洲。尽管在鲁登道夫对英军的攻势被打垮前,只有几名美国铁路工程师和大约4个师的兵力在前方作战,但是这座巨大的兵源库源源不断地向欧洲输送力量,为协约国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保证。

3月26日的多伦斯会议既是战争的高潮,也是英法军队重整旗鼓的转折点。代表法国的有克列孟梭、普恩加来^③、

① 潘兴(1860—1948):美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

② 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民主党人,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获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

③ 普恩加来(1860—1934):法国总理(1912—1913;1922—1924;1926—1929),法国总统(1913—1920)。

福煦^①、贝当,代表英方的有米尔内、黑格^②和威尔逊。会上的气氛既严肃又紧张。这些已经经过大战锤炼过的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着最严酷的现实。法国人目光忧郁地审视着协约国军队遭受的巨大失败,审视着他们用巨大牺牲刚刚换取的法国领土再次沦陷于侵略者的手中,而法国军人则悲观地注视着协约国的节节失败。夜不成寐、形容憔悴、筋疲力尽的第五兵团在强大的德国军队面前似乎已显得毫无军事价值。有一次克列孟梭曾对我说,有位级别很高的法国将军曾对他说(指的是黑格):“在两周之内会有一位指挥官不得不在战场上投降或亲眼看着自己的军队被打垮。”后来他把这件事写进了回忆录。我一直纳闷,这位将军会是谁呢?

而英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他们是如何于1917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牺牲,也不会忘记如何因法国方面的压力而被迫将已受重创、满是伤兵的军队放置在拉长的战线上,更不会忘记贝当的支援是多么的迟缓,多么吝惜。两天前贝当宣布不管英军会不会“被赶下海”,他决意断绝与英军的联络,英国人真是被他这一令人心灰意冷的决定惊呆了。

当时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事实上,双方长时间沉默后偶尔才会交换一点意见。只要能得到法国人的大力支援,黑格愿意牺牲自己独立的指挥权。而克列孟梭决心不遗余力,他说,“现在不是我们该从哪条战线抽出兵力来的问题,而是他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目前的战场。”贝当,这位冷静、训练有素的

① 福煦(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法军参谋总长,曾任协约国军总司令。

② 黑格(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战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

指挥官,在“老虎”的注视下已经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宣称,现在必须全力以赴保卫亚眠,但是此刻只有斗志昂扬的福煦才担当得起目前的重任。英法双方决定不顾一切危险,联合起来,对法国的各条战线和佛兰德战役进行统一指挥。

在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危急关头,在震耳欲聋的隆隆炮声中,福煦接受了这一伟大的使命,他光荣地完成了使命。

和克列孟梭在一起的一天

自1918年3月21日德军攻破我防线后,我晚上常睡在军需部的办公室里,这样我醒来后就可直接工作。28日早晨,首相叫我去一趟唐宁街。我发现他还没起床,花白的头发埋在一大堆报告、电报中。他一大早就开始在这堆东西中耕耘,用红笔又是圈又是划,希望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权威部门的说法不一的信息中理出个头绪来。到他手中的消息都经过了层层筛选,每个重大事件都已压缩到最少、最精炼,只剩下了最重要的事实、最秘密的情报和最权威的意见;但是不管怎样精选、修剪,最后汇集于此的东西还是数量可观,就连这样一位训练有素的速读专家也得花上两三个小时才能看完每日的重要简报。

劳合·乔治先生问:“你能抽出几天到法国去一趟吗?”

我回答我们已采取措施补充我们已损失的军需品,如果这些措施能完成,我应该是有一时间的。

“这就好,”他说,“我搞不懂法国人在干什么。他们还要不要阻止德国人的入侵?他们再不努力,德国人就会攻破我们的防线,把我们赶下海。我们的总指挥部不清楚法国人想干什么。报告显示这儿有几个师的法军,那儿有几个师的法军,但他们想干什么呢?他们的军队在移动吗?成千上万的士兵会出现在战场上吗?他们会从什么地方加入战斗?何时加入?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你能不能去调查清楚?到那儿去,会会他们。你

就代表我去，去见见福煦，见见克列孟梭。你亲自调查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会采取大行动。”

大约7点钟，我与威斯敏斯特公爵一起出发了。我们乘坐一艘驱逐舰过了海峡，然后乘车前往巴黎，途中在蒙特勒伊的英军总司令部停留。这座宁静的欧洲小城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倾盆大雨的哗哗声。这座小城指挥着周围60个师的英国军队，其中有一半正在浴血奋战，拉巴塞以南战斗最为激烈。第五兵团的余部正在穿过弹坑遍野的旧日索姆战场奔赴亚眠。宾^①率领着第三兵团正在激战。无论是前线各部队还是后方的兵站、训练营，所有能腾出的兵力、能找到的后备力量、能扛枪打仗的人都被召集了起来，从铁路或公路被送往战场，以阻挡德军潮涌般的推进。对这一切我略知一二。然而，与五六十英里外的5万码长的战线上殊死搏斗和连天炮火相比，这一座军中超级枢纽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催眠状态就显得太不正常了，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在办公，到处都是水波不兴的样子，总司令在做午后散步。如果对大战的形势不了解，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正在从容地、有效地指挥着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最激烈的一次大战。

我在司令部办公室见到了参谋长本人，他掌握的情况都已传给了伦敦。他一边与我交谈，一边用电话调遣着从前线各停战区东拼西凑来的军队，看到他，你就会明白被命运操纵着的人是个什么样子。战斗正在吞噬着他的后备部队，敌人仍在不断地从各个决口涌进来，敌人的战线不断向前推进，一旦有军队从战事不激烈的地区调出来，这个地区很可能马上就会遭到新的打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德军正在英军防线的北部大量集

^① 宾(1862—1935)：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空前大规模坦克进攻；1918年攻破德国的兴登堡防线。

结步兵和炮兵。那边随时都会有另一次可怕的进攻。我方牺牲和被俘人员达 10 万人,并损失了 100 多门大炮,还有几万名伤员正源源不断地从医院运回英国,这使得有关部门不堪重负。

法国人想干什么呢?他们会竭尽全力采取行动吗?他们会德军由南向北伸展的侧翼进行狠狠打击吗?如若不然,英法两军可能会被隔开。参谋长指着地图告诉我那几支正在参战的法国军队。但是他们的主要意图是什么,他们主攻目标是什么,对此他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就在此时有封电报称德军已经攻下了蒙迪蒂。对此参谋长只说了一句,“毫无疑问,他们正在竭尽全力。”

此时外面还在下雨,我们继续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亚眠正遭轰炸,但我们一路上却没有看到轰炸的情景,也没有见到从亚眠到博韦的公路上有炮弹落下。薄雾和大雨遮住了炮火的闪光,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盖过了远处的隆隆炮声。博韦街头到处都是法国军队,旅馆里住满了军官。兵团司令部刚刚到达,火车站不断有运送部队的军列进站。到达巴黎已是午夜,我们住进了几乎没有客人的豪华的里茨饭店。

第二天早晨我要求我们的驻法军事代表萨克维尔·韦斯特将军,我想去见克列孟梭先生,跟他讲明我此行的目的和性质。中午时他回来了,“老虎”答复如下: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不仅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而且明天我还要亲自陪他到前线,我们将一起与有关军团和兵团的指挥官见面。”

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着处理与军需有关的我军在巴黎的设施,目前这些设施的规模已很庞大了。德军的远程大炮每隔半小时就会将炮弹送到巴黎城内,晚上,巴黎闹哄哄地闹了一次空袭,但有惊无险。第二天早上 8 点我们便从国防部出发,前往前

线。

3月30日上午,5辆插着三色旗、代表着最高权威的汽车停在圣·多米尼克大院里。克列孟梭先生分秒不差地走下了国防部宽敞的楼梯,陪同的有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将军和两三名其他高级官员。他用流利的英语热情地欢迎我:

“亲爱的威尔逊(注:发音错误)·丘吉尔先生,对您的到来我非常高兴。我将和您一起到任何地方、看所有的一切。我们将看到福煦,我们将看到德布奈,我们将见到军团司令员们,我们还将一起去见著名的黑格和罗林森。所有该知道的,所有我知道的,您都会知道。”

他与他的那位将军一起钻进汽车,车调头就开走了。法国军械部部长,即我的法国同行路邱尔先生邀我一起乘第二辆车。参谋人员分乘其余3辆车。过了巴黎障碍区后,我们的车速达到了每小时70多公里。汽车在泥泞路上颠簸,遍布战壕的乡野在向北疾驰的车窗外闪过。随着我们疾驶而去,巴黎和它深重的灾难也从我们的眼前和心里慢慢消失了。路邱尔和我有不少话要谈。我们的军需事务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随着德军的推进,巴黎一旦处于常规炮火的射程之内,我们俩都会遇到极大的难题。我们所有的大设施,包括几家最重要的飞机制造厂,必须及时撤离,搬到巴黎以南100英里处。但是想在保证不影响目前生产的情况下抽调人力去建新厂根本办不到。而且巴黎的工厂必须坚持生产至最后一刻,以防协约国军队急需飞机和其他军需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敌人的战线已逼近巴黎,所有这些复杂问题都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一路上专心讨论着这些问题,将这几天压在我心头的其他灾难都赶跑了。

不到两小时,博韦教堂的尖顶就映入了眼帘,不一会车就停在了市政厅门前。克列孟梭下了车,接着我们都下了车,我们沿

着通向二楼的一个大房间的石阶快步而上。双开门拉开了，里面站着刚刚上任的协约国军队西线总司令福煦，简单寒暄之后我们进了房间。陪同福煦的有魏刚^①和其他两三名军官。房间里总共约有十几个人。门关上了，墙上挂着一幅约有2米见方的地图。地图上标的主要是德军突破后遭受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战线位置，从阿拉斯以北一直到兰斯附近。福煦将军拿起一支粗大的铅笔，就好像那支笔就是武器，二话没说，径直走到地图前开始讲解形势。我对他与众不同的讲解风格早有耳闻：语言生动、善于用手势。他习惯于用身体语言来强调和描述他想要讲的行动或他所想表达的观点。他不仅描述生动，而且说话也铿锵有力。他的这些特点在他执教过的军校和指挥过的军队里一直有人议论，有人嘲讽，但同时也有人崇拜。他讲话很快，而且话题跳跃性大且没有规律，我根本无法精确地理解他的话，但是他不听的形体动作和关键词还是让我清楚地明白了他想表达的主旨。我不可能记下他的长篇大论，但主要意思是：“自21日战斗开始后，德军于22日攻破防线。看他们到了这儿。入侵第一步。噢！噢！噢！多大的一步！”他指着地图上的一条线说。

“23日他们又推进了。入侵第二步。噢！噢！又是一大步。24日，第三步。噢！噢！”

但是第四天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地图上划的线可以看出，德军第四天占领的地盘比第三天要小。司令转向大家，身体左右摇摆，两只手就像是天平上的两个秤盘。

“噢！”他说道，“第四步。噢！噢！”

^① 魏刚(1867—1965)：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参谋长，二战中曾任维希政府国防部长。

我们都知道德军洪水般的推进遇到了什么情况。当他讲到第五天时，被强占的地域又小了不少。第六天、第七天被德军攻占的领土还在缩小。福煦的语调已经低到如窃窃私语。当他打着手势、耸着肩指着那些越来越小的敌占区时，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最后他说：“昨天，敌人跨出了最后一步。”说这话时，他的举止神情间流露出对这块刚被敌人抓获的小地域的同情。与战斗刚开始时敌人的大踏步前进相比，这是一块多么不幸、多么可怜的小范围啊。敌人已经筋疲力尽，其强大的攻势也已受到遏制，进攻的推动力已逐渐化为乌有。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些就是这位将军传递到大家心中的无法抗拒的印象。他简直像是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情绪激动、充满激情的伟大演员，在他令人惊叹的表演中，他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神经都在运动着。

突然他提高了嗓门，“稳住！当然，这用不了多久，然后，剩下的事就看我的了。”

他结束了表演，房间里一片沉默。

克列孟梭打破了沉默：“将军，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他们俩紧紧地握了握手，在场的英国人根本就看不出他俩有任何龃龉，几周前他们俩刚有过激烈的争吵。他们以前就争吵过，命中注定他们还要争吵下去。但是，感谢上帝，在这一时刻，法国的这两位时代伟人不仅都掌握着法国的最高权力，而且是朋友。大家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下了楼梯，钻进汽车，呼啸、颠簸着继续北行。

这次我们要前往罗林森司令部。这位英国第四兵团总司令不仅要收拾第五兵团的残局，而且必须坚守危在旦夕的防线。他的司令部设在亚眠以南 12 英里、亚眠至博韦公路边的一座小屋内。四周田野的新弹坑告诉人们敌人离司令部有多近！作为

一名指挥官，罗林森有个特点，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他的作风。不管陷入了什么样的危机、取得了多么伟大的胜利，或者遇到了多么严重的创伤，他总是一如继往。他心情愉快、诙谐幽默，但又不失谦逊和冷静，是个典型的英国乡村绅士和运动家，但是又能对军事驾轻就熟。在大战期间我碰巧亲眼目睹了他最不幸的时刻和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我能证明他无论是在自己的战线被摧毁时还是在巨大的胜利降临时，他永远都是一个样。

今天确是他最糟的一天。英军的高级将领对“老虎”都有一种敬爱之情，罗林森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接待了克列孟梭。一份临时准备、但很实惠的小吃摆上了桌：肉、面包、泡菜、威士忌和苏打水，但是克列孟梭一直等到有人从最后一辆汽车上拿来了最好的鸡和三明治才动起刀叉。

用午餐时罗林森说：“过一会儿黑格会来。”

话音刚落，英军总司令的灰色长汽车已停在了门外。克列孟梭与黑格一道进了隔壁房间；我与路邱尔、罗林森坐着没动。

“出了什么事啦？”我问道。

“我们打了个胜仗。”罗林森说，“我们占领了一片树林。杰克·西利率领加拿大骑兵旅袭击了莫勒伊林。”

“你们能开辟成一条防线吗？”

“天知道。我们现在在两军阵前除了些筋疲力尽、没有组织的军队外，一无所有。现在有个叫凯里的人率领着从各训练营和后备队召集来的几千军官守着6英里的战线。”他指着地图对我说，“骑兵正在竭尽全力守住防线，另外还有几个炮兵连四散在各地。第五兵团的步兵非常需要睡眠和休息。几乎所有的队伍都混在了一起。士兵们简直像蜗牛爬行似的慢慢后撤，他们已经累垮了。D·H（指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希望从克列孟梭这里得到支援。有不少法国部队在我们的右翼和后方刚下火车。

如果他们能赶在预定安排前立即奔赴战场,那我们也许可以守住阵地,直到我们自己的增援部队到来。现在太缺人了。”

当然我这儿记叙的只是当时谈话的要点。

“你明天还会呆在这儿吗?”我问道,希望他能给予肯定的答复。

他做了个鬼脸,我觉得他对此没有多大把握。

不一会儿克列孟梭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又回到了这个房间,显然一切进展顺利。“老虎”情绪极佳,而一向矜持的道格拉斯爵士似乎也显得很满意。隔壁房间参谋部的电话铃则响个不停。

“非常好。”克列孟梭用英语对大家说,“那么就这么办吧。我已经遵从了你们的意愿,不要再管以前的安排了。如果你们的士兵很疲乏,而在附近我们又有精力充沛的部队,那么我们会立即过来增援你们的。不过现在,”他说道,“我想讨个赏。”

“您想讨什么,先生?”罗林森问道。

“我想过河去看看战场。”

兵团司令摇了摇头。

“您过河很不合适。”他说。

“为什么?”

“嗯,我们对河对岸的局势不太清楚。”

“好吧。”克列孟梭嚷了起来,“那我们就去搞清楚吧。我一路赶来,还给了你们两个师,今天不过河我就不回去。温斯顿·丘吉尔(这回他没叫错)先生,你和我一起去;还有你,路邱尔。”他又开心地对他的军械部长说,“来几发炮弹就会让将军放心了。”

这样我们又上了车,驶向河边和战场。不一会儿我们就遇上了疲惫不堪、慢慢移动着的英军步兵。有时军队还保持着队

形,但更多是混杂一片,很多人犹如梦游般走着,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从他们身旁驶过的插着鲜艳国旗的车队。有些认出我的人向我招手,对我咧嘴笑笑。他们要是看见了乔治·罗比或哈里·劳德^①或其他名人时肯定也会这样,因为这将他们的心又带回到了和平年代,带回到了那阔别已久的英国。

我们终于到了河边,炮火离我们已很近,桥边有座大客栈。一位冲在最前边的法军旅长已经占领了其中的几个房间,其余地方都住满了英军军官,他们来自20个不同单位,大部分人不是累得趴在地上就是呼呼大睡。一个宪兵主任模样的人正在给大家分威士忌,想让他们爬起来、尽可能早点向前缓进。克列孟梭与那位法军旅长交谈了一会儿。当我们又回到车上后,他喊我,于是我走到他车旁。

“现在,”他说,“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我们来到了英军战线。你能在前面带路吗?我们听从你的指挥。”

我问:“您想走多远呢?”

他答道:“越远越好。你看着办吧。”

我让我的那辆本来排在第三位的车驶到了最前面。我坐到了司机的旁边,手拿着地图,车子过了桥。不一会儿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屋就不见了,前方是开阔的乡村田野。在第一个岔道上我要司机向右拐,也就是向南拐,然后沿着与卢斯河基本平行的大道行驶。现在我们已到了敌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了。这条路通向莫勒伊林,因此我想我们也许会遇到西利手下的加拿大兵。现在到处都在开炮,藏在树林中的英法炮兵的火力越来越猛,炮弹在我们头顶上来来回回呼啸而过。左边约300码处有一条长

^① 哈里·劳德(1870—1950):苏格兰著名杂耍喜剧演员,以创作、演唱苏格兰、英格兰歌曲闻名。

满了树的低低的山脊,树林中能见到几个黑影在移动。根据我在离开罗林森司令部前对地图的研究,我猜想那些大概就是凯里上校率领的从各训练营召集起来的杂牌军。假如没错的话,这该是我们的最前沿阵地,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这条防线外有些什么我也不清楚。现在我们能听到林中步枪的交火声,许多炮弹也在我们前方的路上和两旁泥泞的草地上开花。雨还在下着,且一直都是倾盆大雨,暮霭开始降临了。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万一山顶上的这条并不坚固的防线失守——我们根本无法得知敌人究竟离我们有多远、战线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事——要想沿着那条与战线平行的原路返回是根本不可能的。万一防线失守,法国总理必须穿过战场、涉水过河(还不知道那河能不能涉过去),那就太尴尬了。因此我要求车队停止前进,并向克列孟梭先生建议,我们在路边也能很清楚地看到正在进行的战斗。莫勒伊林及附近的林地离我们并不很远,战线与我们中间这块地方到处是落伍的士兵和备用马群——大概属于西利的骑兵旅的——这些战马都站着一动不动。三三两两的榴霰弹在平原上四处爆炸,炸出了一个个焦黑的土包。“老虎”下了车,登上了路边一块高地。从这里,你无需真正亲临战场,或者说你只需和战场有一丁点儿接触,你就能领略现代战争所能展示的一切。

我们停留了约一刻钟时间,向掉队士兵问了一些情况,津津有味地观赏了眼前的景象。炸弹都是在离我们一百码以外的地方爆炸的。路邱尔和克列孟梭简直像两个放了假的玩童,兴致极高。但是法军参谋们越来越担心他们首相的安全,他们催促我去劝他返回。该看的都看到了,而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时这已不年轻的“老虎”正在与已认出了他并向他行军礼的疲惫的英国军官们握手。我们将烟盒中的烟全给了他们,然后说

我们该走了，克列孟梭很愉快地同意了。当我们刚走到马路上，一颗炮弹落在了离我们不远的那群备用马中间，马群散了，一匹受了伤的马踉踉跄跄地沿着大道向我们跑来。这只可怜的动物身上鲜血淋漓。已是74岁^①高龄的“老虎”迎上前去，迅速抓住了缰绳，使马停了下来。路上立刻汪了一大摊血。他的那位法国将军在一旁规劝了几句，他很不情愿地转身向汽车走来。他向我丢了个眼色，然后低声说，“多美呀！”

我们非常顺利地回到了岔道口。有位从罗林森司令部来的参谋坐在汽车里等着我们。他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为克列孟梭先生过河以及从正遭德军炮火破坏的亚眠返回作了安排。如果克列孟梭非常想过桥的话，他们显然希望他向北走而不是向南走。现在他能一举两得，不禁喜上眉梢，只可惜当天再也没有炮火进攻了。

当我们过了亚眠，上了通往德布奈将军的司令部的公路时，天已经黑了。这位将军指挥着法国军队，在罗林森战线的右翼建起了防线。德布奈与两位法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生动的交谈。将军条理清楚地阐明了局势，这也是法国人的拿手本领。跟罗林森一样，他也拿不出部队来了，他的前锋部队压力很大，但他认为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他们有能力坚持到明天。

我们从这儿出发，前往停在博韦火车站的充当法军总司令部的列车上去见贝当将军。这儿很平静，一切井然有序。贝当和他的参谋们非常隆重地迎接首相的到来。我们被领进了这座流动军事宫殿的一节豪华车厢，并且享受了一顿简单但味美的晚宴。我们不断在路上奔波，不断地与要人进行令人激动的交谈已达12个小时了。说实话，我已经很累了。可是有着钢铁般

^① 此处原文有误。1918年克列孟梭应为77岁。他生于1841年。

体格的“老虎”一点也看不出有疲惫的迹象，他兴致勃勃地与路邱尔和其他将军们风趣地交谈，开完玩笑后马上又接着正经的话题，总是能在欢声笑语中谈出点有实质性的东西。

我瞄准了机会单独对他说：“像今天这样的旅行偶尔为之还可以，但是您可不能老往战场上跑。”他的回答（到现在我还记得原话）：“这是我最好的消遣方式。”

过了一会儿贝当说：“第一阶段我们必须把士兵召集好，第二阶段再将大炮全部运到。在48小时之内我们的炮兵兵力就很强大了。接下来是弹药供给，必须保证4天的战斗。下面是道路问题。一周之内，现有道路都要被军车碾过。今天晚上我们已开始采石，假如前方能支持住，道路问题我们勉强能解决，否则，我们以后得从头再来。”

凌晨1点我们回到巴黎，至此，我们已经持续紧张忙碌了17个小时。而此时仍然精神抖擞的克列孟梭，终于向我友好地摆摆手：

“明天我得干活了。贝当已安排好了，无论你去哪里都受欢迎，他在火车上永远为你备着晚餐。”

翱翔蓝天

在航空署成立后的头 11 年里我一直掌握着其中的某个部门,只有 1916 年例外。从 1911 年到 1915 年,我在海军部负责皇家海军航空署的筹建和发展工作;从 1917 年 7 月直到大战结束,我负责战争中各种各样的飞机和航空器材的设计、生产和供应;从 1919 年到 1921 年,我担任空军大臣和战争国务大臣,因此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威力无比的新式航空武器的发展,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其初期的发展;航空武器无疑将使海战和陆战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将控制甚至取代陆军和海军。

1911 年初,皇家海军有 6 架飞机,飞行员大约也只有这个数。当时,飞行技术尚在襁褓之中,飞机用于战争目的还只是很模糊的想法;飞行技术以及引擎和机器的质量都很原始。当时尚未出现用于飞行领域的专门术语;“海上飞机”和“飞行”(指飞机的飞行)这两个词可以说是我造出来的。

从一开始我就迷上了航空,我十分清楚航空将给战争带来的变化。到海军部上任伊始,我决心尽我所能大力发展壮大海军的航空力量,因此我接触了一小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他们是海军航空兵的先驱,领头的是桑普森中校。我对飞行着了迷,但同时第一次上天又感到恐慌。为首次飞行我犹豫了三四个月。当时已发生过好几起事故,这些年轻军官们在平时期甘冒生命危险,我深感同情。作为海军大臣,如果身先士卒,

我想这也许能促进航空的发展；负责航空事务的其他大臣也持相同观点。

于是，1912年初我坐进了一架海上飞机，飞行员是斯宾塞·格雷中校。我开始了在当时既新奇又刺激的经历。飞机好不容易从水面上升起，冲上了蓝天。我惊奇地发现，从七八百英尺的高处向下看竟没有使我头晕目眩。不过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关于飞机坠毁的想象。我还记得由于自己不了解航空飞行，我很希望飞机能坠落在水面上，不要撞上坚硬的陆地。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安全降落在规定的跑道上。在此我坦白了第一次尝试令人激动的飞行时内心的恐惧，我并不后悔，我相信，如果所有心中的秘密都暴露出来，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我还记得几周后我又要作一次飞行，这次乘坐的是一架三座飞机，我问一位年轻军官是否愿意陪我同行。他很爽快地接受了邀请，但事后他告诉我说他足足花了一个上午才下定了决心！这位军官后来因其勇敢而获得维多利亚勋章，所以我想我的畏惧心理总算也得到了令人尊敬的权威的认可。

天空是一位极端危险、嫉妒心强、十分苛刻的情妇，一旦中了她的魔咒，大多数情人都会忠心耿耿、至死不悔，而且死时大多年轻力壮。即使那些飞行大师或飞行王子，身经百战而不伤毫发，虽然经历过50次空难，但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其情人的怀抱，最终毁于普普通通的纯娱乐性飞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主持过一次宴会，为两位于1919年驾驶小飞机顺利飞越大西洋并安全降落在爱尔兰岛的英国飞行勇士庆功，飞机驾驶员约翰·艾科克当时被封为爵士，我对他说，“你应该歇手了，见好就收吧，你肯定已把运气用光了。”几个月后我的话不幸言中了。

第一次飞行时我的动机中有责任感，也有激动和好奇的成

分,以后我继续飞行则纯粹是为了娱乐。我坐过海军部下辖的各种飞机,并在它所有机场上起飞降落过。在那一段日子里,停下飞机引擎让飞机滑翔尚属很新颖的技巧。我得承认,第一次经历在夕阳的光辉中,让飞机在空中无声下滑,看着下方犹如巨幅地图的地球,是很令人兴奋的。不久我就产生了自己驾机的雄心,并在海军和陆军学校里学了不少课程。1912年,复式操纵飞机发展很快,我下令造了一架飞行员和乘坐者可并排坐并可以交替操纵的飞机,在这种特别适合作教练机的飞机里,我做了许多次令人愉快的飞行。这种飞机能尽现螺旋式下冲时的危险,但那种感觉太不舒服了,体验过一次以后,我们再没有尝试过。

我对飞行的恐惧显然是有现实根据的,有很多危险的、甚至致命的事与我擦肩而过。在伊斯特切奇,给我上了我生平第一堂飞行课的那位年轻的飞行教练在带我飞行的第二天死了;当时我正在财政部,和财政大臣讨论1912年海军预算的一些细节,一张纸条摆到了我的面前,说我前一天的飞行伙伴牺牲了,他驾驶的就是我们一起练习驾驶了两三个小时的那架飞机。几个星期后,南安普敦港生产出一种新式试验性海上飞机,在试飞时我坐着这架飞机作了长时间的飞行,它在各种情况下运行良好。当时我乘坐海军部的“魔女”号快艇离开试飞地点赶赴希尔内斯。我一到目的地便得知那架飞机栽进了大海,飞机上的3名军官无一生还。还有一次我正想驾驶上文提及的那种复式操纵飞机去作一次飞行,后因公务缠身未能成行,这架飞机整个上午的飞行状况一直良好,但突然间机头向下,莫名其妙地旋转着俯冲下来,撞到地上摔成了碎片,飞机上的两位军官受了重伤,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好友。

对飞行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懂得了飞行过程中无时不

刻都有数不清的危险——估计现在情况已完全不同了——有好几次我在飞行途中发现了飞机的缺陷：电线断开，机翼被烧焦、支架出现裂缝等等；一旦安全降落到“坚实的大地”，我和飞行员总是相互祝贺。不过，迷上了飞行之后，只要能脱得开身，我一直没有中断过飞行。

1914年春发生了古斯塔夫·哈梅尔事件。哈梅尔是个天生的飞行员，他三分是鸟七分是天才；他属于天空而不属于陆地。他以自然的天赋和难以言喻的自信驾驶着当时的简陋飞机。哈梅尔不是军人，但他的飞行艺术大大领先于我们海军中的任何飞行员。我们的飞行员刚刚死于飞机的螺旋下坠，哈梅尔就决定将飞机升到10000英尺高空，故意使飞机处于当时被认为是致命的状态，使之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旋转着砸向地面。他终于发现了控制这种可怕旋转的方法，重新又让飞机处于平稳的滑翔状态。这一方法立刻被所有飞行员采纳，1912年尚无法控制的可怕旋转在空战中成了寻常的飞行技巧，飞行员利用这种方法可以骤降两三千英尺，通过人眼难以测算的快速旋转避开机枪的瞄准。

我想让哈梅尔为海军飞行员表演一下他控制飞机的特技，于是我请他来希尔内斯。作为我的客人，他应邀登上了“魔女”号，他到达时正遇上飓风，当时没有人敢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当天下午和次日上午他向我们展示了在英格兰从未有过的飞行技巧。他让飞机进入“侧滑失控”状态，这在当时令人胆寒，飞机头朝下像一块石头一样坠落了上千英尺，空气穿过飞机上的电线发出刺耳的鸣叫，飞机直到靠近了地面或海平面时才停止坠落，重又欢快安宁地升上天。当时我们在探索一片未知的天地，这些表演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如何使飞机翻跟斗才由佩古德发现不久，哈梅尔为我们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表演，“为了让每个人

都看清怎么做”，他飞得很低，我真是担心。

我与他一起愉快地飞行了一天，从早到晚我们一直坐在他那架单翼小飞机里。我与上百位飞行员一起飞行过成百上千次，但与哈梅尔一起飞行时他传达给我的那种诗化的动感是我从未经历过的。这架飞机就像是溜冰场上最完美的溜冰选手。它在三维空间里滑行，每一条弧线和变化都完美无缺，但这是本能的而不是经过训练的那种完美。他能把飞机笔直地拉起，使我们和下面的世界之间无遮无拦，飞机悄悄地、平稳地盘旋而下，与空气和谐地融为一体，似乎飞机的一个机翼的尖端被固定在轴心上。至于无情的地球引力，只是他的奴隶。在他的飞行中没有与困难作斗争的感觉，十分复杂的动作也似乎毫不费力，一切都自然而然，似乎飞行本该如此。操纵飞机似乎就像把水从壶中倒出来那么容易。

但我们的这位朋友却遇上了悲剧性的结局。我想请他在卡尔肖特机场(位于朴茨茅斯)再重复一次他在希尔内斯的优秀表演，我带着几位特选的飞行员在“魔女”号上等他来南安普敦港。他说他将从巴黎飞过来，傍晚与我们会面。飞越英吉利海峡在当时尚属冒险。天黑了他还没到，我们等了很久还是没等到，于是便吃了晚饭。上床时我们还在想，他肯定是迫降在某个地方了。第二天早上还是没有电报来，到中午我们便有些担心了，到了下午我们听说他在浓雾和暴雨中开始了越海飞行，他没有返回法国海岸，到了晚上有消息说他失踪了。又过了一天，似乎肯定他是永远失踪了。果然如此，他傍晚时起飞，迎着海峡上的风暴和大雾，坚信没有什么他克服不了的危险。从此他永远从人间消失了。

大战爆发了，衡量人类生命价值的标准完全变了。死亡成

了司空见惯的事,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所有人都是过一周算一周,不知自己哪天会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人的生命受到了空中斗士的无情挑战,其危险性是史无前例的。战时担任海军大臣期间,我无暇飞行;1917—1918年间我出任军需大臣,我必须奔走于英吉利海峡两岸,这时我经常乘飞机。飞机总是降落在前线的约会地点或我想视察的某个战场上。当时我的飞行员是位年轻军官,他在加利波里之战中和索姆战场上受过重伤,他对任何其他形式的危险都不在乎,只是再也经不起任何爆炸了。作为空军军官,他是一位技术过硬的优秀飞行员。在这段时间里,最好的飞机当然要留给前线。当时我们的机械师严重不足。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从司令部返回伦敦,途中飞机出了两次故障,第一次故障发生时我们正在海峡上空,一声巨响过后飞机引擎嘎嘎作响,原来是爆了一个阀门,飞机开始下降,下面是茫茫海水,我们离开法国海岸已达5英里。当天下午天气阴沉,我们的飞行高度只有2000英尺,如果飞机引擎还不能恢复正常,飞不上2英里我们会落到海里。平时英吉利海峡很繁忙,但跟以往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无论是汽船、拖船还是小渔船,一艘都见不到,只是在远处能影影绰绰地见到些船影。我们没有浮水设备,没有那种叫做“救生衣”的可充气夹克。飞行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表示无能为力,我心里开始盘算像我这样穿着厚衣服和重靴子到底能游多远,弄不清到底是否应该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过了半分钟,也许有一分钟,反正觉得时间很长,我心想这下肯定完了,就在此刻那台老引擎在熄了几次火后又咳咳喘喘地发动了起来,飞行员赶紧调转机头飞向法国海岸。过了令人焦虑的10分钟后,我们飞到了格里斯内兹上空。我们坚持到马奎斯机场时,飞机最多只能再飞100英尺了。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这个巨大的战时英美空军基地。

马奎斯机场物资充足，很快就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架中型飞机。我们再次起飞时距离天黑大约还剩1个小时。我们顶着风飞越海峡，飞机引擎的动力不足，我们几乎飞了40分钟才飞临英国海岸。又过了一刻钟后，引擎又发出一声脆响，飞行员只得重复那种无可奈何的手势，表示我们只能降落，别无选择。他使飞机在两棵大槐树间做了一个优美的侧翼滑翔，刚好避开两边的树枝，降落在一块田地里。我误了伦敦之约。

作战飞行自有其特有的乐趣。除了所有航行中都有的危险之外，飞行员必须仔细观察每一朵云，以防备德国飞机突然从云中窜出来；天上还可能不时出现冒着白烟的高射炮炮弹，最好躲得远一些。这种场面我只见过一次。那是1918年的八九月间，一场大战打得正酣。当时我急于了解我们部队的前进动向，但从7000英尺的高空向下看，只能看见炮弹爆炸时的块块烟云，而榴霰弹的炮火也只能说明地面上有异常情况。当时我们的飞行时速为80英里，根本看不清部队位置的变化，无法了解下方行动的进展情况。我的飞行员是位中队长，他做了个手势，建议低空观察，但总的说来我宁愿只看个概貌。四五十分钟后我们回到了阿拉斯附近的机场。

当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我必须如实记录下来，这件事说明战时飞行军官的生活是多么艰难。我们刚从前线归来，这时另一架受到重创的飞机也摇摇晃晃地降落下来。这架飞机上弹痕密布，我亲自数了数，机身和机翼上有30多个弹孔，但飞机的引擎还很完好，主要电线也未遭破坏。飞机上的观察员腿部受伤，浑身鲜血淋漓。下面是我听到的一段对话：

中队长：“喂，你为什么要在这儿降落？”

飞行员：“上周我的飞机上的观察员就死于失血过多，我想

这次最好尽快为这一位找到急救人员。”

中队长：“你是哪个机场的？”飞行员说了一个机场的名称。“那再飞一刻钟不就到了吗？”

飞行员：“你能不能把我们送过去？明早我们来取飞机。”

中队长：“好吧，不过这事太麻烦，下次最好飞回自己的机场去。”

伤员被从飞机上抬了下来。我对几分钟前刚经历过一场磨难的飞行员表示同情和尊重，我握着他的手说了声“你干得漂亮”之类的话。他似乎对自己受到冷遇一点也不吃惊，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如果所有伤员都在此降落，就把他们的安排打乱了。”

人类以前从未有过的刚毅精神在这场伟大战争中随处可见。

战后，我出任空军大臣，于是我飞得更勤了。现在我的飞行员是勇敢的杰克·司各特，虽然战争一开始他就在一次空难中受了重伤，但他在38岁时凭自己的技术和勇气赢得了一流飞行员的荣誉。我们经常驾驶复式操纵飞机到处飞，有时是为了公务，有时只是为了娱乐。在他的指导下我也能在一般情况下驾驶飞机，我还学会了垂直拉升。

在巴黎和会期间，我经常往返伦敦与巴黎两地，而且基本上总是乘飞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乘着飞机在上万英尺的高空飞越从邓吉尼斯到伊塔布勒斯60英里宽的海峡，在晚霞中盘旋降落在巴黎机场，这是十分惬意的。再也不用乘坐漫长而乏味的火车，再没有转车换船的耽搁，也不用害怕晕车晕船了。乘坐飞机旅行就像坐上了魔毯。

但有些旅行也不那么顺利。记得有一天上午从巴黎的布克机场飞回伦敦时,云层很低、很厚,四周雾气腾腾。司各特通过传声器向我提议,我们越过云层到阳光里靠罗盘飞行,我依言行事,驾着飞机往上爬,不久便飞进了一大团灰蒙蒙的浓雾中,四面八方的雾气使飞机很难保持平稳。我们越飞越高,从10 000、12 000一直飞到14 000英尺,但依然是云雾缭绕。最后我们飞到15 000英尺的高度,但上面实在太冷,我们寻思还是降低高度为妙。这时我们遇上了飞行中的大危险,解决这个难题虽说并不是不可能,但实在很难。我们在什么方位?我们肯定已飞了近一个小时,且在浓雾中不断弄错方向。我们应在何处降落?浓雾离地面有多高?这些问题使我们六神无主。在雾中,我们分不清东西南北,只是盲目地、悄然地下滑。

刚进入浓雾时是在2 000英尺的高度,但现在从800英尺的高度上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把飞机交给飞行员驾驶;我们慢慢地降到300英尺高度,一头扎进暴风雨中,但还是看不清地面。我们知道在巴黎和亚眠之间有许多树林覆盖的高地远高于300英尺,我们随时都可能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栽进森林或撞上山坡,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在浓雾中团团转上几个小时,直到汽油耗尽,这也不行。

降到150英尺时我们终于能看见地面了。我们正在一个狭谷中飞行,两边是树林茂密的山峰,山间点缀着村舍,有家工厂的烟囱直冲云霄,看上去与我们飞行的高度差不多,距我们只有百码之遥,前方的浓雾和暴雨几乎紧贴着地面。起飞时天气很好,不久就遇上了这种情况,只要飞得多了就肯定会遇上这种事。我听到司各特透过麦克风说道,“我们定能渡过难关。”我们降到了100英尺以下的高度,地面似乎在以七八十里时的时速疾驰。我们顺着山谷走,浓雾逼得我们飞得越来越低,最后降到

只有不到 50 英尺的高度。突然，司各特叫了起来，“哇，看到铁路线了！”飞机猛然左拐，避开了前方浓雾中铜墙铁壁般的松树林，这时我也看到了下方的铁路。不管怎么说，我们沿着铁路低飞是肯定不会撞上山的，但会不会撞进隧道就说不准了。我们顺着这条支线铁路弯弯曲曲地飞了将近半小时，终于飞出了浓雾笼罩的山谷。这时我很高兴地发现前方云雾中的高处有一团亮色，我们立刻向它飞去，甩开铁路线，快速上升。天越来越亮，突然，我们的前方露出了一小块镶着美妙蓝边的亮云，不到半分钟我们就飞出了云团，重又回到清爽的天空。雨后的太阳亮晃晃地挂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的身后是一片云山雾海；而我们的面前仍有大团乌云，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云团或绕行过去。我们慢慢地飞上了三四千英尺的高度。我们看到了博韦教堂，不久我们又看到了索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终于看到了阿布维尔附近的海。平常只需 50 分钟的距离我们飞了两个多小时。

不过，现在新的乌云又在我们的前方集聚起来，不一会儿情况又变得对我们不利了。我们再次被迫在 100 英尺的高度上飞行，不过这次我们在海上飞行；沿着左下方的海岸线，我们基本上与海岸线保持平行，我们一直飞到布洛涅才飞出新的暴雨区。我们再一次沐浴在阳光里。于是调头飞越海峡，平安抵达莱姆蓬机场。此时我们已飞了整整 4 个小时，我们决定在这里降落，一是要吃午饭，二是给飞机加油。战时有大批飞机从这里由渡船运往前线。现在此处虽然不再有战时的那番繁荣景象，但在 1919 年春它仍是一个很繁忙的机场。不一会儿，我们饱餐了一顿，飞机也加足了油。

大约在 3 点左右我们又开始飞往伦敦。我们很快便上升到 1500 英尺的高度，这时我注意到飞机不是飞往内地，而是偏了一个很大的角度向海上飞去，接着飞机侧滑起来，似乎失控了。

“怎么回事？”我通过麦克风问了一句，无人应答。飞机显然失控了，飞速坠向地面，似乎就要倒栽下来。飞机时速上升到120英里，我们刚刚离开的机场凶狠地向我们冲了过来。这时我发现飞机机身左侧靠近驾驶员座位处冒着一缕浓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飞机又得到了控制，这时我们离地面只有200英尺。我听到我的同伴说，“刚才着火了，已被我灭掉，我要降落了。”这就是对刚才我们为什么跌落了上千英尺的解释；此间，司各特丢开飞机不管，用灭火器止住了逼近已开始漏油的油箱的烈火。

再次回到坚实的大地，我高兴万分。起火的原因很快查明，原来，排气管本该把引擎排出的带火废气排出机身之外，但有颗小铆钉松了，所以排气管转了身，把火苗吐向机身的金属和帆布。如果迟发现几秒钟火情，我们肯定要烧成火球了；如果灭火迟几秒钟，我们肯定栽到地上了。可是除了飞机上的帆布被烧焦了一块，我们实际上并无损伤。飞机完好无损，换了一个排气筒并固定好之后，我们第三次踏上了飞往伦敦的旅途。这次飞行一路平安，但我们到达克罗伊登机场时已快5点了。这次从巴黎到伦敦所花的时间就是乘火车也足够了；当然这次飞行无疑比乘火车的花样多，也更难以捉摸。当我爬下飞机时，我觉得更像是做了一天苦力。

几星期后我又有了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这次是到布克机场去练习飞行。我的飞行员（这次不是司各特上校）坐在双翼机的前座主控飞机，我坐在他的后面。飞机发动后不久就开始加速。飞机起飞时很慢，因为机场里的草几乎有一英尺高，所以等时速跑到超过50英里时我们才开始起飞。就在我们要飞离地面时，飞机骤然震动起来，当时的感觉很奇怪——只有用自相矛盾的词才能把这种感觉说出来，我只觉得身体被难以抗拒的力

量向前推,但却又被安全带死死地拉住了。平常很少有这种被难以控制的力量抓在手中的感觉。这时飞机在刹那间头朝下倒立起来,翻了一个大跟斗,恰似一只在拼命奔逃时被击中的兔子。眨眼间我被头朝下倒挂起来,安全带仍然把我牢牢地拴在座位上。我向后一看,只见飞行员也是这个姿势,现在我在他的前面了。飞机摔成了碎片。尽管我后来才发现自己浑身是伤,到处青紫,但当时并没觉得受了伤,也没听到飞机坠毁时有什么响声。飞行员也很幸运。我们一动不动地倒挂在飞机上,那样子真是滑稽,我们竟然放声大笑起来。

我们迅速解开安全带,从飞机残骸中爬出来;这时一大群救援者和担架兵从机场的建筑中跑了过来,我们挥着手吸引他们的注意,也让他们放心。这次事故的原因很明显:深草中藏着一条废弃的跑道,下陷了近两英尺。根本没人告诉过我们有这么一条跑道;飞机的木质起落架重重地撞上了这个陷坑的一侧,使高速前进的飞机一下子翻了个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没受什么惊吓,也没有在后来爆炸起火时受重伤,真是万幸。

很少有人能在40岁过后还能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年纪轻,加上反应快,能力强,是获得“飞行感觉”的首要条件。然而我坚持不懈,而且不断取得进步,因此当时我不得不放弃学习迷人的飞行艺术很是伤感。那是在1919年夏,我在战争办公室忙了一整天,随后与司各特上校乘车到克罗伊登机场,打算作一次夜间飞行。我驾机飞离了地面,飞机攀升顺利,我们迅速而又平稳地升到七八十英尺的高度。当时克罗伊登机场周围有几处长有很高的榆树,所以飞机必须先盘旋两圈半,先向左再向右飞,这样才能升到一定高度,安全地越过榆树林。

飞机盘旋第一圈时状况良好,时速达到60英里以上,这是

一个很好的飞行速度。这时我把飞机向左转,以前我经常这样做。当我使飞机向内側倾斜之后,我开始慢慢地、轻轻地把操纵杆拉向中档以便把机身拉平。驾驶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的操纵杆很灵巧,只需做出极细微的动作,飞机就会立刻作出反应。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次操纵杆移动了足有一英尺的距离也没见到有什么反应。飞机机身保持45度角在飞行,倾斜角度逐渐加大。“失控了,”我向飞行员喊道。他的手脚立刻接管了我对操纵杆和方向舵的控制,他把机头猛然下拉,希望重新取得飞行速度。但晚了,我们离地面不到90英尺,正是最容易发生侧滑事故的高度。飞机猛然下冲,毫无办法。在200英尺以上的高度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实际上,在1000至15000英尺的高度上,我们经常故意停下飞机,让飞机失控,等到侧滑变成俯冲时(侧滑总是转成俯冲的)时速会上升到80至100英里,这时飞机又可以控制了,我们这才把飞机轻轻拉起,进入正常飞行状态。

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我看到阳光照耀下的机场紧贴在身下,当时只觉得机场上一片黄橙橙,像狰狞的火苗,这种感觉只是一闪而过,接着又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这次死定了。”这时我心中又有了一个月前在布克机场失事时的那种感觉。这回又要出事了。我严格按顺序记下了这些印象,其实发生的时间大约与读这段文字的时间差不多。当时只是觉得天地间充斥着异样的光,根本来不及害怕。幸运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每次只能感觉到其中的一部分。

飞机刚刚从侧滑转向俯冲就一下子撞上了地面,时速约50英里,冲力极大。飞机的左翼折断,螺旋桨和机头扎进地里。我又一次感觉到自己被一股骇人的巨大力量推着,穿越我无法感知的空间,进入一片新天地。安全带的牵制使我的胸口受到了

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汽油也因压力喷涌而出。接着,我感觉震动消解了,压力突然消失,安全带也松开了,我轻轻地摔在面前的仪表盘上。我立刻意识到:没事了!我跳出撞坏了的机身向我的同伴跑去。他不省人事、浑身是血。我站在一旁,一旦飞机起火我准备随时把他拖出来,否则最好不去动他,等到懂行的救援人员赶来。

飞机坠毁后没有起火爆炸。一年前休士·塞西尔勋爵和我谈起过杰克·司各特,勋爵本人也是个飞行员,他说:“一切正常时谁都能驾驶飞机,但一旦飞机出了故障,司各特这类人的素质就十分关键了。”这番话真是千真万确。他临危不乱,在飞机坠毁前几秒钟切断了电流,这才没有引起油雾爆炸起火。尽管司各特年龄偏大,而且在大战之初即在事故中受过伤,但他能在皇家空军中赢得普遍的尊敬,这应归功于他的这种控制力。

两小时后我还得主持下院招待潘兴将军的晚宴,我勉强完成了任务,但第二天就发现自己浑身青紫。司各特上校伤后也完全恢复了过来,而且第二次伤愈后行路反而更稳了,但他是因为我才受了伤,为此我深感内疚。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很少再飞行。此后我乘飞机的次数肯定不超过12次,但据说现在飞行已经很安全了。

竞选回忆录

如果你想了解竞选,那么我来告诉你。我参加议员竞选的次数多于任何现在还健在的下院议员。我总共搏杀过15次。想想看,15次竞选!每次至少花3周时间,此外竞选前得花1周时间调整好心理状态,竞选后还要花上至少1周调养和付账单。从出生到现在共35个年头,如果把这35年人生看成1年,竞选就占了其中最重要的1个月,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35年时间内,我累计花了1年多的时间为竞选操心劳神。我成年后的岁月中每30天就有1天花费在这些奇怪的事务上。

大家现在都了解那一套老规矩了。先要与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协商,过过场;接下来又要与竞选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面谈;最后与全体会员见面,决定能否被提名为候选人。下一步需要拜访名流,走访选区,仔细研究选区的工业以及选民的兴趣、性格和特别的癖好等,然后决定竞选大纲,写竞选演讲稿,把当地报纸炒得热火朝天。比赛正式开始了!提名日一到,你带着主要朋友到市政大厅或某个指定地点。这里你与某个或几个竞争对手初次会面,双方挤出客客气气的微笑。“早安,很高兴见到您,我希望我们能愉快竞争。”“这天气真冷(或真热),是吧?”“如果有什么我能效劳的,请说一声。”等等。接下来就要用心拼杀了。每天早上九十点钟之间开竞选委员会大会——相当于作战参谋大会。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全都亲临现场,大家贴宣传画,拉

选票,听取各委员会的报告,了解拉选票的进展情况,向报界发消息,另外还要做宣传,准备汽车,参加各类会议,维持会场秩序(自己人开会时也要维持秩序),提醒众人遵守选举纪律,还要关照需要照顾的名流,等等。

接着就要出发周游选区。我第一次参加竞选时坐的是双马拉的四轮马车,车速大约是每小时7英里,现在坐汽车就快多了。竞选双方都不遗余力,主要区别就看哪位候选人工作更卖力。过去3次见面分别是在早晨、下午、晚上;现在3次见面会都安排在晚上,得赶场子。你走上讲台,其他发言人一见候选人来了就坐了下来。(欢声雷动或嘘声四起!)有时一个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大厅里只有二三十个不动声色的人,这对发言人还真是一场考验。想想看他那些可怜的朋友以及他的妻儿吧!他们跟着他东闯西荡,反反复复地听同一个演讲。每次演讲都要变着花样迎合不同的场面,真不容易。那些忠心耿耿的竞选小组的主席或副主席能把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听上33遍竟还能笑得出来,我是深有感触的。亲爱的朋友,我为你伤心,我的心为你而流血。想想吧,我还要在其他集会上讲这个老笑话呢,到时候你还得充满热情地哈!哈!哈!听呀,听呀,真棒!别介意。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宪法规定的程序,我们都是注定要吃苦的奴隶纤夫,我们前进,后退,再前进,监工挥着鞭子,船一步步地驶向阴森森的水域。

当然也有那种乱糟糟的集会,这种集会还是很令人放松的,至少你不必作老生常谈的演说了。台下的听众情绪激动,你的反对者两眼发绿,咬牙切齿地暴吼着打断你的发言;他们高声叫骂,想尽一切办法侮辱你,挫伤你的感情,竭力攻击你言行不一,破坏你的公众形象,有时甚至对你进行人身攻击——我觉得很可悲。冷嘲热讽从四面八方向你压过来,凶神恶煞般的男青年

或长得像猎狗似的短发女郎纷纷向主席递来各种各样的卑鄙问题。难吧？那是肯定的！不过这种集会总是有的。你不必担心要作什么发言准备。开头有几句大口号就足够了，接下来只要不哑口无言就行了。你的支持者会很喜欢这种场面的，反对者粗暴插话比竞选人的说理更能刺激他们的神经！一长串合情合理的议论会使听众昏昏欲睡，而在乱纷纷的集会上作一次巧妙的反驳却能为你赢得一大批朋友，甚至会化敌为友。我对身处这种集会的候选人有几条建议：首先要咧嘴笑，或者像他们说的那样“微笑”，这绝对有效；其次要自然放松，就当是与某位朋友在清静之处单独谈论双方都有兴趣的话题；再次是要与周围闹嚷嚷的气氛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总之，只要你相信听众不会伤害你，一大群疯狂的好人还是很好笑的。在大不列颠很少有人会想伤害你的，万一真有人想动手，那你自卫就是了。哈里·克斯特在竞选南兰贝斯区议员时参加过一次集会，会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块头摩拳擦掌地向他逼过来，他也甩开外套，拉开架势迎了上去，同时对身后的朋友悄悄地说，“拉住我，拉住我。”总之，千万不要乱发脾气。情况越糟，你越要把它当作木偶戏来看待。你也培养一下像潘趣先生身边的雉那样的自我感觉，当它展翅雄飞，四处翱翔时，他对朋友说，“怎么我每次从他头上飞过，地上的那个小矮个总要尖叫不停？”

已故的德文郡的公爵哈廷顿勋爵曾在不同场合与我谈论过公众集会。据说有一次他在下院作一个重要发言时呵欠连天，我问他是否真有其事，他答道，“你听那次演说了吗？”还有一次他谈得较多，他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下院演说，醒过来一看，天哪！我真的在演说！”在引起党派纷争的有关自由贸易政策的斗争中，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利物浦参加一个巨型集会，他将作主要发言，而我的任务是在12分钟后提议对他表

示感谢。集会的前一天我们舒舒服服地住在德比勋爵府上。我们一起乘车赴会,当时是1904年,我们乘坐的肯定是双驾马车。他问,“你紧张吗?”我承认有些担心。“喂,”他对我说,“我觉得有个方法不错,当你面对一大群听众时,看着他们,十分自信地对自己说,‘我真没见过有这么多呆子。’”当时他作了长篇演说,听众很多,不过他是否用了他自己所说的这种方法就不得而知了。我说得有点离题了。

过了十天半个月之后,大小集会都经历过了——甚至包括在凌晨1点与电车司机会面,选举日就到了。这一天总是在车上度过的,从早到晚,我们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投票站到另一个投票站,从一个委员会办公室到另一个委员会办公室。候选人可以随便走进任何一个投票站,这是老规矩,至于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就知道了。你看着选举人走过来,领了选票走进小亭子去,在正确的地方(有时在错误的地方)划上决定你命运的叉号。你不用知道如何阅读别人的思想就能猜出大多数人投谁的票了,扭过脸或友好地眨眨眼睛就已经说明了你想知道的一切。时间一长,选举人更多,场面也就热闹起来了。大群孩子吵吵闹闹,挥舞着小旗子,向候选人致意或对候选人进行围攻。最迟到9点钟,一切就都结束了。过去总是当夜就在选举区唱票,现在许多区县选民太多,选票不易处理,你得精疲力竭、提心吊胆地耗上一夜才等到结果。一旦进了唱票室你就必须等到结束才能出来,所以最好不要进去得太早,一旦进去,最好带上足够的点心。唱票两小时后通常便能猜出大致结果。你会看到成千上万张选票摆在唱票人的桌子上;你的朋友或对手的眼神也与那一堆堆选票息息相关。不过有时票数相近时最后那几张选票会把秘密一直保守到底。怎么样?是输?是赢?不过,无论输赢最后都得简单地说上几句。

我与对手的关系几乎总是比较友好的。虽不像前两天伊斯林顿区的一位候选人会吻获胜的女对手,但我几乎总是和对方握手。竞争时我总是尽量避免提到对手的名字或注意他们的存在,但事后无论结局如何,我们总还是该做到心平气和的。如果你当选了,你应该只想着竞争的公平合理(别太介意自己的感觉),并表明自己将不囿于党派之见,决心做好选区的保护人。如果你落选了,你应该祝贺当选者,说他将为议会增光云云。我见过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十分伤心,过去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约翰·莫利和威廉·哈考特爵士——竞选失败后情绪很激动。这样做不但没任何好处,反而让对手幸灾乐祸。对待这种事最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你的支持者们悲伤的样子了,这种场面有时真令人心酸。这些男男女女无私地为你奉献了几个星期,现在他们泪流满面,好像世界已到了末日,这是最使人难过的了。好在竞选者获胜的机会经常有。在我本人的15次竞选中,我5次落马,10次当选。我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拍拍肩膀!热烈握手!帽子在空中乱飞!读者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我并不喜欢选举,但正是通过这些选举我对英国人民有了了解,我尊重他们。无论自由党人、托利党人、激进党人还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和善可亲,他们有公平竞争精神!

我在自传中写过我在奥德姆的两次竞选。第一次竞选惨败;第二次则大获全胜,因为当时南非战争刚刚结束,尽管那几仗很好打,但参战者的头上都罩着英雄的光环。但其时议会解散,英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动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张伯伦先生对自由贸易体制的攻击不仅是当时政局所关注的焦点,而且成了能够衡量政治态度的试金石。我被自由党选作曼彻斯特市埃克昌切分区的候选人,这是该市的中心分区,大家都认为

它是个一流的分区。我个人的奋斗也算是全国性的强烈反对保守党政府运动的一部分。1931年之前,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贝尔福先生接替索尔兹伯里勋爵出任首相,此时,20年的保守党统治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索尔兹伯里勋爵之死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界限分明的时期的结束。保守党人犯了不少错误,还犯有不少暴行。但不管他们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任何措施也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愚蠢和自负更使失败变成了毁灭。当时,有的地区的选举结果公布较早,有些县则很晚,选举会拖上五六个星期才完全结束。曼彻斯特的选举放在头两天。在议会中该市和附近的索尔福德地区总共有9个席位。几个星期前还是首相的贝尔福先生是保守派的领袖;我则是自由党方面的一号人物。竞争很激烈,但从一开始民心就很明显地偏向我们一方,然而谁也没料到结果会如此一边倒,连最狂热的自由党人对此结果也难以置信。早上保守党还占有9个席位,到晚上则全部落入自由党人之手。我穿过人山人海的街道回到下榻的住处。阿瑟·贝尔福和他的朋友们被彻底击垮了。他的妹妹爱丽斯小姐十分伤心,我们只是互相打了个招呼。

选举中获胜党的部分成员聚在米德兰大酒店吃了晚饭,当时这家酒店是最时髦、最气派的酒店,是兰开夏郡的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我请了《每日邮报》记者查尔斯·汉兹先生,他个子不高,但人很豪爽。我们是在南非相识的,他在南非战争中当过战地记者,在增援马弗京时胸部受过伤;他的文笔极好,但站在保守派一边。我问,“你对这次选举有何高见?”他答道,“这是一记重击,实在意外。”情况似乎确实如此。第二天,大小报纸纷纷恭维胜利者,说我的胜利在于我的道德准则战胜了贝尔福先生的优柔寡断和玩世不恭,还说他犯了大错云云。但我当时还算理智,并没有被这些话所蒙蔽。

赫里弗德的詹姆斯勋爵最近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埃德华国王在桑德林厄姆听到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时的情形。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肯定(如诗中所写的那样)以为自己‘踏着祥云,登上宝座’了。”曼彻斯特的大选结果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印证,统治英国多年的保守党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原本有400多个议席现在仅剩不到100个。

时机一到,靠强大的公众舆论夺到的席位往往又会重新回到本来拥有这些席位的对手的手中。1908年春,我进了内阁,出任贸易委员会主席。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必须再进行一次补缺候选。自由党政府已执政两年,既使朋友失望更惹恼了敌人,这是任何政府都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是很困难的,因为敌视政府的力量全都集中在政府中一批最活跃的代表人物身上了。这次选举最令人难忘的是它标志着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开端。曼彻斯特是潘克赫斯特^①的家乡。泼辣的潘克赫斯特夫人在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和西尔维尔的帮助下,决心采取激烈手段。当年,妇女积极参政还是件新鲜事;但把妇女逐出会场或对她们采取强制措施是不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自由贸易大厅里出现过一幕令人痛心的场面,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小姐扰乱集会秩序,终于被赶出会场。这只是个开端,后来每次自由党集会总有人蓄意打断演讲,破坏会场秩序。他们精心策划,不断叫嚷着打断演讲,这对注重演讲风格和形式的人来说是最难容忍的。当你讲到得意之处正想推出关键论点时,一切顺利,听众全神贯注,这时却有人尖叫道,“妇女怎么办?”“何时给妇女

^① 埃米林·古尔登·潘克赫斯特: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1903年在曼彻斯特创建妇女社会和政治联合会,主张用激进手段争取实现妇女参政,她使英国妇女获得了完全平等的选举权。

选举权?”等等。一个插话者刚刚被请出会场,大厅的另一处又会冒出一个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连贯地表达论点极其困难。我在曼彻斯特的西北部参加第二次竞选时,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最终我以几百票之差输给了两年前被我击败的老对手,后来被称作布伦特福特勋爵的乔因森—希克斯先生。

从宣布投票结果的市政大厅到曼彻斯特改革俱乐部只需走五六分钟。我由乱哄哄的一大群人陪着往回走。一到俱乐部,我就接到一份电报,是从邓迪市打来的。该市的自由党人一致邀请我去作为继任现任议员埃德蒙·罗伯特森的席位的候选人,因为在政府中任职的埃德蒙先生即将被提升到上院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在曼彻斯特落败到接到邓迪市的邀请只相隔短短的7分钟。这个席位是最稳固的自由党席位之一。从1832年的《改革法案》颁布以来,保守党从来未能把自己人再推上这个席位。劳工运动在当时仍处幼年期。我在邓迪安然做了15年议员。在那个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动荡岁月中,我5次以绝对多数票重返这一议席。尽管如此,我在此地的第一次竞选并不容易。该市的保守党人斗志昂扬,同时参加竞选的还有一位极端派工党候选人(一位很有才干的邮政工会代表);此外还有一位古怪的斯克林杰先生也来竞选,他是一位禁酒主义者,他特别提请人们关注酒精的罪恶。

第一周里我全力与保守党人作斗争,根本未理会工党的攻击。第一周结束时自由党人已被有效地发动了起来,与保守党人对峙,应该再调头对付社会主义者了。于是投票前的那个星期一我开始从各个方面向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我的最成功的竞选演说;所有的听众,总数超过2000,一路且呼且唱,簇拥着我穿过邓迪大街,回到旅馆。从那以后我们勇往直前,径取胜利。投票那天,从伦敦来的朋友和助手以及大批跟

踪采访的记者们的心中产生过一阵恐慌。有传言说我又落选了，而且再没有机会了。但自由党人协会主席，苏格兰老人乔治·里奇只是淡淡一笑，说道，“多数票大约在 3000 左右。”果然不错。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选举上花了将近两个月。两次竞争都很艰苦。那些主张妇女参政的女人们跟在我的后面，从伦敦到邓迪紧追不放；一个特别刻毒的苏格兰泼妇每次只要能进入会场总是拿一个大餐铃扰乱集会。持续的压力和长期的焦虑把我累垮了。补缺选举总是要比大选艰难。这两场接踵而至的补缺选举吸引了全国上下的注意力。我每天都得作很多次演讲；每张报纸上都辟有专栏。我必须川流不息地拿出新材料，保持竞选热情，同时我是内阁成员，还要领导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我的精力被压榨到了极至。回到伦敦后我真是如释重负。直到我回到伦敦，由首相阿斯奎斯先生引入下院，回到内阁上班，开始得心应手地处理贸易委员会的工作，才算是真正得到了解放。

应该补充说明一下，提倡禁酒的斯克林杰先生在总计 30 000 张选票中只得了三四百票。但他锲而不舍，在 1910 年的两次大选中又进入了候选人名单。1917 年我重返政府，出任军需大臣，在这一年的补缺选举中他又与我对垒。在 1918 年的“胜利”大选中他再次出征。在每一次选举中他的选票都有所增加，到第五次竞选时他原来的 300 张选票已经增加到四五千张。战时选举权范围的扩大从根本上改变了邓迪市的政治面貌。1918 年，人们对胜利与和平的喜悦以及对德国人的憎恨暂时掩盖了这一现象；但等到 1922 年劳合·乔治先生的联合政府垮台时，新选民的力量显露了出来。竞选开始前的第三天我得了阑尾炎，我做了个大手术，腹部的刀口有 7 英寸长。我夫人和几位朋友只好尽其所能地把这一仗打下去。

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集会处处受到捣乱，会场秩序很乱。

更糟的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普遍的不满和敌意。直到投票日的前两天我才被允许从伦敦赶到竞选现场。在手术后的第二十一天我在两场大型集会上作了演讲。第一场须凭票入场，因此秩序井然，我得以充分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晚上的会场在操练厅，闹哄哄地聚着八九千人，而且反对派占绝大多数；我的伤口还未愈合，不能站立，只能坐在轮椅上被推来推去。大手术无疑会影响身体机能，我感到极端虚弱。当轮椅穿过操练厅时，大喊大叫的社会主义分子被推到讲台时，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向我投来刻骨仇恨的目光，让我吓了一跳。我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状况极差，他们会攻击我的。在此前的8年里我得到了邓迪市保守党人的全力支持，但新选民的出现把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全都一扫而光。从前因不纳税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一大批人以及大量的贫穷妇女和磨坊女工现在有了选举权，他们在投票前两小时内潮水般地涌向投票站，把投票站围得水泄不通。我在“胜利”大选中的15000多票优势被一扫而光，这一次我以10000多张票之差落选了。谁是胜者？还是那位斯克林杰先生，他第六次参加竞选时，原来那300张选票一下子涨到了35000张。

我与他并没有什么恩怨。我知道，他的运动勉强代表着某种道德观点和社会潮流的兴起。他为争得一个议席整整奋斗了15年，15年里他在该市的每家每户访问过好几次。他得到了一群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之流的忠实的追随者的拥护和支持。他生活极为清贫，他代表着城市中受苦受难者，也代表着向一切酒类开战的强大禁酒运动。当他该对选举监察官作例行的感谢发言时，他感谢的却是万能的上帝。当时我因病未能出席，我被送回伦敦和法国南部养病，休养了很长时间。我从此永远离开了邓迪的政治舞台。

这是宦海沉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曾是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中的要员；我曾用两年的时间成功地解决了我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问题，并妥善处理了由爱尔兰条约引起的一些微妙而又危险的问题。我想我可以说 1922 年的这一届议会是我以大臣身份进入下院时遇到的最成功的议会。忽然间一切都化为泡影。我被抬上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我刚苏醒过来就得知政府解散了，与我们一直相濡以沫的保守党的朋友和同事们一夜间全变成了对手。我不再是大臣了。几星期后，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的选民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我。请注意，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正处在大家公认我在议会和政府中工作最出色的一年的年终。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丢了官，失了位，没了党，少了阑尾。

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最轰动的选举还要数 1924 年在威斯敏斯特的选举。联合政府垮台后的 18 个月里，政治局势发生了令人惋惜的巨大变化。博纳·劳先生逝世后，继任的鲍德温先生突然向全国提出了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更使公众震惊的是，自由党决定开历史之先河，把社会主义分子推向权力宝座。威斯敏斯特区的阿贝分区有一个空缺，我决定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以期联合保守党遏止住社会主义的势力，起初希望很渺茫，我没有组织，也不知道如何创立组织。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三大党派都推出了自己的正式候选人并全力支持他们。投票日定得很早，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竞选，然而我很快就有了—种十分兴奋的感觉：我有强大的公众舆论的支持！方方面面的要人名流都支持我，伦敦报界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我表示支持。保守党联盟因意见分歧而分成两大阵营，裂痕迅速扩大到整个保守党组织。人各有志，连家庭成员也分成几派；有将近 30 名保守党议员站到了我的一边，为我筹划。干劲十足的朋友们组织得井井有条。第一周结束时，我的主要助手、经验丰

富的竞选老手格斯特先生对我说我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这个选区包括上下两院、政府、白金汉宫、一些主要的俱乐部和剧场、圣詹姆斯大街、斯特兰德、索霍、皮姆利柯以及科文特加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地区。在方圆一英里之内聚集着最穷的人,也聚集着最富的人;各行各业在此都有其代表人物,而且此地也通常是各行业总部的所在地。伦敦的大潮在此地的大街上此消彼长。竞选开始后,我得到了各种各样人物的支持,公爵、骑手、拳师、朝臣、演员和商人全都团结起来了。德利剧场的歌女通宵达旦地写信封、发送竞选演说辞。看到这么多来自各阶层的年轻漂亮的姑娘热情无私地投入到与我休戚相关的事业中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振奋。保守党的领袖们也分成两派:鲍德温先生支持其正式候选人;而贝尔福先生则写了一封信,默认了对我的支持。最后的唱票是最激动人心的。直到最后我都确信自己赢了。最后一包选票搬上了桌,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现在赢了一百多票。”顿时欢声雷动,等候在外面的人群听到了欢呼声,于是这条新闻迅速由电报形式传遍了世界。1分钟后,实际数字表明我被打败了,在将近40000张选票中我以40票之差落选。我必须承认,从头到尾我都十分喜欢这场竞争。

我在邓迪市、西莱斯特和威斯敏斯特的3次竞选中屡战屡败;在1924年的大选中,我在西埃塞克斯以10000张多数票的优势重返议会,真是令人欣慰。这样,两年内我共参加了4次竞选!任何人对此都该知足了,因此我也衷心希望能在埃平^①找到一块安身之地以度余年。

^① 埃平:地名,位于西埃塞克斯。

爱尔兰条约

在我处理过的英国国家政策中,有关爱尔兰问题的谈判所引起的冲突最激烈。就大英帝国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政府体制而言,与爱尔兰的公然叛乱媾和,会从根本上动摇千百万人和众多民族的和平与秩序赖以生存的中心权威。奉命行事、忠于职守的皇家臣仆不断惨遭谋杀,如同战争时一样,谋杀都经过精心策划。文武官员、士兵和警察手无寸铁时被人在近处枪击致死,杀手虽自认为是他们的仇敌,但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明显标记,并且也不遵从任何战争规则。我们只能说这些对谋杀负有责任的人并非出于自私而卑鄙的动机,他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的行为大多顺乎民情。在谈判桌前接待这些人的领袖,并企图让他们组成一个文明的、值得尊重的政府,这肯定会被认为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危险的试验;人们认为,一个刚刚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强大帝国是不会如此草率的。

另一方面,还有爱尔兰的历史需要考虑:一代又一代,爱尔兰和英国这两个同宗姊妹、隔水邻邦之间争吵不断,相互伤害,英国的每一颗自由之心都热切希望这种可恶的恩恩怨怨能够早日结束。到了19世纪,英格兰和爱尔兰双方都以比过去黑暗时期更为高明的方式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英格兰采取了大量的补救措施并对爱尔兰进行安抚;爱尔兰则基本上是通过宪法和议会行动提出自己的要求。问题本该在1886年即可得到解决,这

样的话对爱尔兰和大不列颠都有好处。在地方自治法案问题出现分裂之前,格拉特斯通先生在下院说:“爱尔兰正满怀希望地恳请你们的裁决。她的要求是真诚、理智的。她要求得到赦免,赫免了她对我们甚至比对她更为有利……想一想,我恳求你们好好想一想,明智地想一想,在你们决定否决这个法案之前,不但要想一想现在,也想一想将来。”1903年,爱尔兰的要求得到了下院的批准,但体现这一要求的措施被上院投票否决了。1914年,经过4年的党派之间的激烈争斗,第三个地方自治法案似乎出台在望了。势力强大的保守党不辨黑白,大肆鼓吹违背宪法的主张,几乎把国家带到了内战的边缘,直到大战的炮声响起,这个可恶的问题才被淹没下去。后来地方自治法案终于进入法令全书,但有个条件:在大战结束前这个法案不得付诸实施。到1920年,虽经多方不断努力,问题仍未解决。爱尔兰已经无法统治了,只有行使恐怖和暴力征服,然而这样做有违英国的体制,也不符合英国的国民性格。

希望对爱尔兰条约作出公正评价的人士必须考虑到上述情况。这些情况也可用来解释英国政府的困惑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抓住大局”。

国王亲自设立了北方议会,这是引发这一系列谈判的真正起因。大臣不应该使君王发出只适用于北爱尔兰的圣谕。众所周知,国王行事不仅根据宪法条文而且根据宪法精神,他衷心希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宗派,爱尔兰的所有臣民都能分享圣谕的福泽。君主的眼光超越党派之争、种族和宗教冲突以及一切地区间争执,必定代表着帝国的整体利益。北爱尔兰的首相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已单枪匹马地把德瓦勒拉先生请出山,他们凭着自己的政治才能和胆识为和平事业而奋斗。与其说国王是在号召,不如说是在恳求众人齐心协力,结束这场日益扩大的、玷污

爱尔兰和大英帝国名声的灾难性冲突；而政府执行这一圣谕的全部责任都落在了他们两位身上了。两岛人民对这一恳求作出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响应；从那时起，事态顺利地朝着有利于建立爱尔兰自由邦的方向发展。

从一开始，最重要的事便是要让那些现在被承认为爱尔兰领袖的人相信帝国政府的诚意和善意。此事重大，容不得讨价还价、争执不休。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我们能给出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作让步。我们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条件能被接受，那么无论政府会因此遭受什么样的政治打击，也无论政府领导人会因此遭到什么样的政治挫折，我们必将义无反顾地兑现我们的承诺。一系列漫长的、关键性的谈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在谈判初期，我们面对着爱尔兰极端派秘密团体的不现实的浪漫幻想，也面对着几百年来两国间一直存在的相互怀疑和仇恨。强酸是炸药和其他强爆物中的基本成分，这种可怕的液体慢慢聚集与毫无危险的碳化物结合就会释放出能量巨大的爆炸力，能损人肌体、伤人性命。存在于政府中的仇恨正与化学中的强酸起一样的作用。爱尔兰人心中的仇恨正如吉卜林先生所说的“能吃掉枪托中的钢铁”；谢天谢地，100年来大不列颠人民的心中总算没有这样的仇恨，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克服。

参与谈判的英国大臣们与爱尔兰人的代表们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对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我简单地讲一讲发生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的几件事，借以说明双方的偏见是如何被消除的，以及双方如何架起了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桥梁。

格里菲斯先生是位作家，他对欧洲历史和国家体制深有研

究；他性格坚毅、刚直不阿；他是一位特别沉默寡言的爱尔兰人，常常一言不发，但据我所知，他对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绝不食言。劳合·乔治先生描写道，谈判出现危机时双方随时都可能决裂；但格里菲斯先生不动声色地说，无论别人如何，他都将接受英国政府提供的条件，并返回爱尔兰，催促爱尔兰人民接受这些条件。

与他年长的同事相比，迈克尔·柯林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具有超凡的天资，他比他的领导更接近各种可怕的冲突事件的中心，而他在爱尔兰极端党派中威望越高，影响越大，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就越大，与同伴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激烈。

有一次我在会上说：“我敢肯定，你宁可在战场上好好打一仗。”

他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他答道：“我写了一篇关于在战争形势下我们军事力量局限性的文章。我们哪个县都不可能组成一支像样的正规军。”

后来他又说：“在1916年的暴乱中，你们手中有百万大军，因此我们在都柏林的几百号人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必死无疑。这就是我们所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我问：“我们把所有警察和大多数部队都撤出，如果有人撕毁条约、要求建立共和国，你会采取什么立场？”

“不过，你们在重要的地方仍有很多军队，而且我国到处都是突破口。我个人将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决裂的发生。如果闹事的只是些狂人，我们应该能够控制住他们；但如果爱尔兰人中的绝大多数与大英帝国交战，那我不会与他们为敌。我将放弃任何权威，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加入他们的行列，直到战死沙场——大概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有权对我们采用一切战争手段；全世界只会说我们做得不对。不过，这种事是不会发生

的,不会这么糟糕。”

有一天我对格里菲斯先生说:

“我很想看到我们把你们彻底打败,然后我们再把现在给你们的一切全都给你们。”

他答道:“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但你的国人理解吗?”

我不知道。历史上的胜利者绝少能够突然转向和平,以其慷慨大度保证其胜利果实的安定。胜利时刻的政策必为战争激情所蒙蔽;然而与敌人的战斗已结束,下一步是与自我的搏斗,这才是最为困难的。世界因此不仅进步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并且经历数不清的倒退。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良机几乎总是被白白地浪费掉。人类必须同时与人性的两面性作斗争。能赢得胜利的人不知如何取得和平,争取和平的人却又永远不会赢得胜利。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欧洲形势,我们不都看到了吗?不过,历史并非总是如此。在阿波马托克斯^①,格兰特将军把自己部下急需的军粮送到饥肠辘辘的南军手中,告诉李将军把战马牵回家去耕种荒芜了的南方土地。当年的铁腕人物俾斯麦于1866年鼓动国王、内阁和普鲁士将军们向奥地利开战,当兵临萨多瓦,奥地利任其宰割时,他却班师回头。还有常被人误解的伟大的卡斯尔雷^②,他与法国人为敌几十年,但在胜利之日却宁愿与其盟友普鲁士和俄国反目成仇,也不愿让他们肢解和压迫法国。此外还有当今的南非问题,随着决定性的战争胜利而来的是政策上的大让步,其结果惠及今日。

① 阿波马托克斯: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南北战争中李将军率南方军队在此向格兰特将军率领的北方军队投降。

② 卡斯尔雷:英国政治家。曾组织英、奥、普、俄四国同盟以反对拿破仑,后又竭力制止俄国的领土扩张,加强中欧地区力量。

我对布尔战争^①的解决有切身体验，因此在处理爱尔兰问题时，布尔问题的解决时时给我以安慰和灵感；它对所有人都有极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格里菲思先生和柯林斯先生在我家与首相会面。当时谈判出现了危机，形势千钧一发。格里菲思上楼与劳合·乔治单独会谈，伯肯黑德勋爵则与我一起留下来陪迈克尔·柯林斯。当时他情绪极差，心怀怨恨和不满，谁处在他这种位置，都会发脾气。

“你们没日没夜地抓我，”他发难道，“还悬赏要我的脑袋。”

“别急嘛，”我答道，“你并不是唯一被悬赏捉拿的人。”我从墙上取下镶在镜框里的布尔人悬赏捉拿我的告示。“不管怎么样，你的价码还是可以的，有5000英磅呢。你看我，才值25英磅，还是死活不论。你觉得怎么样？”^②

他读着告示，读完后大笑起来，他的恼怒立刻烟消云散。当晚我们的谈话很有成效。尽管我承认在内心深处，我们之间还横亘着一道鸿沟，但我坚信，自那以后我们从未失去相互理解的基础。

在他与英国政府的关系上，迈克尔·柯林斯言而有信。有时他必须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总是有人向他发出死亡威胁，而且他熟知这些人的手段；秘密结拜过的盟友谴责他卖国求荣、背信弃义；他是十几桩暗杀阴谋的目标；易于冲动的本性也使他动摇过，但他严格遵守他与英国大臣们之间达成的协定。他曾经仇恨过英国政府，但终于还是学会了信任它。他坚信他们不能破坏建立在信任和善意基础上的条约，不能玷污了爱尔兰的声

① 布尔战争：即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

② 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没悬赏这么一笔赏金，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丘吉尔原注）。

誉。

谈话接近尾声时,他说:“我估计我不久就会遇害,这样倒是很有帮助的,我死了会比活着更能促进和平。”

不久,他确实用自己的鲜血签署了和好条约。在这位爱尔兰领袖的遗像上,约翰·莱弗里爵士写下了“爱尔兰爱神”几个字,这是他应得的褒扬。在这几个字的后面还可以续上“英格兰之荣”。海峡两岸共守诺言,我们殷切希望几百年来的磨难能就此结束。

议会制政府与经济问题^①

这次演讲的题目听起来好像与当代党派分歧有关,诸位无需担心。一旦穿上学术的铠甲,在此我就是真理的追求者;在探索过程中,如果我偶然发现了某种显现真理的苗头,那么真理的追求者将毫不犹豫地担起向导之责。

自古至今,统治国家的最佳方法被公认为是通过交谈。一大群代表或自称代表国家的人聚在一处,面对面地把我们的问题讨论清楚。公众一旦选定了这些代表人物,即使对他们的判断能力有所怀疑,那也只能听天由命。公众习惯于遵从议会的决定;得到议会中大多数人支持的统治者不怕对抗命者采取强制手段。英国人也许不是这种方法的发明者,但无疑是这种方法的专利权获得者。在这个岛上萌芽并成长起来的那些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被许多新老国家采用,并在世界上许多强国扎下了根。

然而我们发现,如果这种政府体制建立在普选权之上,它将失去权威性。选举人和代表大会之间横亘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不成文的程序,而且代表大会本身也受制于各种外界压力,所以那句“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② 的名言在许多国家只不过是

① 本文为1930年6月19日丘吉尔在牛津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

② 此句取自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幻觉。19世纪的欧洲满怀希望地建立了许多议会,有不少机构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里为民主争得了政治地位,但民主对这些机构并不在乎。它似乎已经准备把几百年艰苦斗争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权利让给政党组织、各种协会和社团、军事首领和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说,代表机构仍然在世界各地占着上风。在美国,代表机构几乎是完全通过政党机器表现出来的;但在国内,虽然政党组织必不可少,而且力量很大,但议会的概念仍占主导地位。

依我看,在世界上的各种议会和参议院中,只有我们的议院——特别是下院——才是富有活力的统治实体,才是迅速传递公众舆论的工具,才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的舞台——也许还是个缓冲舞台。它是造就国家重臣的大学,也是国家管理力量的坚实可靠的基础。我认为我们的议会制度对我们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它们把人民的生活与国家行动最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它们显然具有无限的适应性,是各种革命的或反动的暴力的有效的缓冲器。保护这些制度的健康活力,保护它们不受外部力量的侵害,用国家全部智慧和力量让它们永葆青春,代代相传,这是忠实的臣民应尽的义务。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战后英国公众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战前议会所争论的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党派之间为那些众所周知的一般问题争执不休,当时的国民生活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度过的。然而,战后的问题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战后的形势不再是党派的相互斗争,也不是政治家的相互嘲讽,而是一届又一届政府与经济问题对峙,决定政府成败的是其与经济斗争的胜负。国家感兴趣的不再是政治,而是经济。大体上说,我国已经有了它所需要的政治体制,它现在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金钱、更好的时光、稳定的就业、更多的享受和物质的繁荣;它

觉得自己未能跟得上当今世界的发展步伐,失去了自己的相对位置;它觉得科学和机器应该能够带来更快的进步;它对国内的生产、消费和就业极不协调的现象感到不满;它要求议会给予指导。然而,尽管议会在许多问题上都能口若悬河,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却哑口无言。

在处理政治问题方面,没有哪一个团体能比得上我们的下院,其组织结构经得起最激烈的竞争。它的悠久传统,它的集体特征,它的灵活程序,它的社会生活以及它的不容违背的不成文规则使这一机构最适合于兼收并蓄的目的。每一次选举权的扩大都会改变其成员的性格、观念和他们的财富。18世纪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乡绅以及年轻的贵族已经让位于商人和中产阶级,这些人又把成百上千名工人吸收到他们中间来。虽然议会中人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议会的本质和精神依旧。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是福克斯还是伯克^①,无论是迪斯累里还是格莱斯顿,如果他们今日重返议院,用不了几个月他们又会驾轻就熟,重振旗鼓,他们也许会觉得做到这一点真是易如反掌。

目前,下院正在努力消化和吸收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大党。这份大餐不易消化,吸收更需要时间。这条宪法大蟒几十年来不知吞下了多少代驴子,所以只要假以时日,它就一定能把这些兔子,不管数量有多大,化为自己的营养。同样,下院驯养、安抚、教导、纠集了各种各样的男人,甚至妇女!虽然后面的这份佳肴并不如想象中的可口味美,但总的看来,在处理现实政治方面下院是无可匹敌的。

但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就是另一回事了。因阶级和党派的对立和分裂而得以当选的议员们可以在议会中找到协调其分歧

① 伯克:18世纪英国辉格党政治家,下院议员。

的手段以及保持国民生活的变化能正常进行的方法。只要数一数人头,或通过你争我抢的竞选,政治问题大多能够得到解决,但我们十分怀疑经济问题是否也能通过这种办法得到解决。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建立在成人选举之上的议会机构能否对复杂的现代商业和金融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当然,如果下院关起门来三四个星期,专门论证那些为本岛以及以本岛为中心的整个帝国的严峻经济形势所提出的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开门之日,很可能会有人拿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并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竭力寻求大众支持的政治家要想找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最佳途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迫切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找出重振经济的国策,以更快地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如果有什么良方需要历时数载才能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实际经济地位和相对经济地位,才能为我们的将来开辟一条坦途,那么这种方法很可能极不受欢迎;即使某一政党掌握了什么秘方,它也决不可能在别的政党反对之下还能贯彻自己的政策。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说,没有什么受欢迎的、能得到大众支持的方法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满足大家的普遍愿望。

我们的党派人物对某些经济问题一直争执不休,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持怀疑态度,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问题。

100多年来,经济学上经典信条的坚强堡垒一直是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这些信条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进口自由:不管其他国家做什么,也不管进口会给国内的某一行业或利益带来何种后果。二、对偿还债务课以直接税:不管这种课税对个人及其企业或积极性会产生什么影响。三、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和军事开支厉行节约。四、严格坚持债权人的权利,要求债务必须得到全部偿还。五、对各种国家扶植工业的形式和为创造就业机会而向国家举债的行为极度不信任。六、完全依赖既

不受国家束缚也不受国家照顾的私有企业。这些教条以及与此相近的信条是大众经济观念的一部分,它们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教科书里有详尽的解释并且有现代历史佐证。

今天,我并不是想对这些信条作出评判,但是,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信条,我们都会清楚地发现它们与现在的形势不符。毫无疑问,每一个政党都会不经意地从这些经济规则中挑选出一些信条以取悦那些投他们的票或他们认为会投他们的票的人。他们根本无视他人的存在。接着他们就会以他们的教条为荣。但公众舆论的发展,特别是选举舆论的发展已自觉地抛弃了这些大众信条的许多方面。比方说,没有人会赞成工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观点;也不会有人认为,因产业更新、地区发展、国际通讯的改进以及巨大的投机而引发的现代工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应该依靠向失业工人鼓吹勤俭节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来解决;更不会有人相信私有企业是从事有效经济活动的唯一途径。大众的看法正好与之相反,而且实践活动早已超越了观念的发展。一般来说大家都承认国内的劳苦工人应该得到保护,应该不受外界纷扰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家应该对工业进行干预——有人说通过税收,有人说通过信贷,也有人说应通过直接调控,大家一致赞成通过工业立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影响深远的立法框架已经在酝酿之中。用于社会和扶助目的的巨额开支迅速增长;直接税已上升到了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梦想不到的程度,并已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负面作用。我们所面临的新生力量在那些教科书的成书时代是不存在的。世界上的物价以及某一工业中的霸主地位的变化是巨大的,英国人口和消费能力的稳步增长并未减缓这种变化趋势。巨大的资本积聚预示着新的地区和新行业的发展;一些大的经济项目因拥有科学化的大生产而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和贸易

协定的出台跨越了国界、民族情感和金融法规；所有这一切都是新生因素而且会成倍增长，但是任何事情太多即过。可以肯定的是，书本中所说教的，无论其逻辑多么严谨，也无论其作者多么杰出，它们未能妥善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根本未能解决任何问题。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比仅仅打破旧的条条框框要艰巨得多。这些条条框框很可能有其合理性，它们也许是未来大厦真正的基石。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打破这些基石，把残砖碎石拿来作为党派之战中的武器，我们的任务是在此基石之上再构造一层协调、对称、完整的建筑。这正是我们面对着古老尊敬的议会和心烦意乱的政党领袖时心中所具有的危险的谜团。如果过去的经济学信条已不再适用于我们的社会，那么必须有同样是自成体系的、同样适用的新观念取代旧信条。新体系无须与旧体系对立；相反，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新旧体系必须协调一致，只是新体系应更复杂、更进一步。

我来举个例子。一方面，我们被告知进口有损于我们的繁荣，所以我们应加以抵制，大大地削减其总量。你们可能记得，大战中的德国潜艇曾为我们做到过这一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所享受的不是出口货而是进口货，拒绝进口就是拒绝出口所给我们带来的收益，从而妨碍了出口，或者说拒绝进口就是拒绝接受我们在海外巨额投资的赢利，所以进口越多，好处越多。我们为什么必须接受这种悖论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使进口总量稳中有升，但同时通过调节进口商品的种类和原产地以改变进口货物的性质，这难道行不通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对进口问题简单地说“行”或“不行”，而是一个建立在系统原则基础上的对具体事物具体对待的程序。这些原则无疑是存在的，但那些作出了保护地方企业承诺的议员候选人或那

些因支持政府大臣而得到照顾的矿工选民不大可能发现这些控制进出口的原则。

显然,这类问题需要有高明的、冷静的、技术性的、非功利性的决策;这类问题需要有强有力的规章制度做保证,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

我不相信我们的议会和选举机构能够发现真正的经济原则,即使有忠实可靠、充满活力的新闻媒介的引导,他们也难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大选,在大选中我们教 800 万人高歌“让外国人付出代价”,另外 800 万人齐唱“劫富济贫,增加消费能力”,再来 500 万人吟诵“你的食品价格将上涨”,这三点我们也许能够做到!我们很可能真会这样做!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并不聪明,日子也不会更好。

我们目前的困难有其世界现代经济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就是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奇怪的差距。我们拥有知识和科学,拥有便捷的通讯联络手段,然而无比强大、秩序井然的社会竟会成为这些反潮流的牺牲品,这不是很奇怪吗?谁会想得到辛辛苦苦地生产生活必需品竟会比为之寻找消费者还要容易?谁又会想得到充足的廉价的基本生活用品竟然不能为世界的科学和文明所用,我们的研究和组织生产所取得的胜利难道仅仅给我们带来了“富足之灾”这种新的惩罚吗?我们真的相信无法更好地协调供需关系了吗?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从俄国的共产主义极端到美国的资本主义极端,人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各种形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全都失败了。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上我们并不比蛮荒时代进步了多少。当然,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应该得到世界上所有最精明的人的关注。最先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将名垂千古,并将占有巨大的优势。然而,民主、议会政府,甚至大选能

否作出决定性的有益贡献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制定出更高明、更复杂的经济、财政和金融计划吗？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于我们的实际情况和要求的原则吗？这样的—个政策体系能否建立在国家基础而不是政党基础之上呢？这一体系建立后能否让它避开政治纷争，在国人同意的基础上给它—次尝试的机会呢？对议会来说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代表机构一旦由成人选举来处置就会面临着许多危险，这些危险可能来自左翼，也可能来自右翼，这两方面在今日的欧洲都有先例。但英国的议会体制不会因政治动荡而被推翻：这正是它最害怕的一点。只有当议会无力处理一些基本的、紧迫的经济问题时它才会过时。这个挑战已经出现了。

我们必须看到，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同，无论多么热切的国民愿望都不能解决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必须依靠采取正确的行动。得票再多也治愈不了癌症；治疗癌症需要的是适当的疗法。谁都知道人民希望什么，他们需要繁荣。如何才能繁荣呢？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选举人及其代表都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政府和各个党派即使知道某些疗法也不能自由地宣扬。选举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流行观点，而且每个观点都可能会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一个观点都不能为我们提供问题的全部答案。因此，现在的舆论倾向于处理只与国家有关、与党派无关的问题。有人说，各党领袖应集中起来拿出一个共同方案，但这些身处政界的领袖们在这样的—个会议上只会委婉地重述那些老生常谈的反对意见。

这样看来，似乎只有非政治性团体对此进行研究才能给这个严峻的问题带来新的曙光，这个团体应由了解经济问题的资深学者组成，不受党派牵制。因此，议院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个

下辖机构并竭尽全力给予支持。这个经济小议会可以无畏于公众舆论,日复一日地讨论所有很有争议的金融和贸易问题,最终通过投票表决得出结论。这将是一个创举,而且很容易为我们灵活机动的宪法制度所接受。我认为,政治议会完全可以按照其党派组成的一定比例——比如议员人数的五分之一——集中有技术资力和商务资力的人选,组成一个经济小议会。德国人已冷静地接受了这种想法。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团体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辩论,丝毫不必顾忌谁能赢得大选,谁有处理失业问题的最佳口号,或谁自称能够解决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严峻的经济问题。我认为,目前经济议会应该比政治议会得到更多的注意;政治议会应该以其在辩论方法和程序方面所掌握的技巧和经验去协助经济议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批能适应这个关键任务的人员,他们应该能够日复一日地一心扑在这个任务上,不必害怕,也不需别人的支持和恩宠。这样的—一个团体得出的结论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只要他们意见一致,那么这个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综合性的、完整的、权威性的观点,可以完全照搬到政治领域中来。

我重申一下我的论点。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的经济问题是很紧迫、很重要的。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符合宪法的机构有资格、能够不带任何党派偏见来处理这个问题。全国上下翘首期待的下院因其性质和条件所限,不适合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任务必须完成。大不列颠是不可战胜的,不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议会正经历一场考验,如果此刻它仍然不能作出真诚有效的指导,那么在政治领域内很受崇拜的议会机构很可能会在一片谴责声中倒台。如果议会以及附属于议会的大臣们还是拿不出新政策,那么他们应该抓紧时间专门为此目的设立一个机构并委以必要的权力和条件。

今天,我讲了这么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话题,希望大家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对我们来说,刚刚过去的这几个年头^①正与大战中的那几年一样严峻。大战中大英帝国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正在丧失,实际上在和平后的几年里已丧失殆尽。我们的民族对自己的使命犹豫不决,对自己的信念也失去了信心,目标不坚定,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不定。指南针坏了,航海图也过时了,船员只得轮番当船长,每一位船长在每次转动船舵时不但必须服从船员的投票表决,还要听从不断增加的乘客的意见。然而这条船上拥有不列颠人民的全部力量和声望,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财富。请这所大学^②担起自己的责任,把我们的经济思想提高到适应目前经济形势的水平,再把思想付诸行动,否则这个思想只是徒劳。

^① 此演讲发表于1930年,此时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1925—1929)刚刚过去,许多国家的经济还未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② 指牛津大学。

我们非得自我毁灭吗？

人类的历史是战争的历史，除了短暂的战事间隙之外，世界从未有过安宁。史前社会就充满了永无休止的杀戮，但直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毁灭工具的发展尚未能与其残忍的程度保持同步。在石器时代，相互毁灭是不可能的，笨拙的大棒毕竟威力有限，况且当时人烟稀少，容易隐蔽，很难找得到对手；即使找到了，也因逃跑速度太快而捉不到。人仅靠双腿所能走的路程是有限的。即使下定决心要毁灭同类，他也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依照这样的路子发展下去，人类不可能取得进步。但是人类必须生活、狩猎和睡觉，所以在生与死的天平上，生占了上风，于是渐渐出现了部落、村庄和政府。

后来，毁灭的努力进入了新阶段，战争变成了集体活动。道路的建筑方便了大队人马的运动。军队组建起来了，杀人工具也得到了很多改进。金属的应用，特别是铁的应用，为刺穿和砍削人类的肌体打开了新的通途；弓箭、投石器、战车、马匹和大象也为此提供了无价的帮助。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障碍：政府不稳定，军队常会引起内乱。让聚集在一起的大批士兵吃饱喝足非常难，这自然影响了军队的组织，从而大大阻碍了毁灭性力量的发挥，因此在生死天平上生的砝码依然比死的砝码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类社会进入了活动范围更大更复杂的时代。

然而，直到公历 20 世纪初，战争才开始真正具有潜在的彻底毁灭人类的威力。人类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和帝国，民族意识也大为提高，战争的计划和设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度和广度。个人的崇高美德被集中起来，强化了集体的毁灭能力。金融力量、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信贷资源、大量的资本积累使民族力量长期投入毁灭性的战争成为可能。民主机构体现了几百万大众的意志。教育不仅使所有人都能理解冲突的过程，而且能使每一个人都为某一目的服务。新闻媒介是促成万众一心、大家相互鼓劲的工具；宗教虽然小心地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发生冲突，但却又通过各种方式对所有的斗士提供安慰和鼓励。科学则为拼命索取的人类展示了其奥秘和宝藏，把命夺玄关的杀人工具交到人类手中。

由此，战争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受饥饿困扰的不再仅仅是被围困的城镇，有时整个国家都被有意置于饥荒的威胁之下以削弱其力量。所有人口都会以各种不同身份卷入战争，所有人都是攻击对象。空中力量能够把死亡和恐惧带到战争的大后方，威胁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的生命，而从前战争是影响不到这些人的；神奇的铁路、轮船和机动运输工具不断调遣着成千上万的部队；医疗手术技术的发展把士兵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到混战之中，劳民伤财却丝毫无补于战争这种巨大的浪费。在战争中，一切垂死挣扎的手段都用上了。

然而这次大战中前 4 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战争第五年的前奏。1919 年的战役本来可以展示这一毁灭性力量。假如当时德国人一鼓作气撤退到莱茵河边，那么 1919 年夏对他们实施攻击的力量和方法将是前所未闻的：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平他们的城市，几万门大炮将摧毁他们的防线。当时的行动计划准备同时调集 25 万大军，机动车辆运载着人员和装备以每天 10 至 15 英里的

速度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防毒面具才能抵挡的烈性毒气（当时德国人尚来不及搞到这种防毒面具）将击溃一切防御，使受进攻的前沿阵地上的一切生命全部瘫痪。毫无疑问，德国人也有自己的计划。所幸怒火焚胸的时刻已成过去，结果令人欣慰，于是1919年的恐惧就永远埋在敌我双方的档案馆里了。

这次大战打得突然，也停得突然。世界再一次抬起头来，审视战争的废墟，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如释重负。在成百个实验室、上千家兵工厂和机关里，人们如梦方醒，一齐丢下了令他们全神贯注的工作；他们手中的项目中途下马，但他们的知识还保留着；他们收集到的数据、计算公式和科学发现被各国的战争机构匆匆归拢到一处，贴上“以备参考”的标签。1919年的战役并没有真正爆发，但其思想却流传了下来。每一支军队都在和平的掩盖下探索、扩展、改进这种思想。如果世界上再发生战争，那么下一场战争就不会再使用准备在1919年使用的武器装备了，那时候的武器将会威力更大，致命力更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了俗称和平时期的战争疲劳阶段，我们也有了机会可以思考大局，于是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冷酷无情的铁的事实像巍巍大山一样显露出来。可以肯定，今后的战争将波及全人类，人人都会竭力为战，大家都将受制于敌人的暴虐。可以肯定，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的国家会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为生存而搏斗。今后战争中的毁灭手段很可能——不，肯定——将是大规模的、无法限制的，一旦发生也许就再也无法控制。

人类从未陷于现今所处的地位。人类的美德和自制力并没有多大发展，而今人类却掌握了自我毁灭的工具，这就是人类光辉历史和勤劳奋进给其自身带来的一切。如果人类能冷静思考其新的责任，那将是人类的幸运。死亡俯首贴耳地随时准备为

人类效力，随时准备大批地铲除人类，彻底碾碎其文明，使之万劫不复。它只等其脆弱昏庸的主人一声令下，便会动手。

不要认为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战后出现的暂时麻木和乏力中蕴育着落落寡欢的情绪，战争的恐怖和暴虐已深深植入每一个种族、每一个阶级的灵魂，主导着人们的心灵，但导致战争的因素并没有消除，实际上所谓的和平条约和对这些条约的反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战争因素恶化了。欧洲的两大家族绝不会安于现状：随着岁月的流逝，被夺走波罗的海领地的俄国会念念不忘彼得大帝的辉煌战绩；对法国的刻骨仇恨使德国上上下下团结一心，达到服役年龄的德国青年人数在年年增加，他们怒火中烧，德国的灵魂深处燃烧着复仇之火，时刻准备打一场“解放之战”。这些思想暂时受制于力量薄弱。法国人武装到了牙齿；德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武装，其军事系统已被粉碎。法国人想通过军事技术、要塞屏障、黑人雇佣军以及和欧洲其他小国结盟等手段保持现在的局势，他们目前确实占有优势，但只有实力而没有世界舆论的支持并不能保证持久的安全；德国人比法国人齐心，不可能永远受制于人。

几年前有位美国名人曾对我说：“战争是靠钢铁打的，武器可能会有变化，但钢铁永远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法国拥有欧洲的钢铁，而德国人则失去了它，这一点至少是不会改变的。”我反问道：“你敢肯定将来的战争还是依赖钢铁吗？”几个星期后我又和一个德国人谈了起来。他说，“你觉得如何？有人认为下一次战争要用电来打。”这一席话展示了电流用于战争的前景，电可以用来摧毁机动车辆的引擎，可以击落飞机，同样也可以使人致命，或使人丧失视力。此外还有炸药。我们穷尽了炸药的威力了吗？对炸药的科学研究已经到尽头了吗？难道不会出现比过去的发现更加密集的爆炸能量吗？难道不可能出现能炸毁整幢

大楼的小橘子一样大小的炸弹吗？难道不可能出现能集中上万吨炸药的能量、可一举扫平一座小城的小炸弹吗？难道现有的炸弹不能通过无线遥控、无人驾驶的自动飞行器投向敌方的城市、兵库、军营和造船厂吗？

至于各种形式的毒气战和化学战，历史才刚刚写下其可怕的第一章。毫无疑问，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利用科学，以极大的耐心去研究这些新式的毁灭手段。凭什么能肯定战争资源一定会局限在无机化学领域之内呢？不止一个大国在各自的实验室里研究疾病，研究如何制造瘟疫并把它投向人类与兽类。摧毁庄稼的细菌，残害牛马的炭疽病，不仅毒害军队而且祸害整个战区的瘟疫全都在沿着军事科学的发展路线勇往直前。

显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势均力敌的战争，世界将毁灭，人类将遭殃；如战争的一方在科学上占有绝对优势，那么弱者必然会受到彻底的奴役。现在，这些力量就掌握在人类的手中，可以用来消灭一个个国家和民族；同时，这些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一群文明的人类提供了可以把同类置于绝对束手无策境地的机会。

在蛮荒时代，要取得如此绝对控制权就必须在体力、勇气、技巧、纪律等方面具有超凡的品质；在人类演化的艰难过程中，适应这种演化的人能占据历史的显要位置。而今这种可能性荡然无存。如果一个卑鄙下贱、不讲道德的民族偶然制造了新的致命工具或掌握了恐怖的方法并冷酷地加以应用，那么它完全可以使比它更高尚的敌方无力地屈从于其贪婪和独裁。人的自然素质不再能够保障其自由，高尚的品质和骁勇将很容易成为新式武器的牺牲品。

在毁灭性科学的阴森小道上有一个新的转折点，似乎可以纠正这些致命趋势的偏差。在某种程度上电磁波可望能够远距

离引爆各种炸弹。如果这种方法能被及时发明,为大家所共享,那么战事很有希望重新回到其蛮荒时代的简陋却有益的局面中去。大刀长矛和棍棒,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中的人,又将重现往日的辉煌;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因为各个军事科学领域已被开发殆尽。可恶的炸弹时代还将继续,而且这个时代必将夹杂着可憎的毒气和细菌。

这就是人类用于威胁其自身的危险。大规模的、可怕的、与人类的优点毫无关系的毁灭手段具有难以估量的威力;科学的进步已展现出更多令人震惊的可能性;怒火在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民族的胸中燃烧,不断的挑衅和永恒的恐惧为之火上浇油,埋藏在心底的民族野心或民族危机感更使形势雪上加霜。从另一方面看,对战争的厌倦是人类的福气,它为各国控制其自身命运、避免世界末日的到来提供了最后的机会。如果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尚存,如果个人、民族以至全人类尚有求生的愿望,那么人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竭尽全力避免大灾。

在山雨欲来、乌云压境的形势下,国际联盟真诚地提出了充满理性和希望的标准——尽管美国对它弃若敝屣,苏联对它冷嘲热讽,意大利对它百般抵制,法国和德国也对它满腹狐疑。国际联盟的结构是个空架子,充满了光辉但常常只是虚幻的理想主义,其目前的组织形式无法保卫世界和平,也不能保护人类不受其自身的危害,然而国际联盟是唯一通向安全和拯救的道路,支持和帮助国际联盟是所有人应尽的义务。与将来的痛苦和灾难相比,我们现在所经受的磨难将是微不足道的,为使我们的后代不再受痛苦和灾难的折磨,我们应该巩固国际联盟,使之在现实世界的政治中发挥重要的实际作用,大国之间和主要的民族之间应通过国际联盟真诚地达成协议和谅解,这应该是所有人的首要目标。

现代生活中的群体效应

领袖到底是决定了事件前进的方向,还是只是偶然走在了前进大军的前列?到底是个人的决心和业绩决定人类的进步,还是时代和环境决定个人的决心和业绩?历史到底是名人的传记,还是关于名人对其所处时代大潮、趋势和机遇的反应的记载?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想和智慧到底是归功于光彩夺目的少数人,还是归功于默默无闻的群众?只有提出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民族的历史,或者回想一下我们个人的微不足道的经历,肯定会发现偶然因素无时无刻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件事或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如果这个命令没有发出或那一拳没有打出,如果那匹马没有失足,如果我们没见过那个女人或没赶上那趟火车,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将完全变了样;我们的生活如此,别人的生活中也有这种可能,于是这种可能会逐渐波及到整个世界的运动。如果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中有这种情况,那么思想家、发明家、指挥官等大人物的生活对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将是何等巨大。不错,大人物也必须生活在一定的背景、环境和机遇之中,但这些条件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力量。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伟人的思想、行动、品质、美德和他们的是非功过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巨变是已经发生,是正在出现,还是即将来临?人类不是正在逃脱个体的控制吗?在重大事务中群体的

作用不是愈来愈重要了吗？现代局势——至少是英语国家中的形势——难道不是正朝着敌视个体影响的方向上发展吗？果真如此的话，这会使人类更伟大、更辉煌吗？这些问题值得有识之士仔细考虑。

毫无疑问，今天的人类显然缺乏个人领袖。已故的约翰·莫利先生是位政治家、慈善家，也是位作家和活动家，几年前去世前，他发表过一次演说，提醒人们注意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和艺术领域内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衰落。他把在 20 世纪初的各行各业中的出类拔萃人物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优秀人物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演讲术、理政术、诗歌、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等领域内“鲜有王者”。他尽可能含蓄地指出，有一大批明哲保身的庸人整天围着那些用勋章装饰的大人物的宝座忙忙碌碌。这种一针见血的看法很不受欢迎，但却谁也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美国。尽管我们不希望厚古薄今，但在今日的英语国家里确实很难找到一批翘楚人物。无论是名望和成就，今日之俊才绝难与我们祖先所景仰的人物相媲美。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一个伟大领域内的宝座中一直不乏真正的领袖人物。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在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积累的知识相互交融，科学研究的质量不断提高，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忠贞有增无减。但即使在这一领域内，群体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人成就。科学王座上有俊才英杰，但那是一个群体。

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集体化过程对我们的巨大影响。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家庭作坊式企业里，工厂主和工人有直接接触，现在这种企业已被大公司消灭或兼并了，而大公司则又被更庞大的托拉斯吞并。这种过程可能会使个人的处境艰难但

却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社会化大生产使公众能享受价廉物美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也使工人能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保障。

这种结果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影响很大,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发现独立自主的人大大减少了,很少有人能够“不依赖他人而生活”。作为大公司的工薪职员他们也许能生活得更好,但他们失去了远见和进取心、失去了自由和创造力,也失去了社会地位。

上述事例是现代工业社会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典型代表,如果我们想享受科学文明所能赋予的丰富的物质条件,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现在的公众舆论是由机器形成并通过机器表达出来的。报纸为众多的普通男女做好了思考工作。标准的观点和看法从报纸上取之不尽,每时每刻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收集而来的新闻更是源源不断,所以个人实际上既无必要也找不出闲暇来进行思考。这一切只是一个庞大的教育过程的一小部分,这种教育宽泛而又肤浅,人们对此充耳不闻。这种教育造就了大批标准公民,他们根据其阶级和党派的不同而各自拥有符合标准的观点、偏见和情感。由此最终可能产生一个理智的、易于操纵的礼仪社会,这种社会今后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对无数人有吸引力的大众文化。我们不应该忘记,世界上最伟大的著作现在正以低廉的价格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文明国家现代生活中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知识、信息和各种轻松读物的广泛传播虽然能为人类带来新的乐趣,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智力的总体水平,但它破坏了产生人类思想杰作所必需的个人压力和勤思苦学等条件。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强制性地推行极端的群体意识,他们似乎不但失去了伟大人物的引导,甚至同时失去了这一行为过程本身应有的经济活力,这真是奇怪。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世界大同;个人的作用是功能性的,只有群体才有意义;只有统治者所规定和宣传的思想才被认为是高尚的思想,谁都不能自认为是有自主的、独特的、不朽的灵魂;谁都不能认为自己是灵和肉的和谐的统一体。摆在那千百万人面前的是非人的目标和理想。这种社会像蜂巢吗?不!因为那里没有蜂皇,也没有蜂蜜——至少没有可供他人分享的蜂蜜。苏俄的社会其实是模仿蚂蚁的结果,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每一条社会和经济原则及哲学思想,白蚁早已在100万年前实践过、丰富过、实现过。

但人类的本性远比蚁类的本性难以驾驭。人类本性的多变性使能够控制白蚁的法则和力量在人类社会无法顺利运转。人类易于领导而难以驾驭,这是人类的自我保障,也是人类的伟大之所在。布尔什维克人企图用独裁和恐怖手段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群体生活和集体主义,这不仅使个人丧失了个性,也使生活集体化和工业国家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没有多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倒是有不少我们应该避免的教训。

当然,群体效应及其反应在先进国家中的表现远胜于在落后国家中的表现。较之贫穷、弱小、封闭的社会,大不列颠王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中,个人作用的衰落更明显。这些被解放了的伟大的民族似乎已不再需要著名的向导和保护者;他们已不再像过去或现在的某些不发达民族那样依赖英雄、首领和导师了。他们盲目而又坚定地迈向令人神往的含糊目标。文明和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不再需要个人的引导了吗?它们能自我发展并找到正确的道路吗?它们是否已走错了方向、偏离了正轨?它们是否已放弃了通向光荣和生存的崎岖小路?在先进

的民主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只是对过去积累下来的智慧和财富的挥霍和铺张？我们是否只不过像一大群狂吞乱噬的飞蝗，成群结队、跌跌撞撞地盲目地拥向大海或某个巨大的虚妄的焚化炉？我们难道已经到达了高度发达阶段，无论贤者愚者都能认清指路明灯了吗？探索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不少时间。

现代战争最能体现群体效应的趋势及其对个人的抑制。在刚刚过去的大战中，个人对战争的引导几乎被彻底排除。这场战争是规模最大、时间最近的一次战争，也是最残酷、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结束后我们仔细搜寻战争中的罪人和英雄，可是人在哪里？谁是挑起战争的魔鬼？谁是结束战争的英雄？我们拥有数不清的事实、不断增加的文献资料、大批目击证人，同时我们也拥有前无古人的收集和分析证据的方法；我们在苦苦探求；我们应该知道、也很想知道答案。我们的伤口依然隐隐作痛；我们受到的伤害依然使我们义愤填膺；我们的冲天干劲使我们吃惊；我们知道自己的权威；我们要求了解真相、明确责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绞索和桂冠。

可是答案呢？没有答案。一方面，对某人、某政府或某民族的指控犹豫不定，越来越糊涂；另一方面，声称自己赢得了战争的个人、政府和民族越来越多，他们的自我吹嘘之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刺耳，使我们越来越无法信服。我们曾满怀信心求助过的缪斯女神已经变成了斯芬克斯，她那战伤累累的石头脸上露出了悲哀的嘲笑。面对这一切我们感到我们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绞索已风化，桂冠也褪去了颜色。在这场最可怕的人间争斗中，发动战争、赢得战争似乎都是人类的合作行动。

我们的时代不是产生英雄或超凡人物的时代。总的来说，我们处在一个艰难时代。过去几百年里，长袍、假发、仪式和分数一直为公众人物和官吏提供保护，而现在它们被各国弃如敝

屣；除了在纯粹的官方场合，国王的神威也无人理会。现在，人们仰慕君主只是因为他们举止大度、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不尚繁文缛节。重任在身的部长或总领大局的公司总裁虽然日理万机地处理各种重大事件，但他们已不再是神秘的、令人敬畏的人物；恰恰相反，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这么想——他们也是常人，只不过碰巧被暂时委以重任；他们穿梭在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中或穿上高尔夫球裤排队等候，轮到他时打上一球。这一切十分明快，令人耳目一新，与从前那些头戴假发、装腔作势的可笑的贵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从这种纯朴的风气和心态中能产生重任在身的使命感吗？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国家大事能够离得开那些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吗？

战争的强光比和平的柔辉更能照亮这个话题。现在战争中的强大力量使指挥者失去了英雄本色。汉尼拔、恺撒、德蒂雷纳、马尔巴罗、弗雷德里克、拿破仑之类的英雄不可能再立马沙场、叱咤风云了，他们的名声和他们的巡察再也不会使士兵振奋；他们不会再与士兵一起共闯枪林弹雨、鼓舞军队士气了，他们根本就不会露面，他们已带着盔甲和红缨从战场上消失了。威镇敌胆、决定战局、翻云覆雨的旧式豪杰不见了；今日的将领远离战场，坐在办公室里紧守着电话，就像是股市动荡时持有大量股票的观望者。

这一切没有丝毫差错。将领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还能到哪儿去呢？血红的墨迹记下了铁路不通、设备耗尽、河堤决口、财物遭劫等等，等等。将军不动声色，他是高尚的看客。他精通金融，经历过无数次市场崩溃。他后备资源充足，调剂方便，他在等待战机，伺机发动进攻。他深谋远虑，能守善攻，摸透了熊市和牛市的脾气。他果断发令：这股卖掉 5000，那股吃进

10 000。好！不妙，这步棋错一着。不过，他买卖的不是股票，而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如果你看他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样子，绝对不会相信他正指挥着比拿破仑军队强大百倍的千军万马。如果他能把工作处理好，号令无误、调兵遣将适当，那么他应该受到褒扬，但我们很难把他看成英雄。不，他决不是英雄，只是个股票交易所的经理。

战争中个人因素的消失，高级指挥人员不能亲见战场，高级的指挥职能被贬谪为纯粹的文案工作，这一切对人们的情绪和看法有深刻的影响。过去的将帅被理所当然地尊奉为天才，他们果敢坚定、具有逢凶化吉的神奇本领和振奋人心的本质魅力；他们能征服凶险，别人不能望其项背；他们到处征战，在血与火中拼杀；他们是救国英雄。然而，他们的这种功名却不会落在那些守着电话策划战局的朋友身上，这似乎不合情理，也很不公平；这种人当然会被当成优秀的公民和尽心尽职的公务员来奖赏，但他们不会被当作英雄。现代战争中的英雄横卧在弹痕累累的战场，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他们人数太多，无法得到特别的荣誉。现代战争是大众的苦难、大众的牺牲、大众的胜利。血肉横飞的沙场上的光环消退了，胜利的光辉再不会闪烁于将帅的盔甲；仅有的一丝光亮是阴雨中的惨淡暮色，炮队长龙在暮色中狂吐火舌，千万个士兵踏着泥泞、迎着毒气在走向死亡。

这就是最近的战争。将来的战争更与浪漫和壮观无缘。未来的战争不再是军队的战争而是全民战争，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军人和平民，都将同样受害于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在这种战争中将帅们无荣耀可言。去年春天，我的园丁消灭了7只蜂窝。他选用了适当的杀虫剂，算好用量后于适当的时间偷偷地放在适当的地点。他做得干净利索，所有马蜂无一漏网，没有一只马蜂螫到他。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他虽然做得很好但我不会认为

他是英雄。

如果将来某位“铜盔大将”按下按钮或在某张纸片上工整地签上名就毁灭了伦敦或巴黎,夷平了东京或旧金山,那么他必须熬过漫长的岁月才能得来名声和荣誉。国家宣传部摄影师带来的水银灯只给他部分补偿。不过我们的统帅仍可能是个孜孜不倦、严谨周密的典范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只不过是其他人在特定环境下也能做到的。他不大可能得不到前人曾经获得过的与其职务及其胜利相关的荣耀。但这只是现代生活和现代科学造成的群体效应,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照这样下去人类就有了福音。战争将变得可恶,军事首领也不再是声名显赫的浪漫人物;军队将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诗人和雕塑家也不会再为征服者的业绩树碑立传;化学家很可能会独揽大功;未来的拿破仑将挺进商界;世界文明将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我们无须把眼泪浪费在战争上,让我们回到和平中去吧!

现代社会离得开伟人吗?人们会放弃英雄崇拜吗?他们能齐心协力创造更伟大的智慧、培养更高尚的情操、做出比提坦^①更有力的行动吗?各民族能团结起来创造出健康的大同世界吗?在这里最耀眼的明星是电影明星,诸神都被请进了美术馆。人类的灵魂能释放出比机械之火更璀璨的火花吗?我们的后人能够通过“多数人共识”、政治团体、代表大会的形式成功地解决新问题吗?人类在前进途中会不会遇到巨大障碍或走入迷途呢?果真如此,难道就不会再出现众望所归的个人领袖了吗?

我们的周围已经出现了骚动。“只要法令不要人”的口号已

^① 提坦,又译为泰坦,希腊神话中的众巨神之一,为天神乌刺诺斯和大地女神该亚之子。

不再能赢得普遍的同情。人们觉得空虚、迷惘、若有所失；我们怀念巨人，对巨人时代的消失感到不安。人类的智力发展和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了，我们已迈上了更高的层次。然而，现在的万丈高峰并不起眼，因为奇峰甚多，我们无心顾及。整个地区虽生机盎然，但其风景平淡。我们哀叹艰难的攀升途中见过的奇丽雄峰。啊！我们多么渴望云间能突现威震高原的雄峰，犹如过去那些俯视平原泽地的高山。我们希望能仰见君临天下、耸入云霄的高峰，山间应有鸣涧如雷。可惜，民主的高原上不见此物。不过如果把探照灯聚焦于烟云之柱，再把高音喇叭用起来，也许可以造出巍巍大山的样子，但我们很快就会看透其虚伪。

凡事有得必有失。高原之上无伟峰，我们必须泰然处之。当然，如果我们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回到平原和山谷之中重新攀爬。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平地上徘徊漫步、跌打滚爬。很多强大的民族仍然生活在那些平原上；有的民族对此很满足，有的民族甚至很自豪。他们常说山谷间的生活更美好，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更雅致、更高尚，较之高原荒漠上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更健康、更富活力；他们认为不高不低的环境更适合人类的天性：这里艺术繁荣，科学也并不缺乏；更令人愉快的是从此地可以回望我们走过的平原和沼泽，记住过去的伟大岁月留下的传统。他们所崇拜的“元首”屹立在夕阳余辉下，身后投下壮观辉煌的身影，他们指着这块阴郁的巨石问，你们有这样的东西吗？我们当然没有。

五十年展望

整日为生计奔波劳碌的芸芸众生对人类发展的速度只是略有所知。回首百年我们会看到巨大的变化；回首过去的 50 年我们会发现变化的速度在加快。在物质生活、科学应用、政治体制、风俗习惯等方面在本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变化最大、也最不容易察觉。这种变化即文明国家中大量的人能够享受更丰富的人生。19 世纪初，迪斯累里说：“过去，英格兰属于少数人和极少数人。”拜伦则写道：“世界是为其中的 4 000 人创造的。”而今，对于千百万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宽广、更安全、更丰富多彩、更充满希望了。在美国，几千万人已无需再为基本的生活所需发愁了，他们有了更高的文化追求。欧洲虽饱受战乱之害但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我们对现代生活中的各种便利和条件不以为然，但一旦被剥夺了这些东西我们就难以生存。我们总认为进步是永恒的。威尔士先生借其书中人物之口说：“这种进步永远向前。它能够永远向前真是奇妙。”能够进步也是人类之幸。如果进步停止或出现倒退，那必将产生难以想象的灾难。人类已走得太远，无法回头，已跑得太快，无法止步了。现在有很多人依赖一个世纪以前还未听说过的方式维持享受和生存，只要进步稍停——更不用说倒退了——我们就无法避免骇人听闻的灾难。

当我们沿着历史长河回首百年时，我们立刻就会明白为什

么我们的时代与人类纪年中的任何时代都不同。人类有时进步,有时倒退,有时甚至几百年停滞不前。几千年来,印度和中国就一直止步不前。是什么使人类以如此新奇的速度前进的呢?是科学。过去,人类的前锋往往受尽摧残,在孤寂中死去;而今,他们组成了一支团结一心的大军,正迈向无比远大的目标。这是一支充满骄傲、雄心勃勃的大军,它无视一切人为的律令、无视最古老的风俗,也全然不顾弥足珍贵的信念和最为基本的天性。正是这种叫做科学的神奇力量攫住了我们的心,把我们征入它的部队,派我们为它劈山开道,铸枪造炮;它给我们的服务付出报酬,我们受伤时它使我们痊愈,它使我们少有所教、老有所养。两三代以前的人从未有过如此待遇。

在远古时代,人类离群索居,难怪他们躲避邻居就像逃避同在森林中的吃人野兽一样。家畜出现后,互助合作和劳动分工的优势显露了出来。到了新石器时代,谷物被培植出来,农业发展了,在当时青黄不接的饥荒年月里,播下的种子中就出现了某种资本主义的萌芽。承认土地所有者的特殊权利在我们今天的立法中仍留有痕迹。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新的法律、社会和道德问题。历史的进步非常缓慢,常常会出现上千年的停滞不前。

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中的两个国家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文明。他们的专制秩序建立在对水源和粮食的控制之上。在苏维埃俄国出现之前,这两个国家统治者用以控制人民的专制手段是无人能比的。他们只需切断水源或限制运河中的水量即可饿死或征服叛乱省份。且不算他们对粮仓的控制,他们掌握了水源也就有了难以对抗的力量,这与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控制所有食品的配给具有同样的威力。这些国家没有内忧,他们只怕外患。然而,在这两个国度中的人尚未学会如何催化自然的力量,他们的国力仅是其国民体力的总和。后来的帝国此

兴彼亡,虽不失其辉煌但远不稳定。在生产手段和通讯手段、获取食物和物资交换等方面,从尔贡^① 王朝到路易十四^② 时代的变化远不及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今天的变化。大流士^③ 把一封信从苏萨^④ 送到萨迪斯^⑤ 很可能要比菲利浦二世^⑥ 把命令从马德里传到布鲁塞尔还要快。1841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奉诏从罗马赶赴伦敦组建政府,他花在路上的时间足够韦斯巴大帝^⑦ 从罗马赶到其不列颠省。米努斯^⑧ 王宫里的浴室远胜于凡尔赛宫的浴室。底比斯虽然已经消失2000多年,但底比斯的牧师如果来到特伦特委员会^⑨ 很可能要比艾萨克·牛顿爵士坐在现代大学生物理俱乐部内更舒适。上一个世纪发生的巨变突如其来,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已经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衡量未来了。

丁尼生在《洛克斯利之府》一诗里作出了最美妙的预言。他写道:

我深入未来,极目远眺,
看到世界的幻景,和未来的奇观。
看到空中贸易繁荣,群帆竞秀,
昏暗紫光中的导航员,抛下代价昂贵的火球。

-
- ① 尔贡:亚述国王,公元前722—705年在位。
②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1643—1715年在位。
③ 大流士:古波斯王,约生于公元前558年。
④ 苏萨:埃兰古城,波斯帝国首都,位于伊朗西部,现仅存遗址。
⑤ 萨迪斯:小亚细亚西部一古城。
⑥ 菲利浦二世:西班牙国王,于1556—1598年在位。
⑦ 韦斯巴大帝:罗马皇帝,于69—79年在位。
⑧ 米努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死后为冥王。
⑨ 特伦特委员会:16世纪成立于意大利特伦特的天主教委员会。

只听天上爆响，落下恐怖之露，
两国的空中舰队搏杀在蓝色的苍穹。
随着吹遍世界的南风，
带着国人的信念冲进暴虐的天空。

在世界联盟，人类议院，
战鼓声停，战旗偃卷。

……

像雄狮步步逼近，饥饿的民族，
紧盯着打盹人紧挨将熄的篝火。

写于80年前的这些预言已得到验证。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诗人准确地预测了航空用于商业和战争、国际联盟、共产主义运动等，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成为载入史册的事实！即使在《圣经》中我们也难以找到如此精确、如此灵验的预言；耶利米和以赛亚所讲的关于遥远将来的故事很隐晦，在不同时代可作不同的解释。《圣经》说将来会出现一个审判官、一个预言家、一个拯救者，他会拯救其选民；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仍然在争执不休，他们要问：“您是否就是救世主？我们是否要另觅他人？”^①然而，《洛克斯利之府》准确地预言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许多与

^① 《旧约》中预言，上帝将派人来拯救人类。《新约》中的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自己就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耶稣得到信徒的承认后便出现了基督教的繁荣，但犹太人不相信耶稣，也不承认《新约》，他们仍然在等待上帝派来真正的救世主。

诗人相识的人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件！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打开了人类的新纪元；丁尼生的天才则穿透了未来的面纱。

我们在作出预言时有意无意地会采用两种方法。我们在历史中找寻到与当今的情形极为相似的某一时期，并假定，其后发生的情况会在今天重演，除了某些细微的变化之外；其次，我们可以概括前一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并假设这一趋势会延续到将来。第一种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擅长；第二种则为科学家们所惯用。现在我们所能使用的只有第二种方法，并且局限在部分领域内。通过观察科学在现代所取得的成就和科学所拥有的知识和力量，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测什么样的发明和发现将主宰我们的未来。但我们只能猜测这些发现及其应用会给人类的习惯、观念和精神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过去人类所能引导和控制的最强大的力量只是一列马队或一船奴隶；当然，如果加以足够的训练和控制，人类也许可以引导一大群像埃及的以色列人那样的劳工。如今，人类站在战舰的甲板上就可以控制成千上万人的力量；只需一个手指头即可引爆的水雷可以在刹那间毁掉上万人积年的劳动成果。这些变化是由于分子能量取代了肌肉能量，而且人还造出了复杂的、完美的装置来控制 and 引导分子能。由于只需一个人即可控制这种新能源，因此这让新式采矿和冶金、新的运输方式和难以想象的机器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新事物反过来又会提高分子能量的利用效率、扩大其应用范围，而且还促进了对老方法的改进。因此尼拉加拉上万瓦的发电机取代了我们祖辈所使用的水磨。每一项新发明都会对其他发明产生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在不断加快，把当代文明与过去的文明截然分开。

毫无疑问,这种进化速度将越来越快。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今后 50 年里的科学成就将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大、更快、更奇。滑座车床使我们能造出精密机器,蒸汽的威力充满了整个世界。现在,蒸汽的云天外又出现了耀眼的电力之光。然而,这仅仅是开端。专家告诉我们,比我们所知的能量更加重要的新能源肯定会被发现。原子能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分子能绝对无法比拟的;一人一天的挖煤量可轻而易举地完成超过挖煤工人工作量 500 倍的工作,而原子能则会比煤的能量更强大百万倍。如果一磅水中的氢能化合成氢,那么它足够驱动一台 1000 马力的机器整整一年。如果电子——那是原子系统中的小行星——能与氢原子核化合,它所能释放出的马力还要强大 120 倍。科学家毫不怀疑这种能源的存在,现在所缺乏的只是点燃篝火火种或引爆炸药的引信。科学家正在寻找这种东西。

这种能源的发现和控制在人类将产生的影响是 100 多年前蒸汽机的发明所无法比拟的。规模宏大的计划将有实现的希望;地理和气候将听从我们的号令。如以上述方法使用 50 000 吨水,那么它足以把爱尔兰移到大西洋中部;埃普索姆赛马场上一年内的降雨足以消融极地冰川。通过温度和压力把一种元素转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可能性将大大超过我们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它将使我们的价值标准改变得面目全非。比我们现有最好的钢材还要牢固 30 倍的材料将造出能够控制新能源的机器。如果我们能够造出重仅 20 磅却有 600 马力的机器,能够在钢笔大小的油箱中贮存可用上千小时的燃料——这在原理上是可能的,那么海陆空交通运输方式将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根据现在的发展趋势,无线电话和电视将能使拥有者与任何有相同装置的房间连通,使他们互相能听见自己的谈话,就像把头探进窗口说话一般方便。人类将过分集中在城市之中;除了最亲密的

朋友外,人无需亲自造访其他任何人,即使要出门也会有十分快捷便利的交通手段。将来,同居一城的人就像同住一屋,城市和乡村毫无差别,每一户人家都会有自己的花园和草地。

直到最近,人类最基本的战争是粮食生产,现在这场战斗已打赢了。毫无疑问,文明的民族能够生产出其所需的所有食品。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之一是白种人生产的小麦已大大超过了自身的需求,而黄种人、棕色种人和黑种人尚不了解也无力购买这种比稻米更优秀的食物。但现在的食品几乎全部来自太阳能;太阳辐射把空气中的碳酸转变成碳水化合物,为我们提供植物和蔬菜。我们用这种潜在的化学能量保持体温并把它转化为肌肉力量;通过繁杂的消化过程,我们用它来修复和替换体内的细胞。当然许多人喜欢吃那些素食者所说的“第二态”食品,即通过家畜把素食消化转变成肉类,然而这一过程将浪费太阳能的百分之九十九。

即使没有新式能源,在食物生产上取得进步也是可能的。微生物可以把空气中的氮转变成动物赖以生存的蛋白质,我们可以像利用酵母一样在一定的环境下培育微生物。新的微生物种能够用来为我们完成大量的化学反应过程。只要我们掌握了有关荷尔蒙的知识,控制生长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吃鸡脯或鸡翅,我们不必养一只整鸡,这样做太荒唐,我们只需在适当的介质中把我们想要的部分分别培养出来就行了。合成食物在将来当然也是可行的。我们无需为此牺牲吃饭的乐趣;将来不会到处充斥着阴暗的乌托邦中所描写的那种药片式食品。新式食品从一开始就将几乎无异于自然食品,两者的替代过程将是缓慢的,甚至难以察觉。

强大的新能源出现后,食物生产将不必求助于阳光;能释放出人工辐射的巨大地窖将取代世界上的玉米田和土豆地;现在

的耕地和牧场将变成公园和园林。这一时刻到来之时城市将重新拥有大量的扩展空间。

人类的繁衍和人类的本性方面也有惊人的发展潜力。过去人们说“你可以教狗学花样但变不了狗种”，这句话已过时了。几年前上演过一出戏，叫《罗塞姆的万用机器人》，伦敦为之轰动。50年内很可能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生灵；他们不是被制造出来而是在玻璃罩下自己长出来的。在人工环境中实现婴儿从孕育到出生的全过程似乎不成问题。在这种生灵智力发育的早期，专家的引导和处理等干预手段可造就出从事思考或劳作的专业生灵。人类几乎具备了造物的本领，差不多能造出健壮无比并且在某些特殊方面具有特殊智力天赋的生灵来。人类可以造出能够操作机器但别无他求的生灵来。这种可怕的可能性使我们心悸；基督教文明的法则将阻止这种可能的实现。然而，这种头脑单一的生灵难道不符合苏俄的共产主义信条吗？苏联的大目标是制造出能胜任各种机械劳动而且没有思想、只知道听命于共产主义国家的人，科学发达的苏联难道不会认为这类生灵正符合其大目标吗？人的本性坚韧不屈，它能在最黑暗的地方放出天才的火花；但机器人却可为共产主义理论而制作，共产主义者的哲学中没有任何信条会妨碍这种生灵的产生。

对这一问题我只是稍作了一点探讨。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孩子将来会看到，人类的力量将掌握在与现今人类之本性截然不同的人的手中。将来的炸药、能量、材料和机械可以把各国一个个地毁灭。专制和暴虐将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决定其臣民的生活和愿望。如果这种可怕的力量再加上非人的邪恶，谁敢说世界不会被毁灭？谁敢说这个世界不应该被毁灭呢？未来将是恶梦一场。如果地球能撞上某颗星球，使地球化为炽热的蒸汽，

那将是人类之幸。

这些可怕的巨大发现将使议会政体堕落到可笑的地步。在社会的巨变中,众人通过投票选举能决定正确的方向吗?即使在今天,各国的议会在处理各自的经济问题时都感到力不从心。在这些问题面前,报纸上的那些大吹大擂的噱头显得空洞无力。在前进途中,民主一直是不称职的向导。在普选中,各个现代大国的立法团体根本不能代表社会中力量和智慧的一角;这些大国的领导者并非其国内最有才华、最熟悉其本职工作的人,他们甚至缺乏坚定的信念。民主政府随波逐流、目光短浅、唯唯诺诺,总是以花言巧语和陈词滥调作铺路石。他们的工作前后脱节、缺乏计划,然而一场巨变正迎着他们走来,这场变革不仅会打破世界经济格局,而且必将改变社会生活习惯以及每一个家庭的道德观。只有共产主义分子拥有对将来的计划和福音,然而他们的计划将毁灭个人自由,他们的福音根植于仇恨之上。

人类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积累知识和力量,这是肯定的,但人类的美德和智慧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提高。现代人类的大脑与几百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人类的本性从那时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化。在足够的压力下——如饥饿、恐惧、战争或理智的狂热,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男性会做出最可怕的事来,而且他们会得到现代女性的支持。现在,不同时代的文明和平共处,各个文明的代表人物相聚而谈;带着 20 世纪思想的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与早在几千年前其文明就已形成的印度人或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人类的力量和武器的壮大大超过了其智力的进步;其智力的进步则又比其高尚情操的发展快了许多。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强大而缺乏怜悯的文明”。

因此,在势不可挡的科学进化过程中,人类和各个国家能否保持道德观念和精神追求是最为重要的。使物质进步和科学发现暂时停止要比受机器和物质力量的奴役好得多。目前尚有许多人类无法了解的秘密,这些秘密一旦被揭示出来将对人类的福祉和人类的光荣产生致命的影响。但忙碌的科学家们已手拿钥匙在摸索打开禁地之门。如果宽容、怜悯、和平和博爱不能得到同步发展,那么科学会毁掉一切使人类生活能够变得崇高和可以忍受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哪个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让善良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有力地表现出来。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鄙视尘世间的力量和成就,更加保持人类永生的愿望。

物质进步是值得赞赏的,但它并不能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前两天我读了一本关于人类历史的书,这本书从太阳系的诞生一直讲到其灭亡。先后生活在太阳系的人类有十五六种,每种人类生活的时间跨度有上千万年。最后终于有一种生灵得到充分进化,征服了自然;他们创造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度里的国民可以自己选择生活多长时间,可以享受无穷无尽的乐趣,可以在星际遨游,可以看到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但这一切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人类自从有了理智就一直在问自己,“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上?生活目的何在?何处是我们的归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吗?物质进步无论是以多么难以想象的方式出现,也无论它能使人类的才能扩展到何种地步,它决不会给人类的灵魂带来安慰,这个事实是科学所难以解释的,我们因此可以满怀希望:未来是美好的。我们的子孙将忘情于我们的先辈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业,他们将控制毁灭性的巨大力量,他们将有享受不尽的各种舒适便利的条件和乐趣。但如果他们不能看透物质的东西,他们仍会觉得心痛、仍会觉得

生活贫乏。伴随着希望和力量而来的是很多危险,这些危险与人的智力发展、人格力量是极不相称的,远远超过了人类的社会机构所能控制的范围。人类又一次面临着在赐福和诅咒之间作出选择,人类到底何去何从也更难预料。

摩西：一个民族的领袖

以色列中再没有能与摩西相比的先知，他是耶和華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華打发他在埃及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及他的全部领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这几句话是《申命记》^①的结束语，恰当地表现了希伯来人对他们的民族领袖和民族解放者的敬仰。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他与以色列人的上帝亲自谈过话；他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带领上帝的选民^②穿越荒野，逃出了囚笼之地^③，把他们领到了福地^④；他是最高立法者，他接受了上帝的指令，为民族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生活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在传统上摩西被认为是《申命记》的作者，围绕着摩西之死的种种神秘现象也使他更引人注目。

我们还是先转述《圣经》中的故事吧。

约瑟夫统治埃及的时代过去了。又过了一个世纪后，一个

① 《申命记》：《圣经》中的一章。

② 以色列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

③ 囚笼之地：指埃及。

④ 福地：上帝答应给亚伯拉罕及其后代的土地，即迦南。

新的法老即位，他不知道约瑟夫。在大饥荒前的凋零岁月里，游牧的贝都因人部落流落到肥沃的尼罗河边，子孙繁衍，生生不息。当年的这群陌生人受到了富裕强大的埃及王国的友善接待，但后来成为社会和政治上的包袱。当时他们生活在歌珊地，人丁兴旺，日渐富裕，他们的手触及埃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当年某时肯定出现过现代社会所熟悉的那种运动，反犹太主义情绪席卷全国。年复一年，以色列的后代在埃及的国家政策压制和国民的歧视下，渐渐地由客人沦落为仆人，又由仆人几乎沦落为奴隶。

当时的埃及大兴土木，以色列人身强力壮，是心灵手巧、勤勉肯干的建筑者；他们被迫为法老建粮库和军械库。《出埃及记》^①中提到过两座这样的城市：毕东姆和拉姆塞。埃及考古学家那维尔已发掘出古城毕东姆，此城位于当年以色列人的定居地歌珊地，位于东北边境，确实是建于拉姆塞王朝时期。尼罗河变幻莫测，只有在丰收年景中大批屯粮方保无虞。占有谷物是政府的力量所在。在灾荒之年，法老把手中的粮食分给人畜，换来他们绝对的臣服。通过这种强硬手段，埃及文明发达起来。我们可以想见，埃及政府正是利用以色列人作为国家奴隶建造了储粮城，政府才得以保持百姓的驯服和国家的安全。

以色列人踏实肯干，他们对得起法老给他们的口粮，然而他们繁衍不息使埃及人不安。粮食储备是有限的，不久劳动力就出现了过剩。埃及政府利用节制生育的手段。《出埃及记》中明确记载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其中之一是逮捕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男性，最后埃及人决心杀死所有以色列男婴。显然，此时犹太人的生活信条和埃及文明的强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就在

① 《出埃及记》：《圣经》中的一章。

此时,摩西诞生了。

当时的法律很严厉。尽管法律无情,但这个婴儿的母亲太爱这个孩子了,于是她决心与法律周旋。她好不容易把孩子藏了3个月,这时,为后代求生的强烈愿望使她采取了一个大胆的策略。这个故事与许多有关伟人的古代传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著名的苏美尔国王萨尔贡就是被自己的母亲丢在草筐里,由一位农民拣来养大的;罗穆卢斯与居鲁士的幼年经历也有类似故事。在摩西所处情形中,这个孩子唯一的求生希望是把他放在王室。法老的女儿习惯在尼罗河里洗浴,于是摩西的母亲仔细研究了公主行踪的规律。一天早上,公主来到尼罗河边洗浴时,一只小草船很醒目地漂向公主,仆役过去把小船拿过来,只见漂过来的小摇篮里有一个可爱的婴儿……“孩子在哭呢!”公主的心软了,把孩子抱到怀里,发誓只要其父王统治着尼罗河,这个孩子就不会受苦。事先被有意派到附近的小摩西的姐姐这时走了过来,对公主说,“我知道哪里能找到奶妈。”于是他们找到了摩西的母亲。他们在庞大的王宫里找到了一个小地方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

斗转星移,孩子长成了大人。他在王宫里长大,所以他无疑被当作和许多东方君王的私生子和庶出后裔一样看待;但他不是埃及人,不是尼罗河谷的统治家族的子孙。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沙漠之血、以色列之血,而不是赫梯人的血。他走出王宫,了解了当时发生的事;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民族受到极不公正的压榨,他发现他们是埃及人的苦役。他们以其强健的生命力支撑着埃及的辉煌,但埃及人却不愿付给他们辛劳所得。他们是自由的荒漠之子,一直勤勤恳恳;他们开始时是尊贵的客人,但现在却被当作是一群奴隶。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殴打一个以色列人,这在当时无疑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他知道

自己站在哪一边，他从来没有犹豫过，于是埃及王室的恩惠和与统治者结成关系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一时从他的头脑中消失了；血缘的呼唤在他的胸中回荡。在反抗者的高声欢呼中他杀了那个埃及人。

死尸难以藏匿；消息更难保密。不久，宫廷上下都传遍了；这位承受了王恩的傲然不驯的外来客恩将仇报，反咬了主人一口。我们很容易想见当时埃及人的情绪。即使是当今最开化、最文明的国家和政府也会与法老有同感：这事做得太过分了。文明社会总会有公众舆论的，当时埃及的公众舆论很可能抓住这起暴力事件不放，认为这足以证明政府对这些傲慢的陌生侵入者的心慈手软应该结束了。于是法老采取了行动——应该说法老之名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一样可敬。法老下令处死凶手。我们不能指责法老，也不能责怪杀人者此后的所作所为。他逃跑了，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现代思维方式。

当时，在饥荒的汪洋大海中有座文明小岛，尼罗河的洪水和尼罗河的泥沙带来的农业体系把小岛上的人凝聚在一起。在这块小岛之外；能够糊口的人十分稀少。在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特和迈锡尼都有类似的岛屿。但对当时的摩西来说，只有埃及和荒漠可供选择；选择前者很快就会被处死，选择后者则生存希望渺茫。

摩西逃到西奈半岛，这里有人类难以生存的严酷的沙漠。很多地方——如无垠的撒哈拉沙漠和冰原极地——人类是无法生存的，但西奈半岛上却一直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一些顽强的人。现在当地生活着几百名贝都因人，不过，如果有飞机迫降在西奈半岛的话，飞行员几乎无一例外地不是渴死就是饿死。在严酷的沙漠深处，逃亡的摩西找到了当地的首领叶忒罗祭司。摩西

在祭司家住了下来，竭诚为他效力并娶了他的女儿西坡拉为妻。摩西在此一直隐居了许多年。先知必是来自文明社会，而且每一个先知都须走进荒野；先知必须对复杂的社会和社会功能有清楚的了解，然后他必须过上一段隐居静思的生活，这是积聚心理能量的过程。

摩西观察着骨瘦如柴的牲畜和枯槁欲焦的植物，他也过着与此相差无几的物质生活。他与自己交心。有一天，烈日当头，风沙狂舞，海市蜃楼若隐若现，这时他看到了火荆棘。荆棘在燃烧，但却未被烧毁；它是个奇迹，越烧越茂盛，似乎是在燃烧中获得新生；也许它并不是荆棘，但摩西的心已被点燃，腾起了永不宁息的烈焰。

上帝从火荆棘中对摩西说：“你不能把同胞丢在囚笼里。不自由毋宁死！荒漠胜于受奴役。你必须回去把他们领出来，让他们来这荆棘丛中生活，不生则死，但决不要再让他们被束缚在囚笼之地。”上帝说了很多话，上帝从火荆棘中说话，现在火荆棘就在摩西的胸中燃烧，上帝说：“我要赋予你超人的神力。人只要下定决心就无所不能。人是宇宙之代表。人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一切运动和存在都源于人的无敌意志。”

这些话中的绝大多数摩西都听不懂，他问了很多问题并要求上帝给予各种各样的保证。实际上摩西将信将疑，讨价还价，做得过分了，所以《圣经》说耶和華（这是在火荆棘中说话的上帝之新名）十分生气。不过最终上帝还是和人立下了契约，摩西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保证，自信能够创造奇迹：如果他把牧杖放在地上，他肯定牧杖会变成蛇；如果把它拣起来则又是一根牧杖。此外，他讲定了要有一位代言人，他自己拙于言辞；他可以给予驱动力量，但他必须有一位能言善辩、善于处理重大事件的助手，否则他如何去与法老及其臣子们谈判呢？上帝满足了他的

所有要求，给了他一位名叫亚伦^①的能说会道的理政能手；这时摩西想起了自己的同胞中就有了一个亚伦，他逃出埃及前与亚伦的关系很好，于是行动吧！叶忒罗得知自己的女婿想干一番大事，他完全赞成。摩西为驴子备上鞍，把西坡拉和两个孩子及家中财物放在驴背上，于是这一支历史上最小、最强大、最光荣的救援队伍迎着大漠烟尘、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踏上了征程。

有关摩西和法老之间的无数争斗有很多记载。埃及人所经历的磨难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大多数灾难都是埃及人经常遇到的，尼罗河的污染和由此导致的鱼类死亡；青蛙繁殖太快及其对土地的侵害；难以容忍的苍蝇；无处不在的飞蝗（不过也有专家说是蚊子）；牲畜的死亡；诸如由于长时间沙暴引起的天昏地暗；尼罗河谷所罕见的冰雹；最后还有所有头生子的死亡。当地的魔术师也全力投入这场斗法，你来我往地坚持到第三场，等到尘土变成飞蝗时他们诚惶诚恐地承认这是“上帝的神力”。

法老的行为很有意思，虽然相隔千年，但我们觉得法老的行为很现代。起初他很好奇，愿意相信一切；很轻微的灾难给他带来了理智，他打算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荒漠中去，还准备向以色列人的上帝献祭，但这一让步中止了他的建设规划，并打乱了国家的经济生活。这就像是一场全国大罢工，毫无疑问，肯定有人对他说，这种停工给国民收入带来的损害，对国家来说是场灾难。于是他铁了心，当晚就收回了早上作出的承诺。灾难依然继续，但魔术师退出了斗法场。这场斗法是耶和华与法老之间的殊死较量，但耶和华不想很轻松地取胜。解放以色列人的后裔只是其宏大目标的一部分，以色列人的解放必须使其确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他们虔诚不二，那么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

^① 亚伦是摩西的胞兄。

就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于是,耶和华一方面施灾惩戒,一方面又使法老更加铁石心肠。

这样的事在后世经常发生,许多国家和民族在冲突开始时极不情愿介入,因为他们害怕开头的一些小事;一旦卷入冲突又会投入庞大的资源和力量,希望最终赢得胜利。因此,法老和埃及政府进入这场较量之中后,立刻进入状态并决心坚持到底;这也许就是使埃及人“铁石心肠”的原因。但是,灾难接踵而至,不断落到痛苦的埃及人的头上,最后埃及顶不住了,法老决定“放人”。

在埃及人投降后的一片混乱中,选民们洗劫了埃及。他们或要,或借,或偷,把一切能拿的东西都掳到手;他们集合起来,带着财宝、器械和粮草,从文明之地出发走向可怕的沙漠。他们的最佳道路是跨过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峡,前往现在的巴勒斯坦。但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与此不利;其一,非利士人拦住了去路,这个强悍的民族已拥有高度发达的军事组织,在埃及被奴役了150多年的以色列人无力与这些凶猛的武士较量;其二,耶和华吩咐过摩西,要他把被解救出来的以色列人领到西奈山附近,他要在那儿向以色列人显示神的意志。

他们根据上帝的旨意向红海的北海湾进发。在有关以色列人人数的问题上有很多争议。《圣经》说他们有60万男子,此外还有妇女和孩子。我们怀疑这个数字,这丝毫不能说我们对《圣经》不敬。教士摹经时很容易发生讹错;即使在今日,一两个小数点放错位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从那时起还要再过2000年人类才会知道如何用小数点,早期的算法比现在的算法更容易出错。除非当时的气候与现在截然不同,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大规模有序的支持,即使6000人生活在西奈半岛上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但法老此时又变了主意。毫无疑问，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抢掠行为义愤填膺，埃及政府对一下子失去了众多的劳力和臣民也很后悔，这种局势要放在当今，没有哪国的议会会对此无动于衷。埃及的军队被调动起来了，战车全部出动，大肆追捕。逃亡的以色列人走到阿卡巴海湾的最北端时，前面是大海，后面有追兵，形势十分严峻。他们只有逃跑才有生路，然而海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但耶和華不会失败。火山猛烈爆发，迄今当地仍有火山爆发的痕迹。海水分开，以色列人走着旱道越过了海湾；紧随其后的埃及追兵则被回头的海水吞没了。渡海之后，白天有烟柱，晚上则有火柱为以色列人引路，他们终于到达西奈山附近。耶和華在西奈山赐予摩西一系列基本法则和戒律，从此以色列人的社会一直奉守这些律条，只是偶然会出现一些偏差。

现在我们必须简单考证一下那些奇迹。众所周知，东方人常常受害于河流污染、苍蝇、青蛙、飞蝗、沙暴和瘟疫；疑心很重的人也会相信这些事在当时是很频繁的。把红海的水吹回头的北风很可能是由于地震或火山爆发；据地理学家说，造成巴勒斯坦的死海凹陷区的地质断层一直延伸到现今东非的肯尼亚省的里夫特峪。西奈半岛曾经是火山活跃区，《圣经》中对西奈山的描写可用火山爆发来解释，因为火山爆发既可造成白天的云柱也可造成夜晚的火柱。大群的鹳鹑在迁徙过程中经常筋疲力尽地降落在埃及，很可能会有不少鹳鹑会碰巧降落在以色列人的营地附近。勒南^①曾描写过西奈半岛上有一种灌木会分泌出

① 勒南：法国哲学家、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等。

一种黏稠的白色物质,这种物质无疑有些营养成分。^①

这些合理的科学解释正好证明《圣经》故事是真实的。我们用不着去争论耶和華為拯救其选民是否破坏了他自己确立的自然法则,也不用探求上帝是否只是使自然法则以于己有利的方式运转。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奇迹是无法否认的:尽管流浪的以色列部落在许多方面与数不清的游牧部落毫无二致,但这个部落赞美基督思想却是天才的希腊和强大的罗马也未做得到的。根据这种思想,神只有一个,他是宇宙之神、民族之神、正义之神;神在另一个世界里惩罚死去的罪恶的富人;神为卑贱者、弱者和穷人谋福利。

许多用不同文字写成的书讨论了这一切究竟有多少应归功于摩西。许多现代研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申命记》是由横跨好几个世纪的故事和信条组成的。尽管如此,我们不承认摩西只是个传说人物的说法。有人认为教士和人民借摩西的名义以便使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宗教法则有所依托,我们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我们认为《圣经》中的故事是真实的,摩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使人类跃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相信,最科学的观点和最时新的看法也能从中得到满足。我们决不会为葛播硬^②教授和“学究”博士的辉煌巨著所动;我们可以认定这些事情的发生正如《圣经》所述;我们可以相信经历这些

^① 《圣经》在《出埃及记》中讲述了以色列人逃到沙漠后粮草和水都用尽了,饥饿的以色列人抱怨不休。这时从东方飞来无数鹌鹑,因此以色列人有了美食,第二天他们又发现到处都有一种香甜可口的白色小圆球,这种被叫做玛那的东西成了以色列人浪迹荒漠 40 年中的主食。《圣经》认为这是耶和華创造的奇迹。

^② 葛播硬: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指只讲实惠,把生活看成现金买卖关系的人。

事情的人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印象虽已流传了千百年，但要比当今的许多电传新闻还要准确。格莱斯顿先生有一本书已被人们忘却了，用他书中的话说，我们可以放心地依赖“无懈可击的《圣经》”。

不幸的是，逃离埃及以及随后 40 年在沙漠中的艰苦磨炼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对耶和华提出了出格的要求：他们忘了《申命记》中所珍视的古老传统；他们忘记了一神教的启蒙已在相信异教的阿克那顿法老统治的埃及播下了火种；他们把耶和华据为己有，用勒南的话说，他们使上帝令人作呕地偏袒其选民；他们剥夺了外国人拥有神圣律条和平等的权利，在他们觊觎外国人的土地和财物时则更是如此。^①

但是，人类在巨大的压力下犯这样的错误是难免的。几百年后，在火荆棘中说话的上帝将以新的形象出现：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也是所有愿意侍奉他的人的上帝；他不仅是正义之神，也是慈悲之神；他不仅保卫自我，同时也具有同情、自我牺牲和博大的爱心。这正是希伯来人心中最古老的神。

让掌握了科学和知识的人类仔细探索那些古老的故事吧！他们的探索将证明一直照耀着人类前进之路的那些纯朴故事的真实性。

^① 《旧约》中的耶和华与《新约》中的基督是有区别的，虽然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也就是说耶和华和基督是一体，但在《旧约》中他动辄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惩罚对他不虔诚的人类，而基督则是位救苦救难的仁者。现在的犹太教仍奉《旧约》为圣经，不相信《新约》中的基督，而基督教则认为《圣经》由《旧约》和《新约》共同组成。丘吉尔在这篇文章中所谈的摩西的故事来自《旧约》，因此他对以色列人有如此评价。

业余爱好

对长期担当重任、工作过累的人来说,避免焦虑和解脱过度心理压抑的方法很多。有人建议锻炼,也有人建议休息;有人建议旅行,也有人建议疗养;有人说独处好,也有人称狂欢妙。毫无疑问,此间诸法针对不同情况,各有其作用。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变。

求变是关键。人要是过度使用大脑的某一区域就会使它疲劳,这与外衣的肘部易磨损是一个道理。然而活的大脑细胞与无生命的东西毕竟不同:外衣的肘部坏了,按摩衣袖和肩部是没有用的;但大脑的某一部分疲劳了,却可以通过使用大脑的其他区域使大脑得到休养,休息并非消除脑力疲劳的唯一途径。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某个主要的兴趣上是不够的,人必须有其他爱好。如果只是对大脑说“我让你休息一下”,或者“我要出去散散步”,或者“我要躺下来什么都不想”,这毫无用处,大脑依然还会忙个不停,它该揣度还是揣度,该心焦还是心焦,只有当新的细胞被激活,新的内容成了主导,这时才会有解脱和休息。

有一位天才的美国心理学家说过:“焦虑是情绪发生了痉挛,原因是大脑紧抓住某事不放。”在这种情况下与大脑争执只是徒劳。人的决心越大,心里的东西越是放不下,唯一的办法是轻轻地把别的东西悄悄塞进大脑。如果这个东西选得正确,再佐以一定的兴趣,那么大脑往往会很快松弛下来,得到调节。

由此可见,对公务繁忙的人来说,培养一种业余爱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这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买卖,不可能心想事成;兴趣的培养是个漫长的过程,只有仔细选种,培以沃地,精心照料,才能享受到其果实。

要想保持愉快安然的心境就必须至少有两三种实实在在的嗜好。如果有人到了晚年才说我想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找点兴趣,那只会更伤精劳神。有人可能会十分精通与其日常工作无关的某个领域,但却不一定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什么安慰。做你所喜欢的事并没有什么用处,你必须喜欢你所做的事才行。大致说来,人可分为三类:苦死之人,愁死之人,闷死之人。为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者提供周末比赛或打球的机会是毫无价值的;同样,让殚精竭虑的政治活动家或职业人士再把精力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毫无裨益。

至于那些无所不能的、无论有什么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的可怜人来说,新的欢乐、新的刺激只不过是欲望的又一次满足,所以他们烦闷得要命,于是东扑西闯,拼命想解闷,对这种人来说,某种纪律的约束是最有希望的解脱之路。

理智、勤奋、有用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人把工作和娱乐截然分开,另一类人的工作和娱乐则合而为一。第一类人是大多数,他们自能得到补偿;在办公室或车间里的长时间劳作会给他们带来报偿,他们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能从最简单、最朴素的事物中发现乐趣。真正的幸运儿是第二类人,他们生活在自然的谐美之中;对他们来说,工作时间总是不够长,每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假日,真正的假日来临时会粗暴地打断他们令人心醉的工作。然而这两类人都十分需要有所变化;那些工作与娱乐不分的人尤其需要时不时地把工作暂时丢在一旁。

最常见的消遣方式是读书,千千万万的人都能从丰富多彩

的阅读活动中找到精神慰藉。图书馆是最能使人变得可亲可敬的地方。有了“几本书”就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和满足,这是莫利勋爵的话,他说的几本书是指任何小于5000的数目。不过,如果你在图书馆呆上一天,不管这座图书馆有多小,这种虚幻的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了;当你随便翻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面对着人类积累下来的无穷智慧,你的心里决不会有哪怕是十分天真的自豪感,你的心中只会满怀敬畏,甚至会夹杂着淡淡的悲哀。当你浏览那些先圣先师、历史学家、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的充栋之作时,你会意识到你永远也欣赏不了这些宝贵财富,你会叹息人生的短暂。

想想看吧,有多少美妙的故事你从未听过,有多少对重大问题的探求你永远不会去思考,有多少令人欣喜、发人深省的思想你无法分享,有多少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你服务而你却不会去收获劳动成果。不过,伤感之后你便会平静下来,虔诚的绝望终会与乐天知命的想法融为一体,由此我们将带着新的热情,追求生活中轻轻松松的目标。

有人会问:“这么多书怎么办呢?”答案是“读吧!”你即使不会读书也可把书放在手里把玩一番,凝神注视,随便翻到哪一页,找一些招眼的句子看看,到这片无涯学海里航行。把书亲手放回书架,按照自己的意图摆放,这样你即使不知书中内容,你起码知书在何处。如果书籍不能成为你的朋友,至少它们也应该是你的熟人;如果书籍无法走进你的生活圈,起码你也应该向它们点头致意。

年轻时好书读多了是个错误。有人曾经对我说他已把重要的书读遍了;仔细盘问之后,我发现他确实读了不少书,但印象不深。他理解了多少?有多少内容真正进入了他的大脑?又有多少东西装进大脑后真正变成了可用的工具?

书看得太快也是生活中一大憾事。读书时的第一印象是关键,如果第一印象不深,以后的印象也就会流于表面,不过重读一本书也有可能改变已形成的印象。年轻人读书和老年人吃饭一样,都应特别小心,不能贪多,应细细咀嚼。

变通是消遣之本,所以阅读与工作语言不同的另一种文字自然会更能使人轻松;如果能掌握一门第二语言,即使你只能用它来阅读消遣,那也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的教育家总是急于向孩子们传授很多种语言,但没有一种语言能学以致用。学生所学到的拉丁文知识足以使他恨之不已,其希腊语知识足以使他通过考试,其法语知识足以使他能从加来^①到巴黎,其德语水平足以使他知道别人要他展示文凭,其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的水平也足以使他们知道此物非彼物,但他的语言水平却远不能使他读懂另一种语言中的文学作品。

精心挑选一门语言,全力以赴学好它,不能用这门语言愉快阅读就决不罢休。用外语读些闲书能松弛大脑肌肉,因为外语能以另外一种方式使大脑活跃起来。单是语言形式即可激发大脑中其他细胞的活力,十分有效地解除细胞的疲乏。我们可以想见,以吹号为业的人可能很乐意把拉小提琴作为消遣,用另一种语言进行阅读也是同一个道理。

但读书爱书有一个严重的遗憾,它与脑力劳动者的日常工作太接近了,无法带来消遣所必备的变化效果。要想恢复心灵的平衡必须调动起指挥手和眼的那部分大脑区域的活动。很多人从练习手工艺中获得不少乐趣。无论是做木工、学化学、搞装订还是泥瓦活,只要你又有兴趣又有技术,你定能从中发现休息大脑的途径。但简便易行的妙方还是各种速写和绘画;我到了

① 加来:法国北部港口城市。

晚年竟有这种雅兴,我真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我最疲劳的时候绘画会给我带来解脱,在本书的最后一文中我将再叙我对此的感激之情。

绘画是可以陪你度过大半生的良伴,有诗曰:

岁月不会使她凋零
不同的风俗中她照样千娇百媚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体力和精确度有要求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丢在一旁,拼命努力只会使你更加劳累。肌肉松弛了,手脚也慢了下来,脑子也不如年轻时好使了,但绘画这位良友虽所求不多但却会紧随着虚弱的步伐,举起画布,把人与时间隔开。

画家是快乐者,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线与色彩、安宁与希望将伴随他们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

绘画与休闲

年届不惑而从未握过画笔,总是把绘画看得神秘莫测,即使看到人行道上的涂画也惊叹不已,而今突然发现自己对颜料、调色板和画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且成绩并不令人沮丧,这种体验真是令我惊奇,也使我大开眼界。我希望能有人分享我的感觉。如果这几行文字能激起哪一位的兴趣,使他也尝试一下绘画,我将倍感荣幸;退一步说,如果有人觉得绘画是一项令人愉悦的消遣活动,至少于人于己都无害,那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希望这些话不算过分。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绘画更朴素、更自然的了。我不敢讲绘画技巧,只谈如何娱乐吧。千万不要用不屑一顾的批评眼光看待绘画。买一盒颜料,你也来试一试。如果你想打发空闲,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丰富你的假日生活,说不定绘画可以帮你忙,即使你已到了不惑之年也是如此。如果只知道在闲暇时可以打高尔夫球和玩桥牌,手忙脚乱却又不不知干什么好,那就太可惜了——也许有些可怜的家伙命该如此。其实,思想和技法完美结合的新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口袋里就有开启这座流光溢彩的花园的钥匙。绘画有诸多妙处:它花费不多却能使你尽享自由,它能随时随地给你带来永无止境的快乐,它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食粮,它以独特的语言传递古老的和谐之美和对称之美,它是你闲暇时的良友,会把你不断引向令人沉醉的新发现的世界中去。但你必须明白,这一切都是身外之

物,如果你在尝试中失败了也无伤大雅。画室里遗弃的作品幼稚园会抢着要;况且,你依然可以出门打猎,还可到高尔夫球场上羞辱一下对手,也可在球桌上与友人一争高下。总之,你不会有所失,只会有所得。毫无疑问,这种事正是休闲者所应该做的。

哪怕已步入晚年,如果你想大概了解一下某个全然陌生的领域,请相信,大胆无畏是最为重要的;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有板有眼地学。素描学上2年,木刻学上3年,雕塑学上5年,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事,他们的日子长着呢。这种脚踏实地打基础的方法只适合那些欲把绘画当成毕生事业的年轻人。真正的艺术家的一笔一画都能赋予线条和形式以真和美,然而这种真和美必定建立在漫长而艰辛的勤学苦练之上。我们不必希冀能画出传世之作,只要能在颜料盒中找到乐趣就该心满意足了,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要有胆量就足够了。

下面我将叙述一下我的亲身经历。

1915年5月底我离开了海军部,但我仍是内阁成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这个位置上,我无所不知,却又束手无策。在海军部时,每天的行政事务极其紧张,而现在的顾问工作却必须仔细掂量,这一转变使我精疲力竭。就像是深海里钓上来的海兽或突然浮出水面的潜水员,庞大的压力使我筋络膨胀,我满心焦虑却又无法解脱。我虽有炽热的信念但却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良机失之交臂,眼看着由我发起的计划接二连三地半途而废。我有太多的空闲去思考战争的可怕前景。当时,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想行动起来,但我被迫赋闲,对这出悲剧我只能袖手旁观。这时,大慈大悲、行侠仗义的绘画女神来拯救我了,其实她与我有何相干呢?她问我:“这些玩具你中意吗?有些人很喜欢它们呢。”

某个星期天我在乡下试用了孩子们玩的颜料盒，于是第二天上午我便买来了全套油画用具。

油彩、画架和画布都买来了，下一步就该动手作画了，但这一步是多么艰难啊！调色板上闪烁着一个个色彩，崭新洁白的画布架好了，新画笔握在手里重如千斤，无从下笔，我的手如同中了无声的魔咒。当时的天空淡蓝如洗，很显然，画布的上方应该抹上蓝白调和的油彩。明白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艺术训练，这个起点是大家都具备的。我小心翼翼地用一支小号画笔蘸了一点蓝颜料，战战兢兢地在咄咄逼人的雪白画布上画了豌豆大小的一笔。这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挑战，绵里藏针，令人噤若寒蝉，无从应对。恰在此刻，只听见车道上有汽车驶了过来，车上走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才华横溢的约翰·赖弗瑞爵士^①的夫人。“作画啦！你犹豫什么呢？给我一支笔，要大号的。”画笔猛然浸入松节油中，继而插进蓝色和白色颜料中，然后在调色板上狂放地搅拌起来，最后在畏畏缩缩的画布上落下了几笔恣肆的粗线条。画布无法还击，也不会对这种暴虐进行报复，只能无可奈何地笑。魔咒打破了，我抛开了约束，抓起一支特大号画笔，向我的牺牲品猛扑过去。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怕画布了。

我们都能记得站在跳水台上的那种哆哆嗦嗦的心情，一旦有人好心地偷偷从背后把你推下去，你必定大惊失色，然而当你气喘嘘嘘地浮出水面时，你定会感到十分自豪。

大胆地迈出第一步是绘画艺术的极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不止这一点。

油画难作，

^① 约翰·赖弗瑞：著名的肖像画画家。

但远比水彩画美。

我无意诋毁水彩,然而实在没有比油彩更好的颜料了。如果你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材料,你就有了使它对你俯首贴耳的巨大力量。此外,油画比水彩更易上手。首先,油画中的错误很容易修改,调色刀一扫就可以从画布上彻底“铲除”一个上午的心血,一切又可重新开始了;画布是表现往日印象的最佳手段。其次,你可以在画布上从不同方向上处理画面,无需循规蹈矩地从上往下安排色彩的过渡。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起笔,你可以从中间开始,涂上中性色调,心血来潮时你尽管大刀阔斧地尽情涂抹。此外,调弄颜色真是太奇妙了!假如你高兴,可以把颜料层层叠加,随意组合,你也可以根据时间和天气条件随机应变。有一点要切记:你随时可以清除一切。

只要画起来就有无穷的乐趣。颜料看起来艳,挤出来也鲜,不管你怎么调和都令人心醉。如果你尚未画过,有生之年不妨一试。作画者慢慢地就克服了选色和落笔的困难,思路也会开阔起来,他会发现,作画恰似打仗,打仗的过程比赢得胜利更激动人心。画艺与兵法同源,都是想解决某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都认为,画出一幅名画必定要有丰富的智慧;世上肯定有某种超然的眼光,能看透事物的本末,既能看穿其局部也能看清其全貌,把一切尽收眼底。当我们面对特纳^①的巨幅画作时我们会发现,每幅画都是一个整体,表现了某一瞬间,而其中的每个细节,无论多么小、多么远,无论是主景还是支景,全都在不经意间表现得很自然,远近相宜,大小相称,这时我们定会觉得我们面对的是超凡的智慧,可与最高明的战争艺术、科学思维和逻辑

^① 特纳:19世纪英国著名画家。

思辨相媲美。

在战争中,有两种东西是指挥官所必备的,一是胸有成竹,二是有备无患。画家也是如此。若要有成竹在胸则必须充分了解战地实情,对其山地河流、道路桥梁,甚至一草一木都必须从特定的角度加以审察。人们会惊奇地发现,风景中竟有这么多从未注意过的东西;从此,行车赶路时又有了新目标,真是有趣极了。山间竟有如此丰富的色彩在光影中变幻,水映山影,景深影淡,五颜六色地为地表镶金包银,流光溢彩,真是美不胜收。我在散步时总会不知不觉地留心那叶子的色彩和特征,那如梦的紫色山峦,那冬天枝头的轮廓和遥远的地平线的淡淡的剪影。我活了40多岁,从未留心过这一切。以前的眼光只停留在表面,好比有人看到了一群人只会说“人真多啊”。

我想,对自然界观察能力的提高是我从学画中得来的最大乐趣之一。毫无疑问,许多艺术爱好者无须经过训练便掌握了这种能力,但如果你必须把观察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你会观察得更迅速、更全面。如果你观察细致而又精确,如果你把所看到的一切大致记录下来,那么画面就会俯首贴耳地任你摆布了。即使你只能抓住其中四五个要点,这几点也会带来不少成功。这正如考试答题,如果你能把100题中的5个大题答对答好,你虽然得不到奖,但也不致一败涂地。

要想打好仗,指挥官不仅须调查战场地形,还须研究过去的战例,他必须把侦察到的情况与名流将帅处理类似情况的实例相比较。于是欧洲画廊便有了实用的新趣味,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看,这种颜色正是我上周见过的瀑布的颜色,”诸如此类的发现便会纷至沓来。你会发现昨天你遇到的难题被画家们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样,你对自然的感受能力会有极大提高,同时你也学会了用解析的眼光来欣赏艺术杰作。

世界宝藏的大门在你面前洞开,最简单的东西也有其内在的美,每一个花园都有无数令人神往的美景,每一片土地、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同的地方风景迥异,到处都充满了新鲜的光、影、形、意。显然,一旦画具在手就不会有人再觉得无聊,不会再有打发不了的时间。天哪,可欣赏的太多了!时间真紧迫,这时人们就会嫉妒梅休塞兰^①了。

名将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正确地控制和使用后备力量,一旦后备力量全部投入战斗,指挥官也就尽了责。如果这还不足以赢得胜利,那么他也没办法,只能听天由命,看作战部队的努力了。然而即使兵力很足,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指挥也只能是一团糟,乱哄哄地,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仅有庞大的兵力是不行的;最大的画笔、最亮的色彩也传达不了任何印象,仅靠工具作画只会使画布变成泥潭,必败无疑。在这种战术中,即使将帅身先士卒也无力回天。

在绘画中,空间感和比例感就是画家的后备力量,这是画艺走向谐美的必经之路。调色板的一端是白色,另一端是黑色,但作画从不用单纯的黑白两色,画家须在这两种极端色彩之间大显身手。单用黑白两色不会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然而黑色与白色却能形成最鲜明的对比。如果自己作画却又画不好,再回头看看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那可真是太奇妙了,他们可以通过空间关系的处理表现出各种远近明暗的效果。我们认为这种能力建立在比例感之上,这无疑训练的结果,但在本质上它是智慧力量的外现。我们认为,在绘画方面具有这种敏锐的整体感悟能力的人只要熟悉其他领域内的专业技巧,那么此人必定能够胜任一切人类智慧活动。伟大的意大利人正是如此。

^① 梅休塞兰:西方传说中的寿星,相当于中国的彭祖。

我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诚心学画的人会得到各种各样的乐趣,他们将有更强的洞察力,富有主见,闲暇时也必定很愉快。无论你是喜欢耽于沉思冥想画面的谐美,倾心于画面中的辉煌,还是只想画一些快乐场景以自娱,绘画的潜力是无法穷尽的。每时每刻你都会有所进步,每前进一步都可能给你带来累累硕果。然而前进之路永无止境,你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这不但不会使你灰心丧气,反而会使你在前进途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和荣耀。

试一试学画的乐趣吧,现在还不晚,你也不会嘲笑我。画画看,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克服开头的困难。多学点入门知识,它会给你的生活开辟一条新路。培植一个新的花园吧,辛劳之后你可坐享其美景。花园虽小但你可以年复一年地看着它生长、开花、结果;它会日渐繁盛,你在园中除草、整枝,园中群芳斗艳,枝影摇曳,美景四季常新。

我得承认自己喜欢亮丽的色彩。某个画派“生吞活剥石板笔和粉笔,还偏要别人相信其味道比草莓和李子还要好”,卢斯金^①看不起这个画派,我也有同感。我对颜色有所偏爱,垂青亮丽的色彩,真心实意地为暗褐色感到难过。到天堂之后我打算先花百万年时间画画,把画艺学透,到那时我希望能有一块比凡间的调色板更鲜亮的调色盘,橙黄和橘红将是调色盘中最暗的色调,盘中将有一套全新的色彩,天神的眼睛也会为之欣喜。

一年秋天,我来到位于马赛和土伦的科特达祖尔休假,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位现代法国画派的画家,他们是塞尚^②的信徒,在他们看来自然界是一团闪烁不定的光,形状和外表并不重要,

① 卢斯金: 19世纪英国文艺评论家,拉斐尔前派的捍卫者。

② 塞尚: 19世纪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几乎不为人所见,人们所看到的只是色彩的协调和对比。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察方法,我当然很感兴趣。以前我在画海时用柔和的长线条,着色层次分明,结果画出来的海是平的,而现在我画海时用的是数不清的菱形小色块,而且常常用单色,这样画出来的画面不像大海,倒是更像卵石铺就的小路。奇怪吗?不过不要急于抛弃这种画法,你不妨后退几步再看一看,这些小色点放在一起产生了整体效果,每个小色点都放射出一种能够感受得到但却又说不出原因的强光。你再观察一下地中海的蓝色吧,怎样才能把这种蓝画出来呢?当然不能用任何现成的单色,临摹这种蔚蓝色的唯一办法是把与整体构图有关的不同颜色一点点地堆上去。难吧?然而这也正是其迷人之处。

自然界通过这些不同的光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其中的每一个光点都散发出独特的光晕。一幅画的优劣部分取决于这些光点在画布上出现的频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卢斯金在他的《绘画要素》一书中说:“特纳的巨幅油画有六七英尺长,四五英尺高,在这些油画上你会发现,就连米粒大小的色块都有层次的变化。”但在着色方法上特纳有别于现代法国画派。特纳用色是渐次过渡,不是把色块截然分开。特纳的画笔追随着其绘画对象的外形,而我们的法国朋友的画法刚好相反;比如,法国人画海喜欢垂直用笔而不是水平用笔,而他们画树干时则是左右用笔而不是上下用笔。我估计,法国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迷上了自己的理论,所以不惜牺牲事实以表明自己对理论的忠诚。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把现代风景摹画得千娇百媚、栩栩如生的画家们。马奈、莫奈、塞尚和马蒂斯的绘画不正像是济慈和雪莱的诗歌吗?他们把艺术发展到更新的高度,为绘画艺术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气象,他们的作品在美中带有欢乐,耀眼夺

目。

我想这些大师们也许并不欣赏我的辩护词,但我必须承认自己对他们作品的迷恋。清晰准确的表达能力是法国人思维的特征之一,法语就是体现这种天赋的手段;法国人的言谈和绘画与他们爱情、战争、外交和烹饪艺术一样出色。法语词汇精确而又完美,所以法国人具有掌握和传授各种艺术理论的天赋。他们的批评眼光高度发达,这可能有碍于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这种眼光于人于己都有绝妙的纠偏补弊作用。

我有位法国朋友,他看了我的涂鸦之作后带我去看巴黎的画廊。他带着我走走停停,每停一处我总能看到我特别欣赏的画作。他解释说,从你的画中很容易看出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在学画之前我对绘画并不感兴趣,所以我对绘画并无主见,我只知道自己对某些画作有所偏爱,但说不出什么理由来;他只是看了一眼我的画作就发现了我的偏好,真是令我吃惊。我的朋友说,对画艺一无所知并不是什么坏事,重要的是要有在其他领域内培养起来的成熟的思想和对绘画的强烈兴趣,具备了这两条也就具备了学画的要素;只要假以时日并得到一定的指导就能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品味,中途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我希望这是真的。这句话的后面部分肯定没错。

你一旦仔细观察自然就会发现,自然界到处都兴味盎然,到处都充满了美。我看过塞尚的一幅画,画的是一间房子里的一堵空墙,画中运用了最微妙的光线和色彩。现在每当我看到墙壁或其他平整的物体表面时总能发现不少乐趣。我会竭力辨别其中的不同色调,想弄清这些色调到底是其本色呢,还是由于反光引起的。你第一次这么看时准会惊奇万分,最不起眼的景物上竟也有如此美妙的色彩;看得多了,看得细了,你就会发现还有更多的色彩变化。

然而,你不必因此仅观察最简单常见的景物。画面美并不是仅靠景物美。实际上很多人造景物很漂亮,但却常常会破坏掉一幅好画。自然界的美无需叠床架屋式的双重美化。理想化的东西太多并不是什么好事。鲜活的场景、亮丽的氛围、新奇的光线和鲜明的对比一旦映入你的眼帘立刻就会引起你的兴趣,你的画中也会因此洋溢着激情。

如果专家仔细研究一下记忆在绘画中的作用,那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作画时先看物体,再看调色板,最后才看画布,这时画布上就会接收到几秒钟前来自物体的信息。信息在传递途中由光转成色,画布上接收到的是密码,密码在画布上重又正确地组织好,之后信息的含义才能解读;这时的密码则又由色还原为光——此光乃艺术之光而非自然之光,这一过程必须借助记忆之翼或记忆之轮的力量。我们常说记忆像翅膀,像戏花彩蝶般轻盈敏捷,但记忆肯定更像车轮,因为只有车轮才载得动如此繁重的信息。

在室外作画时,光与影的变化急若流星,画布上光线与色彩的转换是在无意间完成的,但所有著名的风景画都是在室内完成的,而且画家往往是在他们获得初步印象后很久才开始作画的。荷兰或意大利的大师在阴暗的地窖里重现了荷兰狂欢节上闪光的冰块或威尼斯的明媚阳光,这就需要画家有惊人的视觉记忆力。通过绘画我们不仅培养我们的观察能力,同时也锻炼我们的记忆力,因为我们必须在景物和光线从我们眼中消逝的几天、甚至几个月之后通过画笔重现一切。

据说惠斯特勒^①在巴黎主持过一所艺校,他要求学生在一楼观察模特,然后跑上二楼作画。当学生的画技变得熟练时,

^① 惠斯特勒:19世纪英国画家。

他就把学生的画架放到更高一层楼上,最后这些高材生必须奔上六楼作画,一边跑一边祷告,希望画面千万不要从大脑中飞走。这也许只是个传说,但它有力地说明了训练有素的精确持久的记忆力对画家的重要性。反过来看,学画也是训练精确持久的记忆力的一个绝好手段。

对初入道的画家来说,最有效的锻炼方法是仔细研究一幅画,然后第二天再凭记忆把画复制出来。绘画能准确地检验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把零散的印象集中到一幅画上是很难的,即使你有素描和彩色速写参考也不容易,但这是作画的唯一途径。单是画布的尺寸就决定了在室外作画是不可能的。此外光线效果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样的光线永不会再现。画家必须在清新生动的印象和严肃深沉的记忆之间作出选择,印象不能长久,记忆则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有把记忆与知识和毅力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杰作,不过你最好不要对此耿耿于怀,这是那些毕生追求画出杰作的大师们的事,你只须来到阳光下,尽情享受美景。

作画是一种完美的消遣活动,在一个人身心疲惫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比绘画更能使人全神贯注的了。不管目前有什么烦恼、将来有什么威胁,一旦作画开始,大脑中便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了,它们全都消失在黑暗之中,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作画上。时间退到了一旁,连通知就餐的敲门者也犹豫再三,不愿打断作画人的思绪。当我在队列中走半小时或在教堂里站30分钟,我总是觉得站立的姿势很不自在,硬挺着保持立姿只会使人疲惫不堪。可是喜欢绘画的人接连画三四个钟头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适。

最后我想说的是,学画可刺激寄情山水的欲望。为了学画整天远足,既省钱易行又能陶冶心性。哲学家式的宁静享受替

代了游人的无谓奔波。你涉足的一山一水都有其独特的主题，光线、气氛、格调各各不同，但各有其自身的魅力；即使你画技不佳，你也能感受到风景对你的影响，它会教你用笔、帮你选色；即使你无法把它描摹下来，但你能看到它、理解它、感受它，你会永远赞美它。人们习惯于坐着火车在欧洲奔忙，下榻大旅馆，参加狂欢节，从一个娱乐点跑到另一个娱乐点，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少无需花钱即可得到的宝贵东西。学画者行踪不定，总是寻觅可入画的美景，画好后带回家。

现在，我正在培养自己在沉闷日子里对绘画的兴趣。在青春洋溢时我需要阳光。威廉·奥本爵士建议我去阿维尼翁，因为那儿阳光明媚，是学画的好去处；也可去炎热的埃及，看一看尼罗河、大沙漠和阳光变幻无穷的组合；或者也可去巴勒斯坦这个风景胜地，此地之美景尚未有人充分描画，值得真正的画家一看。去印度看看如何？那儿的壮丽辉煌尚无人着笔。然而，只要阳光灿烂就没有出国远行的必要，苏格兰高地上的溪水亮丽无比，泰晤士河上的日出日落辉煌壮丽，到哪儿去找这样的美景呢？